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古代中期军事史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内容提要

古代中期（公元前 8—前 3 世纪）是奴隶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奴隶制国家普遍兴起的时期，人类文明已越出少数几个地区向周边扩展。战争便成为这种扩展的重要手段。各种战争多达 2000 余次。

地中海世界的硝烟是这一时期战争的主旋律，这不仅因为希腊、罗马、马其顿、亚述、波斯、埃及、迦太基等重要国家都环绕地中海，而且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在某种程度上也被卷入这一地区的战争。同时，战争还联系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它们成相互关联的一体。

在南亚的印度，有列国时代十六大国间的内争，最后统一于孔雀帝国；在东方的中国，正值春秋战国时代，经过 300 余年的春秋争霸和 250 余年的战国争雄，最后达到秦帝国的统一。

经过 500 年的战争，无论是东方或是西方，都显示出从分裂到统一的发展趋势，战争帮助历史完成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变革。

一、概述

1. 古代中期的军事交锋

古代中期（公元前 8—前 3 世纪）是奴隶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奴隶制国家普遍兴起的时期，人类文明已超出少数几个地区，向周边扩展。中国的文明已从黄河流域传播到长江流域；在印度，恒河流域取代印度河流域成为文明的重心；在西亚地区，两河流域的古老文明衰亡后，继而兴起了亚述帝国、新巴比伦王国和波斯帝国等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一直沿袭下来，但在本时期，它已经衰落，缺乏活力，并不断遭到外族的入侵和征服；在北非，迦太基一度称雄于西地中海；在南欧，新兴的希腊、罗马文明先后崛起。总之，古代中期的亚、欧、非三洲均已成为文明的载体，各拥有几百甚至上千个奴隶制国家。

奴隶社会的一大特色便是战争频繁，本时期多达 2000 余次，仅中国，见于经传的较大战争即有 711 次之多。战争类型也繁多，既有小国之间的互相构怨，也有改朝换代的王朝战争如印度孔雀王朝取代难陀王朝；有文明世界与游牧民族的抗争，也有大国对周边小国的侵略鲸吞；既有地区性的统一战争，也有国际性的争霸战争。从战争发生的区域来看，主要是在西方的地中海世界、南亚的印度及东方的中国，这三大地区的熊熊战火相互辉映，构成了当时世界的军事格局。

地中海世界的硝烟是战争的主旋律，这不仅因为希腊、罗马、马其顿、亚述、波斯、埃及、迦太基等重要国家都环绕着地中海，也不仅是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在某种程度上也被卷入这一地区的战争，还由于这些国家并非孤立发展，它们之间有着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而且战争常常把它们结为一体。

本时期首次洲际间的军事交锋发生在亚述帝国时期（公元前 9—前 7 世纪），亚述王萨尔贡二世和阿萨尔哈东曾先后两次攻入埃及，将西亚与东北非结为一体。代之而起的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 626—前 539）虽未征服埃及，但与之在巴勒斯坦一带几次角力。公元前 6 世纪中期，波斯帝国兴起，其铁蹄先后践踏了中亚、印度西北、埃及乃至黑海北岸，其盛期发动的希波战争，是本时期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由此拉开了西亚地区与希腊地区间长达近 200 年之久的抗争序幕。

希腊文明是本时期的新兴文明，直至公元前 6 世纪，这个文明才逐渐褪去了氏族部落的外壳，形成了数百个城邦国家，其殖民城邦遍布地中海。它们始终没有完成统一，但也形成过几个松散的联盟，即斯巴达同盟或称伯罗奔尼撒同盟，与稍后在希波战争中形成的雅典海上同盟或称提洛同盟。这两个同盟联合打败波斯帝国的入侵后，很快反目成仇。经过 27 年（公元前 431—前 404）的内部争雄，斯巴达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但这场内战耗尽了希腊的实力，客观上为后来马其顿的征服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 401 年，一支万余人的希腊雇佣军进入西亚，帮助小居鲁士

据《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附卷《历代战争年表·上》统计，解放军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35 页。

争夺波斯王位，在库纳萨一战中，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势如破竹，但在追击中，小居鲁士被杀。这支军队在青年将领色诺芬的指挥下，从波斯帝国腹地巴比伦安然退回希腊。这是希波战争后发生在两个地区间的又一件大事，它检验了波斯帝国的军事实力，并带回了波斯帝国并非不可征服的信息。诚如有的学者说，此举“震惊了世界，并鼓舞了后来希腊人入侵波斯王土”。

此后，希腊霸主斯巴达国王阿吉西拉斯（公元前 398—前 360）很快将战火烧到小亚细亚，但在公元前 394 年，他的舰队遭到了决定性失败，从而阻止了其扩张野心。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无论希腊或波斯，内讧不断，希腊霸主不断更迭，波斯帝国宫廷喋血不休，均为内争所累，无力外伐，东地中海世界暂显平静。公元前 4 世纪后期，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兴起，在亚历山大的率领下，首先统一希腊半岛，继而十年东征，消灭波斯帝国，建立了一个囊括希腊、西亚、印度西北部、咸海南岸的中亚、埃及的大帝国。虽然这个帝国仅是昙花一现，但它首次将地中海东部各国联为一体，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征服世界的观念。

这个观念随即鼓舞了一个野心家，即希腊西北部的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公元前 319—前 272）。他出身于马其顿亚历山大学校，是位有绝顶天才的将领，经常热衷于庞大的计划，幻想成为第二个亚历山大，欲在地中海西部，依亚历山大在东方的榜样，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公元前 280 年，他率军远征意大利南部，与罗马人打了一场艰苦的战争，取得了不少胜利，但自己也损失惨重，至公元前 275 年，被迫率残兵离开了意大利。在西方建立帝国的计划，后来由罗马人实现了。

罗马在公元前 6 世纪末始形成国家，当时它处于许多民族的包围中，但它善于吸取教训，不断改进战术，并采用结盟战略，经过长期（公元前 477—前 290）苦斗，占据了意大利中部；再经为时 5 年的“皮洛士战争”，将皮洛士逐出半岛，征服南部意大利。以 200 余年之武功，终于统一了意大利半岛，进而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自公元前 3 世纪中叶始，它经过两次布匿战争，打败北非强国迦太基，迈出了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第一步。至公元前 2 世纪前半期，它便将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海。

在南亚的印度，本时期亦是一个干戈齐举的时代，既有列国时代十六大国间的内争，也有波斯、马其顿的外族入侵。在复杂的国内、国际斗争中，摩竭陀国家日愈强大，通过兼并战争、驱逐外族，统一了南亚次大陆，建立了孔雀帝国。

在东方的中国，本时期正值春秋战国时代，亦是社会制度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战乱频仍，不仅有中原各国间的相互攻伐，还穿插着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所谓“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如线”（《公羊传·僖公四年》），即指此事。春秋时期，王纲解纽，西周统一国家分裂为 160 余个奴隶制小国，它们之间征伐不休，致有战事 483 次、大战 376 次之说。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迭相登场，争霸中原。经过 300 余年的争霸战争，至战国初期，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举的局面，在七强长达 250 余年的

相互纠葛中，秦国逐渐取得了优势，于公元前 221 年，吞并其他六国，囊括天下为一统。

经过 500 年的战争，无论是东方或是西方，都显示出从分裂到统一的同态发展。地跨西亚、北非的亚述帝国、波斯帝国，跨越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雄踞南亚次大陆的孔雀帝国，囊括地中海西部的罗马共和国，以及脚踏黄河长江两岸的秦帝国，都代表着这种发展趋势。帝国的建立必然伴随着剧烈的军事征服。虽然我们可以讴歌那些被征服者的英勇抵抗行为，谴责弱肉强食的血腥战争，但是，以统一取代分裂毕竟是一种进步。在中国，剧烈的军事冲突还反映着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

古代中期的战争，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繁荣密切相关。本时期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思想解放的时代，各种新思想、新学说纷沓而至。在中国，出现了诸子百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印度，列国时代出现的六大师、六十二见（见解）、九十六种外道，标志着人类思维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一次大觉醒；在希腊，古典时代的思想文化亦极其繁荣。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政治上的扩展愿望，各种思潮便应运而生；同时，动荡的社会、频繁战争，亦为文人学士提供了思想素材与契机。至各帝国建立后，思想解放运动一般亦即中止，对正统思想的尊奉扼制了人类思维的探索。不过，亚历山大帝国是一个例外，它将几十个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国家联为一体，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大熔炉。

总之，古代中期的世界军事事实则是经济发展基础上政治斗争的表现，由一幅幅血腥战争画面所构成，但在这种表层现象之下，亦隐藏着社会的统一与进步、思想文化的繁荣与整合等事实。古代中期的血腥屠杀，尽管危害很大，但它却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2. 古代中期军事发展概况

古代中期，各国在军队建设、武器装备、战术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变化。

(1) 兵制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各国兵制具体情况不尽一致。从总体看，本时期兵制大致有以下几种：

其一，公民兵制。亦称民兵制，它要求“每一自由民出身的男子都必须服兵役。只有那些担任公职的人，而在较早的时期，则还有第四等级即最贫穷的自由民，才能免服兵役。这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民兵制度”。其特点为：服兵役是一种特权；自备武器，一般不发津贴；战时服役，战后解甲归田。该兵制以古希腊的雅典、斯巴达及罗马最为典型。东方各国立国之初，一般也实行此兵制，如亚述帝国初期的全民皆兵、波斯兴起之初的“卡拉”（人民）制、中国春秋初期的“国人兵役制”，皆属民军范围。

其二，世兵制。其特征是国家专门培养一个以当兵为职业的武士阶层，子袭父业，世代当兵。它主要流行于古代东方国家，以印度最为典型。中国春秋时代的军士、印度四种姓中的刹帝利，即为武士阶层。在亚述和波斯，其表现形式稍有不同，它们建立帝国后，由于境内民族众多，于是作为征服者和统治民族的亚述人和波斯人便成为专务兵事的阶层。世兵制仅出现于东方，是因为东方国家幅员辽阔，国民居住分散，普遍民兵制在紧急关头不能迅速征集足够兵员，故有必要以效忠原则（如亚述和波斯）或就近原则（指离国都远近）指定部分居民专服兵役。从本质上看，它只是一种小范围的民兵制。

其三，常备军制。随着战争的日益频繁，各奴隶制国家为适应战争需要，不得不集中部分常备兵组成军队，充当战争时的骨干力量。其特点，一是脱离生产，成为职业军队，退役后可得一块份地；二是装备与给养由国家提供。常备兵是国家军队的精锐。在本时期，建立第一支常备军的是亚述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公元前 746—前 727），以后，东方其他各国亦先后组建。希腊、罗马、迦太基在本时期尚无常备军，但由于战争的频繁与持久，希腊、罗马的公民兵、迦太基的雇佣兵实际上承担了常备军的职能。

其四，雇佣兵制。此兵制出现最晚，范围也不广，本时期仅限于印度、希腊、迦太基等地，以迦太基最为典型，这个国家始终采用此兵制。希腊后期，雇佣兵也很流行，诚如恩格斯所说：“在马其顿的前夜，希腊和它的殖民地，……是兵痞和雇佣兵的市场。”雇佣兵与常备兵都是为获薪饷而长期服役的军人，但雇佣兵多为外国人，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赚钱谋生，至于与谁打仗，则绝少关心。雇佣兵是职业军队，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汉尼拔曾率领他们纵横意大利达 16 载，战无不胜，足见一斑。

总体而言，本时期兵制大致经历了从民兵制到常备兵制的发展过程。当然，各国建立常备军后，由于其数目不多，战时仍需民兵补充。

(2) 军种

本时期的军种分为陆军与海军两类，多数国家的陆军有步、骑、车、象、工兵、辎重兵等兵种。车兵出现较早，范围也广，中国、亚述、波斯、印度都有一定数量的车兵。中国春秋初期和亚述帝国初期，是车兵的鼎盛时期，均有战车数万乘。波斯战车装有镰刀，较为奇特，被称为“滚刀战车”。战车兵由贵族充任，装备精良，出击迅速，但受地形限制较大，随着战争的发展，骑兵逐渐取代了它的优势。骑兵是本时期新兴的重要兵种，第一支独立骑兵为亚述王萨尔贡二世（公元前 721—前 705）组建。波斯以农牧部落立国，马匹较多，“在这里骑兵一下子就获得了统治地位”。古希腊和罗马，因地理条件限制，均无战车，骑兵亦少。在希腊，直到伊巴密浓达时期（公元前 4 世纪前半期）才出现了与步兵协同作战的正规骑兵。使骑兵真正发挥威力的是马其顿人和迦太基人，亚历山大与汉尼拔的赫赫战功，大半要归于其骑兵的优势。中国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4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7 页。

国时代始有骑兵，在战争中发挥了较大作用，赵国因首先“胡服骑射”而盛极一时。骑兵机动性强，出击迅猛，受地形限制较小，是主要的进攻和反击力量。步兵是各国最重要、数目最多的兵种，是军中支柱，如中国的战国七雄，均有几十万乃至百万步兵，印度的孔雀王朝据说也有步卒 60 万。在许多国家，步兵依其装备不同分为重装与轻装两类，亚述步兵分类最细，有剑手、弓箭手、矛手，它们各又被分为重、次重、轻、次轻四类，足见其繁杂。在中国，步兵仅使用不同的兵器，无明确的分类。本时期步兵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是由希腊人谱写的，斯巴达方阵、底比斯方阵、马其顿方阵均为冷兵器时代较为优秀的步兵战术。象兵范围不广，仅印度和北非产象区使用。象兵最发达的国家是印度，难陀王朝时据说有战象 6000 头。象兵极有冲杀力，但在本时期以象作战，效果大都不佳，印度的波罗斯王用以抗击亚历山大入侵的 200 头战象、撒马战役中汉尼拔赖以制胜的 80 头大象，均未能发挥威力，不仅未能冲乱敌阵，反而扰乱了自己的阵势。其原因是战象易受惊吓，致使胡乱冲闯，不分敌我，皆受其害。工兵和辎重兵大约同时出现，时间较晚。世界上首次组建此独立兵种者是亚述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中国、印度、波斯、亚历山大帝国都很重视辎重兵，亚历山大的军队被称为西方历史上第一支有后勤保障部队的军队。古希腊不仅有陆上辎重队，还有海上辎重队。辎重兵的任务是负责军需物资的运输。工兵是担负军事工程保障任务的专业兵种，其职责是修造攻城战具，或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修筑营垒等。陆军中，除上述六兵种外，多数国家还有攻城兵、侦察兵、通讯兵等，亚历山大和古代印度的军队甚至还有医疗队。

海军是独立的军种，本时期的世界诸国，仅亚述帝国似无水师。中国和印度虽有水师，但作用不大。海军最发达的是地中海周边各国，在这里，海军往往比陆军更重要，成为争霸的主要工具，霸国的兴衰与其海军的强弱密切相关。波斯曾以其千余艘战舰称雄一时；雅典海军是希腊海军的王牌，它们在打败波斯帝国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并因此取代波斯而称雄东地中海；罗马与迦太基的争雄战争，首先是争夺制海权的斗争。迦太基是继雅典后兴起的另一海上强国，战争初期，其战舰具有绝对优势，罗马仅开始兴建海军，在夺得制海权后，才取得了战争主动权。

(3) 军队组织与武备

本时期各国军队的组织不尽一致，但一般说来，都有十人队、百人队、千人队、万人队等建制，如中国就有什长、佰长、千人之将、万人之将等编制。马其顿、罗马的军队组织与其战术密切相关，马其顿方阵和罗马军团，既是一种战术，也是一种军队组织单位。印度列国时代的军队编制较为奇特，其三三制是一种诸兵种的混合编制，一象、一车、三马、五步兵组成其最小单位“波特提”，以后每升一级，人员增添三倍，至其最大组织“阿克绍希尼”时，有象、车各 2 万余，马 6 万余，兵 10 万余。

本时期的武器装备经历了铜制或青铜制到铁制兵器的发展，种类繁多，不下百种，仅《政事论》所载孔雀帝国的武备，即达 57 种，其他诸国也不下二三十种。依其作用可分为进攻类、军械类、防护类三种。进

攻武器中，最普遍使用的是弓箭和矛。矛长 1.5—6 米不等，马其顿的矛长达 6 米；罗马人惯使短矛，长约 1.5—2 米，但重达 4—5 公斤，用以投向敌人，打乱其阵形，而后以短剑肉搏。亚述、波斯、印度最重视弓箭，其弓箭大且强劲，亚述的弓长 4 英尺，印度的弓更长，与持弓者身高相等，射箭时需坐在地上，以脚踏弓背，方能拉开。其他国家的弓较小。弓为木质，弦多为牛筋，箭头呈菱形或三角形，金属制。在火炮发明以前，弓箭是最有力的远距离打击武器。此外，属进攻类兵器的还有大刀、剑、标枪、锤、战斧、弹弓、手力投石器等。中国的所谓十八般兵器，此时已基本齐备，其中戈、殳（sh）、钺等为我国特有，人们常以“干戈”指战争，足见“戈”的重要。防护装备包括衣甲与盾。衣甲有头盔、铠甲、护胫，中国甚至有全副的马甲，多为铜制或铁制。亚述、斯巴达和中国军队的衣甲在当时最为精良。盾多种多样：就其制作材料而言，有皮、木、藤、柳条等，金属盾较少，一般仅国王和高级将领配备；就其形状而言，有凸面、圆、椭圆、长方及半圆筒形等；就其大小而言，有护面护胸的小盾，亦有护全身的大盾。在使用盾方面，有两个国家具有特点：亚述的大盾需一人专门持掌；斯巴达前期的盾是挂在脖子上，后来才固定在左臂上。军械也颇为发达，《政事论》所载各种军械达 26 种，可分为攻城器械和守城装备两类，攻城器械有各种投石弩炮、投石机、投石器木塔、攻城塔、破城槌、云梯等。亚述人最早使用这类军械，其投石机能将 10 公斤重的石块投出 500—600 米。波斯、希腊、罗马的攻城技术，大半继承于亚述，并有改进，希腊化时代（公元前 323—前 30）的重弩炮，已能将 70 公斤重的巨石射出 300 余米。在守城装备方面，有吊梁、钉钉的滚木、守望塔等，叙拉古科学家阿基米得甚至发明了可以吊起敌舰的巨型起重机械和大型投石器。这些足以证明当时的军事技术已达到了较高水平。

(4) 战略战术

本时期的历次战争中已形成了战略战术。综合来看，本时期的战略有：研究敌我情况，进行战略决策。如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方面的陆上防御、海上进攻战略，斯巴达方面的陆上进攻、瓦解敌人盟国的策略，都是通过分析比较敌我实力而制定的。结盟与树敌战略在本时期也多有运用。古希腊的内部争雄、摩竭陀称霸列国等战争中，都有效地使用了这一策略，而中国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斗争，尤其是秦国的“远交近攻”，可以说已将此战略发挥得淋漓尽致。夺取制海权。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布匿战争等，都围绕着争夺制海权问题，这些战争的胜负，首先取决于控制制海权。如萨拉米海战后，希腊方面取得了制海权，“波斯对希腊的优势从此解除了，雅典对海洋的控制权建立起来了，从那时起，希腊几乎再也不受波斯攻击了。”

亚历山大所以能东征波斯成功，也在于他从陆地上创造性解决了制海权问题。坚壁清野。大流士一世远征黑海北岸时，西徐亚人曾有效地使用了这一战略；亚历山大东征时，波斯雇佣的希腊将领迈农也曾建议“最好把部队转移，用骑兵践踏粮草，全部毁掉，放火焚烧地里庄稼，

甚至连城市也别留下，这样，到处没粮没草，亚历山大就无法在这一带立足”。此为弱国打击强敌的有效战略，可惜未被采纳。此外，战略后勤，耕战合一，移民戍边，政治、经济与国防一体化，以及取粮于敌等战略也被普遍运用。战术是指导战斗的方法。西方的“战术”一词，源于希腊文 *taktira*，意为寻求战机与布阵的艺术。古代中期，已出现了许多作战指导原则，如全正面进攻、诱退、集中兵力、合围等，但它们都通过“阵”实施。因此，当时所谓战术的发展，实质上就是作战队形的不断改进及其临战时的灵活运用，即阵的不断变革。在地中海区域，亚述是第一个设阵的国家，亚述方阵大体由盾牌手、弓箭手、两列长矛手共四列横队组成，曾横扫西亚与埃及。波斯军阵容庞大，但结构松散，它由近 50 个民族提供的各支队组成，各有战法，步调不一，易于被兵员虽寡却训练有素的军队击败，严格地说，它不能称为方阵。古希腊的方阵有了较大改进，斯巴达方阵、底比斯方阵及马其顿方阵均较著名，且各有特点：斯巴达方阵异常密集，其作战方式主要是全面进攻；底比斯方阵经伊巴密浓达改造，集兵力于左翼，构成打击重点，整个阵势呈斜形，故亦称斜形方阵；马其顿方阵由步、骑两兵种构成，步兵方阵各单位间无间隔，形成一个紧密的正面，像一堵墙似地向敌人进攻，两翼骑兵起保护作用，并实施反击，亚历山大设阵时，也往往集精锐骑兵于右翼，形成打击重点。罗马人发明了一套最完善的步兵战术，其方阵由枪兵、主力兵、后备队三线构成，故称三线军阵。其特点是构成各线的诸小单位（中队）具有机动性，受地形限制较小，且有强大的预备队，故比希腊方阵优越。中国和印度在本时期亦出现了十余种军阵，其中中国的鱼丽阵、魏舒方阵是名噪一时的战术。方阵的优点在于，其队形密集稳固，几乎无法从正面攻破，整个阵容犹如一堵布满长矛的墙，既能实施强有力的正面突击，又能有效地抗击敌人的冲锋。其弱点是受地形限制较大，缺乏机动性和灵活性。虽然如此，阵的出现是战术史上的一次飞跃，其意义在于，“智慧第一次站起来同蛮力斗争，而且成功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自从有了有组织的战斗队形，智慧登上了战争舞台后，战术才真正开始了它的人生旅途，在此之前，战术只不过是子宫里蠕动的胎儿。”

本时期海战技术与战术均较简单。腓尼基、希腊、迦太基、罗马都曾先后成为海上强国。但它们的战舰只是一种平底船，海上风暴对它们是致命威胁，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罗马舰队曾几次遭风暴袭击而葬身鱼腹。无罗盘针，唯一的向导是岸标和北极星。进攻手段单调，由于当时的武器不能作远程打击，因此海战只有两种可能的办法：一是冲击战，以船头坚硬的铁尖猛击敌舰的舷或尾，将其击沉或撞坏，此即所谓冲撞战术；二是舷并舷，紧靠敌舰，将其钩住，而后在甲板上展开步兵厮杀，即海上陆战。此作战方式在希腊称为跳帮战术，在罗马称接舷战术。“自从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迦太基的海上霸权后，古代史上就再也找不到具有丝毫研究价值的海战了，而罗马统治权的建立，很快就消除了以后在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29 页。

卢林：《战术史纲要》，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5 页。

地中海发生任何海战的可能。”

古代中期，人们已开始对战争经验进行总结和研究，出现了许多有关军事的著述和军事理论专著，如色诺芬的《长征记》、古印度的《政事论》，以及中国的《孙子兵法》等，均影响深远、名垂后世。军事思想取得了辉煌成就，奠定了后世军事学术的坚实基础。

二、古希腊城邦时代的军事

古代希腊的地理范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的诸岛屿、小亚细亚沿海地区、意大利南部以及西西里岛东部沿岸地带。公元前 8 世纪开始，希腊进入城邦时代，这一时代可分为古朴与古典两时期。古朴时代(公元前 8—前 6 世纪)初期，希腊半岛形成了许多城邦，继而向海外殖民，至公元前 6 世纪时，其殖民城邦已遍布地中海。众多城邦之中，雅典与斯巴达最为强大。自公元前 5 世纪始，希腊进入古典时代(公元前 5—前 4 世纪)。这一时代前期，新兴的希腊文明经受了波斯三次进攻的考验，经马拉松、萨拉米、普拉提亚等战役，希腊击败了波斯帝国的入侵。但由于雅典在战争中起了主导作用，威望大增，引起斯巴达的不满，故在古典后期，两国相互交兵。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 431—前 404)内耗了希腊实力，使希腊世界长期陷于动荡之中。

1. 希腊的兵制、装备与战术

(1) 兵制

希腊城邦有 200 多个，它们都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若干村落而形成的小国。所有城邦都实行共和政体，主要有两种类型，即以斯巴达为典型的贵族政治和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政治。政体的不同，常常影响各邦之间的团结，并因此形成了两个地区性同盟，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稍后的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雅典和斯巴达分别成为希腊世界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的大本营。希腊诸邦盛行公民兵制，两类不同政体城邦的兵制，我们可以斯巴达和雅典为例说明。斯巴达为贵族共和国，民分三等：斯巴达人是全权公民，终身当兵；皮里阿西人为无权自由民，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需纳税和服兵役；希洛特是奴隶，负责为斯巴达人耕种土地，战时充当斯巴达人的随军仆从，具有后勤兵的性质。由于民分三等，其军队也由三部分组成。斯巴达人是军队的主体，所有斯巴达人皆为兵员，其任务是训练与打仗，其职责是“征服或战死”，为终身职业兵。他们的婴儿一出生，即要受长老检查，健壮者始允许抚养，弱者则扔于山谷；男孩 7 岁开始集中训练，项目有竞走、格斗、拳击、掷铁饼、投标枪等，仅学少许文化课；18 岁接受正规军训，并参加暗杀有叛乱嫌疑的希洛特的秘密行动，以培养其机智与胆识；20 岁成为正式军人，直到 60 岁；服役期间，战时出征，平时驻于军营，集中训练，项目有体育、击剑、拳击、操练、跑步等。任何人不得私自回家或另开伙食，同时灌输英雄观念，要求士兵“不要怕敌人的军队，不要给恐惧所支配！让每一个人拿着战盾，站立在战士的前驱”；战时要比肩作战，“不要作可耻的逃亡”，“不要作懦夫的丑态”。斯巴达是一个实行军国主义的国家，斯巴达人极少自由，整个斯巴达城犹如一座大兵营。全体斯巴达人皆为重装步兵，构成其军队的核心。此外，还有轻装步兵，由皮里阿西人中的健壮者组成。希洛特人主要是为重装

提尔泰奥斯：《战歌进行曲》；转引自[苏]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65 页。

步兵服务，行军时为主人携带行装，作战时跟在主人身后，用棍棒击毙受伤之敌，救护受伤的主人。每一重装步兵配备 1 名以上的希洛特，最多时可达 7 名。军队最高首脑是两位国王。

雅典也实行公民兵制，但与斯巴达稍有不同。大约在公元前 7 世纪，雅典有 4 个部落，每一部落有 12 个区，区既是行政单位，也是军事组织。每区提供配备武装和船员的战舰一艘和两名骑兵。公元前 6 世纪末克利斯提尼改革，把阿提卡划为 10 个部落，每个部落要求提供步兵和骑兵各 1 队，以及配有船员和武装的 5 艘舰船。古典时代雅典的军队，大致如此构成。整个雅典 10 部落的海陆军，由 10 位将军统率，出征时，十将军轮流指挥，其中首席将军职位最高。雅典全体自由人皆为公民兵，公民兵诸兵种以财产多寡为基础，按梭伦改革（公元前 594）的规定：收入达 500 和 300 斗谷物者为第一、二等级，提供骑兵；收入 200 斗的为第三等级，提供重装步兵；收入少于 200 斗的为第四等级或无产者，提供轻装步兵或桨手。雅典青年至 18 岁，开始军训，一年后经检阅，领取武器，次年进行野战训练，此后服役到 60 岁。

兵民合一、装备与给养自备，这是古希腊兵制的共同点。不过，斯巴达的公民兵，给养及装备由希洛特提供，国家概不负责；而雅典，公民财产不均，并据此组成不同兵种，兵员、舰船、军费等以区和部落为单位向国家提供。雅典士兵战时出征，平时解甲归田，与斯巴达相比，军训方面显得松弛一些。至公元前 4 世纪，雇佣兵制日益流行，逐渐取代了公民兵制。

(2) 装备与战术

斯巴达战士的武装较重。进攻性兵器主要有铁矛和剑，防护性装备有嵌铜圆盾、铁头盔、金属胸甲、革制护胫。每人所带武装约达 30 余公斤。雅典重装步兵的装备，主要有短剑、2 米长的长矛和护身设备，护身之物与斯巴达相似，也有头盔、胸甲、护胫等，仅较斯巴达稍轻。由于武装过重，希腊的重装步兵一般有奴隶伴随出征。轻装步兵的武器有轻矛、标枪、弓箭。投枪可投出 20—60 米，箭的射程可达近 200 米。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出现了投掷兵，使用投掷武器如投石器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及其后的混战时期，攻城与城防器械获得了较大发展，攻城工具有破城锤、攻城吊车、火箭以及各类投石器；城防器械有吊梁、套索等；当时还发明了弩。希腊境内多山，骑兵无用武之地，故骑兵较少，其装备有长矛和轻盾。希腊骑兵很少用于战场，主要作用是侦察敌情。

希腊海军较为发达，尤以雅典为最。海军是雅典的骄傲，是其整个军事力量的支柱。公元前 5 世纪是雅典海军的极盛时期，时值希波战争（公元前 492—前 449）初，雅典用劳里昂银矿的收入组建了一支 200 艘舰船的舰队，至伯罗奔尼撒战争伊始，已达 300 余艘。雅典舰船分战舰与运输船两类，战舰亦称长舰，运输船供输送兵员、辎重之用。战舰主要是三列桨舰，也有少量五列桨舰。三列桨舰有桨手 170 名，上层 62 人，中、下层各 54 人，另加操纵帆的水手、舵手及重装步兵，全舰人员约 200 人。雅典舰队庞大，其修建与管理也较复杂。海军的一切事务最后决定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如决定年造舰只数量（一般为 20 艘）、造舰及修缮经费、何时出征及用舰多少等，然后交由五百人会议执行。

在雅典兴盛时期，五百人会议主要职司之一是执行造舰、修缮、检查出航舰船等事务。船场有专人管理，其职责主要是：掌管所有海军军器库；向舰长分发和收回船只及装备；将舰分为新、旧、好、坏几类，旧、坏者派人维修等。此外，还有负责检查舰只建造及维修质量的船坞长，以及警卫人员。

雅典海军是其决定性军种，故所造舰只较为坚固，舰头角包以黄铜，用以拦腰冲撞敌舰之舷。舰上还设有跳板，与敌舰接舷时将之搭上敌舰，供重装步兵冲过去进行肉搏。当时，希腊海军战术主要是冲撞与跳帮两种，并以后者为主，此战术实际上是作海上陆战，胜负取决于步兵的勇敢与力气。希腊步兵战术是方阵，以斯巴达方阵较为著名。重装步兵是斯巴达军队的核心，开始时有 5 个大队，公元前 5 世纪时增至 8 个。其编制大致是：64 人为一小队；两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128 人；两个中队组成一个大队，256 人；8 个中队即 4 个大队组成一个联队，1024 人。作战时，全部步兵组成一个密集的方阵。方阵纵深为 8 列横队，各横列间隔距离，行军时为 2 米，攻击时为 1 米，迎击时为 0.5 米；要求士兵协同进攻：“步伐合着步伐，战盾靠着战盾，羽饰混着羽饰，铁盔照着铁盔，肩膀靠紧肩膀，让每个人跟敌人厮杀，用手紧握着长矛，或者执着利剑”。投石手、标枪手、弓箭手等轻装步兵列于方阵之前，向敌阵射击，以打乱其阵列，当方阵进攻时，则退至方阵的两侧翼或后部。雅典步兵方阵与斯巴达方阵相近，但底比斯方阵略有不同，其纵深一般为 25 横列。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底比斯名将伊巴密浓达（约公元前 418—前 362）进行革新，创立斜形阵势，将打击重点放在左翼（以前是放在右翼或中央），其阵列纵深增至 50 横列，中央与右翼各为 8 列，所有士兵均持长矛。他依此战术，曾大破斯巴达军，开创了“底比斯强国”时期，深得恩格斯赞赏：伊巴密浓达“第一个创立了直到今天仍然解决几乎一切决战的伟大的战术原则，即不要沿正面平分兵力，而把兵力集中在决定性地段进行主攻。”此方阵奠定了马其顿方阵的基础。无论何种方阵，都是一个整体，它能发挥整体作战的威力，但也有因局部不适导致全阵紊乱、灵活性与动机性较差等弱点。

2. 希波战争

公元前 6 世纪末，希腊诸城邦形成初期，即受到来自东方的挑战。此时的波斯，经居鲁士（公元前 558—前 529）、大流士一世（公元前 522—前 486）的文治武功，已成为囊括西亚、北非的大帝国，正以强劲的势头西进。公元前 513 年，大流士一世集中战舰二三百艘、步兵 7 万，西渡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击西徐亚人（亦译斯基泰人），经一年战争，占领色雷斯、黑海海峡，降服马其顿，不仅从北面直接威胁希腊诸邦，而且断绝了希腊与其供粮基地黑海沿岸一带的联系。此事遂成为希波战争的远因。公元前 500 年，小亚细亚的米利都等希腊殖民城邦发生反抗波

堤尔泰奥斯：《战歌进行曲》；转引自[苏]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66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357 页。

斯的起义，雅典派 25 只战舰前往支援，波斯镇压起义后，即以此为借口，兵伐希腊。

(1) 波斯第一、二次远征希腊

公元前 492 年，大流士一世命其婿玛尔多纽斯为将，统兵首征希腊。此次进军，沿色雷斯海岸水陆并进。水师行至希腊东北部的阿托斯海角时，遭风暴袭击，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灭。“许多船舶被吹得撞到阿托斯山上面去了。……毁坏的船总数达 300 只，失踪者有 2 万余。”受此意外之灾，加之陆军不断受到色雷斯人的袭击，玛尔多纽斯只得撤兵东归。首征无功而返后，大流士积极备战，命地中海沿岸城市修造战舰，同时派员前往希腊索取表示降服的水与土。希腊北部多数城邦献了水、土，以示归顺，但雅典将其使臣抛入深渊，斯巴达则投之于井，让其“自取水土”。大流士闻讯大怒，于公元前 490 年派兵遣将，率 600 艘三列桨战船，从萨摩司出发，越爱琴海二征希腊。据统计，此次兵员约为步兵 2.5 万、骑兵 1000。其作战计划是攻克雅典、孤立斯巴达，进而征服全希腊。波斯军兵分两路，一路在马拉松登陆，这里地势平缓，利于骑兵行动，同时可诱雅典军北上；另一路在摧毁优卑亚岛北部的厄律特里亚、达到战略威慑的目的后，直攻雅典城东南郊的帕列隆，欲乘雅典精兵北上、城内空虚之际，与城中亲波斯的“第五纵队”里应外合，攻克雅典城。

雅典闻敌军兵临马拉松平原，一方面向斯巴达求援，同时以米太雅得为首的主战派征集了 1 万名铁甲长矛步兵，另加普拉提亚援军 1000 名，火速开往马拉松，布阵于其西部山麓，居高临下，以便于进攻和迂回。由于雅典十位将军战和不定，而波斯方面因其偷袭帕列隆的军队尚未就位，故相持 8 天无战事。第 9 日，雅典得知波军已攻陷厄律特里亚，很可能从海上直趋雅典城，始决定速战速决，以便回师守城。翌日晨，雅典军发动进攻，布阵如下：中央仅留数列厚度，增加两翼兵力，雅典精兵居右，普拉提亚重装步兵在左，全阵长约 1 公里，与波斯军阵正面相当。作战伊始，雅典军中部不敌而退，使整个阵势成凹形，而波方中央突出，成凸形。雅典军两翼乘机截击，直扑波军两侧，形成三面夹攻包围之势。波军挤在一起，秩序大乱，大败溃逃，雅典军乘胜追杀至海边，波军登船逃走，被俘 7 只战舰。波斯军队既兵败马拉松，待要从海上进攻雅典城时，又丧失战机，只得退兵回国。马拉松一役，据希罗多德记载，波军阵亡 6400 人，而雅典仅战死 192 人。在此战役中，波斯的战略与雅典的战术，皆令人景仰。但战争并未结束，而“只是一个伟大剧本的卓越的序幕而已”^①，这是希腊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凭借自己的力量击败波斯，增强了自信心，这一信心延续了三个世纪，在此期间，西方文化诞生了。故有的学者认为，马拉松战役是“欧洲诞生时的啼哭声”。

(2) 波斯第三次远征希腊

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419 页。

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台北军事译粹社 1976 年版，第 25 页。

战争的开始。大流士闻马拉松败北，十分恼怒，准备再战，命令一切城市“装备一支军队”、“提供远比以前为多的船只、马匹、粮饷和运输船。……亚细亚忙了整整三年”。但到第四年，埃及叛乱打乱了他的计划，正待征讨，却怀恨而死。薛西斯（公元前486—前465）继位并平定埃及后，秉其父志，着手三征希腊。为此作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如扩充兵员、建造舰只、筹集军粮等，并于进军沿途设立粮秣贮备站，以确保兵、马不受饥饿；同时在赫勒斯滂海峡以674条大船连成两座浮桥，供行军之用。从公元前484年至公元前481年，“他一直在整顿大军，准备出征所必需的一切”，至公元前480年，他亲率这支“过去的任何一支远征军都无法与它相比”的大军出发了。据希罗多德载，陆军总数为170万、骑兵9万、战舰1207艘，加上沿途增添的兵员，全军总数高达2641610人。此数字显然过于夸张，据估计可能为50万左右。此次进军，仍沿色雷斯海岸水陆并进，沿途征服了希腊北部诸邦，直趋南下。

在波斯备战的十年中，希腊也积极备战。一方面，富有卓识远见的雅典将军铁米斯托克利斯认识到海军的重要性，说服雅典人用银矿收入组建了一支200艘三列桨舰的舰队；另一方面，不愿臣服波斯的斯巴达、雅典等31个城邦也消除旧怨，在一致对外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于公元前481年组成了以斯巴达为首的联盟。但希腊联军在数量上仍处劣势，陆军11万、战舰400艘。由于双方均积极备战，致使第三次交锋显得异常激烈和艰苦。

温泉关战役。当波斯军队水陆并进时，希腊联军开始讨论防御计划及设防于何处，设防地点的选择，既要适合寡兵易守，又要使敌方无法利用其数量与骑兵的优势，故必须是隘口和狭窄海面。基于此，希腊联军决定派陆军防守中希腊的温泉关，派海军驻守优卑亚岛北端的阿特米西海角。陆军由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公元前490—前480年在位）率领，全军约七八千人，主力是300名斯巴达重装步兵；海军共324艘三列桨舰、9艘五十桨舰。两军相距不远，形成一道海陆防线。联军的作战计划是阻止波军从陆上南下，迫使其海军进攻，欲诱其进入阿提卡与优卑亚岛之间的欧波亚海峡，利用海面狭窄而歼灭之。波斯的计划是海陆同时进攻温泉关和欧波亚海峡北端入口处。双方海军对峙后，波斯派腓尼基舰队200艘绕过优卑亚岛，以期从该岛南端入口处进入海峡北上，南北夹击敌舰，不料行至该岛东南海面时，遭风暴袭击全沉海底。希腊方面得知敌方行动后，率先进攻。波方见敌仅乘少数战舰前来攻击，以为他们发了疯，自谓取胜如探囊取物，他们列成圆阵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敌人。希腊人将舰尾聚拢、舰头指向敌舰，呈辐形列阵，激战至夜幕降临，两方始罢兵，俘波斯战舰30艘。此后两日交兵，互有伤亡，胜负未分。

在海上大战之时，陆上战斗亦在激烈地进行。薛西斯兵抵温泉关，逞雄威4日，以期敌逃走，至第5日，见守军仍陈兵以待，始令进攻。最先进攻的是米底部队，结果死伤无计，败下阵来；另一些人继续攻击，

希罗多德：《历史》，第462页。

希罗多德：《历史》，第477页。

他们人数虽多，但顶事的却很少，大败而归；最后薛西斯令其精兵“不死队”上阵，由于地窄，而且矛短，亦无法取胜。斯巴达方面，以方阵迎敌，并使用较高明的战术，其中一种是转身佯败，引敌追进，再返身掩杀，杀敌无数。次日波军进攻，也毫无进展，正值薛西斯无计可施之时，一希腊叛徒告密，为波军指点了一条隐蔽的通道，致使波军一部迂回至希腊军背后，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当此之际，李奥尼达见难以坚守，便令联军大部撤回，自率 300 名斯巴达人、700 名特斯皮亚人和 400 名底比斯人断后，展开了猛烈的反击，激战中，李奥尼达阵亡，为争夺他的尸体，双方 4 次攻杀。战至最后，守军全部牺牲。希腊人为纪念此壮举，后来立碑，其一为“四千名伯罗奔尼撒人曾在这里，对三百万敌军奋战”；另一为“过客啊，去告诉拉凯戴孟人（即斯巴达人——笔者），我们遵从他们的命令，长眠于此”。波军虽夺关口，伤亡却达 2 万之众。希腊海军惊闻温泉关失守，已无再战必要，遂回守萨拉米湾。

萨拉米海战。波方占领温泉关后，立即挥师阿提卡。这时，希腊联军作了一个痛苦的决定，陆军放弃阿提卡，退至科林斯地峡筑垒防御；至于海军，斯巴达主张放弃萨拉米湾，将舰队开往科林斯地峡附近海面，以配合陆上防守。但雅典海军主将铁米司托克列斯极力主张在萨拉米决战，因为若在科林斯地峡海面决战，无异于在大海上与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舰作战，显然不利，而在海域狭窄的萨拉米湾，敌方将无法利用其数量优势。这样，他终于说服了联军统帅。但当波斯陆军攻陷雅典城并向科林斯地峡进攻时，海军内部又为设防地点而争吵不休，铁米司托克列斯为迫使他们就地作战，同时为诱敌进攻，便施诈降计，给薛西斯写信，诡称联军正向伯罗奔尼撒半岛撤退，如速来攻击，就能防其后撤，并趁其内部分歧而全歼之。薛西斯中计，未听取有人建议的或围而不攻、或直攻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良策，命舰队立即进军，派 200 舰迂回至萨拉米湾西端出口，防敌舰后撤，其余一字排开，断其东出之路。希腊海军突遭围困，别无选择，唯有一战。波斯海军进攻时，由于地狭船多，秩序大乱，直至希腊海军 378 只战舰井然开进时，仍未恢复。双方混战伊始，雅典舰坚且快，它们擦敌舰而过，先撞断其桨，使之无法操纵，尔后掉头撞击其中部，伤敌舰甚众。波斯战舰见势不妙，便向后退，而后面的船为表示勇敢，拼命向前冲，结果与逃回之舰撞在一起，乱成一团。

经七八个小时的奋斗，波方败退，沿途又不断遭到伏击。薛西斯惊闻惨败，恐希腊海军乘胜东击，断其归途，遂御驾回朝，仅留玛尔多纽斯率陆军 30 万退守希腊北部，以期卷土重来。是役，波方损失 300 余舰，希腊方面仅 40 艘。此战是希波战争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它使波斯丧失了制海权，希腊方面转守为攻。

普拉提亚战役与战争的结束。公元前 479 年春，玛尔多纽斯诱降雅典不成，便发兵南下。雅典人又一次全部撤到萨拉米湾的船上，同时向斯巴达求援。波军重占雅典城后，再次劝降。雅典 500 议员中有一位表示应该投降，结果被当场砸死；妇女们也自动行动起来，砸死了其妻儿老小。决战之心虽大，但斯巴达却迟迟不发援军。雅典在积极备战的同时，派人谴责斯巴达只求自保、不顾盟邦安危，若再不发兵，雅典将与波斯联合。斯巴达受此警告，始派步兵 1 万、希洛特轻装侍从队 3.5 万以及盟军前往救援。玛尔多纽斯闻希腊联军将至，又见阿提卡多山，

不利骑兵行动，遂火烧雅典城，兵退底比斯。希腊联军北上，至普拉提亚的阿索波司河南岸与敌隔河对阵。

据希罗多德记载，希腊联军重装步兵为 38700 人，轻装步兵 69500 人，加上各邦侍从队，共 11 万，列阵如下：斯巴达人在右，雅典人居左，中部为其他各邦军队。波军 30 万，也相应列阵，波斯人的精兵对斯巴达人，归降的希腊人对雅典军，其他各族军与希腊中部军相对。双方对峙数日，均不愿首开战端。至第 8 日，波斯骑兵擒获希腊输粮队 500 头牲畜；至第 11 日，玛尔多纽斯见敌方又有援军赶到，而自己方面军粮渐尽，始感不安。这时，其部下阿尔塔巴佐斯建议退守底比斯城，贿赂诸邦显贵，这既可避免“冒险交战”，又可使希腊人“交出他们的自由”，但玛尔多纽斯拒绝此“先见之明”，主张速战速决。次日破晓，即令骑兵先行进攻，捣毁了希腊军队的水源。希腊联军见粮道及水源受阻，便佯装退守普拉提亚。玛尔多纽斯见敌撤退，以为他们怯战而逃，即令全军渡河追击，他自率骑兵最先追上斯巴达人，用藤盾连成一道壁垒，射出雨点般的箭，使斯巴达人阵亡甚众。但他们转身反攻，冲破其藤盾壁垒，双方展开肉搏，“波斯军队抓住对方的长枪，并把它们折断了。波斯人虽然勇气可佳，但他们没有防护武装，训练不够，战斗技术也不如对手。”他们总是十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冲杀到斯巴达方阵中去，结果白白丧命。混战中，玛尔多纽斯阵亡了，波斯军队顿作鸟兽散。雅典军正待急救斯巴达人时，受到波军右翼的进攻，经一番苦战，击溃敌人，并乘胜反攻。当雅典军与斯巴达军开始追击逃敌时，希腊中部军尚未开战，及见敌逃奔，始列成两路纵队追杀，不料左队为波斯骑兵击败，阵亡 600 余人，这是此战中希腊方面的唯一灾难。

经此一战，波斯 30 万大军，除 4.3 万逃走或幸存外，余者悉被歼灭。希腊方面，阵亡约 1360 人。普拉提亚战役是希腊联军在陆上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标志着全面反攻的开始，它与萨拉米海战意义同样伟大，“在历史上，再没有比这两个会战更伟大的，它们好像是两根擎天柱，负起支持整个西方历史的责任。”

与此同时，希腊海军在小亚细亚的米卡尔海角，全歼逃亡于此的波斯残余舰队，彻底挫其反攻能力。公元前 478 年，雅典与爱琴海各岛及小亚细亚的希腊诸邦结成提洛同盟（或称雅典海上同盟），此后在雅典率领下，同盟舰队逐岛反攻。公元前 468 年，于小亚细亚南岸的攸里梅敦河口一战，大败波斯海陆军，俘敌 2000 人，全歼拥有 200 舰的腓尼基舰队。公元前 449 年，再破波斯海军于塞浦路斯岛附近。双方签订和约，波斯承认小亚细亚希腊诸邦独立，放弃对爱琴海和黑海一带的统治权。希波战争至此结束。

3. 伯罗奔尼撒战争

(1) 战争根源与双方意图

希腊人共同击败波斯后，分裂为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

希罗多德：《历史》，第 651 页。

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 51 页。

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雅典与斯巴达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一个陆上称雄，一个海上称霸，于是争端旋起。两国本来就存在着政治制度上的对立，今雅典崛起，打破了斯巴达独霸希腊的局面，斯巴达顿觉恐惧及不满。两国为争当霸主，相互攻讦，积怨渐深。同时，伯罗奔尼撒同盟与提洛同盟间在经济上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斯巴达的盟邦科林斯有强大的海军，控制着地中海西部的商道，在希波战争中，向爱琴海北岸扩张；而雅典在萨拉米海战后，失去了古老农业社会的性质，全面转向海上发展。海上贸易的竞争使这两国怨恨渐起。政治经济的冲突终于导致武力相见。战争的具体原因有三：其一，公元前 435 年，希腊西北部沿海城邦伊庇丹努的贵族派与民主派发生冲突，科西拉与科林斯素有积怨，他们各支持一派，并因此而诉诸武力，科西拉兵败，向雅典求助，雅典出兵迫使科林斯退却，后者便力促斯巴达参战。其二，波提狄亚本为科林斯属国，又参加了雅典的提洛同盟，科林斯与雅典交恶后，欲退出提洛同盟，雅典遂于公元前 432 年兵围该城。其三，墨加拉为斯巴达盟国，公元前 5 世纪开始与雅典接近，不久又重归伯罗奔尼撒同盟，雅典恶其反复无常，于公元前 432 年颁布“墨加拉法令”，禁止其商船进入提洛同盟诸国港口。这三件事迭继发生，终于引发一场为期 27 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 431—前 404）。

战争前夕，双方均分析敌我情况，提出自己的战略计划。公元前 432 年，伯罗奔尼撒同盟召开大会，表决是否对雅典宣战。会上，力促宣战的科林斯代表提出了其战略计划，“有许多理由，我们一定会胜利的：第一，我们在人数方面和军事经验方面，比他们占优势；第二，我们一心一意服从指挥。至于海军方面，他们虽然强些，但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同盟国现有人力和物力，……来建设我们的海军”，“利用高薪办法，吸引雅典海军中的外国雇佣水手”，同时“煽动他们的同盟国叛变——这是剥夺他们力量所在的资源的最好办法，或者我们可以在他们的领土内建筑要塞”。由此可知，其战略是利用陆军优势作陆上进攻，蚕食敌国领土，积极集资创建海军，同时瓦解雅典的盟国。此战略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会后，斯巴达向雅典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雅典从波提狄亚撤退、废除墨加拉法令等，并说“斯巴达希望和平，现在和平还是可能的，只要你们给予希腊人以自由”。雅典首席将军伯里克利（公元前 495—前 429）则在公民大会上反对作任何让步，并分析敌情：其一，敌方缺乏军费，“伯罗奔尼撒人自己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既无私人财产，也无公共财富”，由于贫穷，“他们不能经常配备一个舰队的海员，或经常从事陆上远征”，“金钱的缺乏会使他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其二，他们没有持久作战和海外作战的经验，因此，“我们无需惧怕他们在我们的领土上筑垒，也无需害怕他们的海军”，雅典可以放弃陆上作战，仅坚守雅典城，而利用海军扰乱其邻海地区，实施报复。此计划的基本内容就是陆上消极防御，海上积极进攻。

(2) “十年战争”

公元前 431 年 5 月，斯巴达率同盟军兵伐阿提卡，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初期，双方实力相当，各有千秋。支持雅典的提洛同盟有 300 余邦，主要是希腊北部国家，诸邦贡税年达 600 塔兰特；雅典本国还有 1 万塔兰特的银币和金银珠宝；军力方面，有 330 艘三列桨舰，1.3 万重装步兵，1.6 万城防军，1.2 万骑兵，步兵弓箭手 1600 人。斯巴达方面，盟国数目与雅典相当，主要分布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及地中海西部，其中西西里的叙拉古是斯巴达的供粮基地，此为后来雅典远征西西里的原因。斯巴达同盟的军力主要是陆军，各国出兵数为其总兵力的 2/3，首次入侵阿提卡的重装步兵即达 6 万，海军主要由科林斯、墨加拉等邦提供，战舰数量与雅典相当，但战斗力较差。

从战争爆发至公元前 421 年《尼西亚和约》的签订，为战争的第一阶段，史称“十年战争”，或以斯巴达王名称为“阿基达马斯战争”。自公元前 431 年到公元前 425 年，斯巴达率盟军每年出征一次阿提卡，为期 1 月至 40 天不等，破坏雅典农村，引诱雅典守军出战；雅典方面实行“坚壁清野、固守城垣”的战略，不求陆上反击，但派海军防守优卑亚岛、骚扰斯巴达的海岸，并伺机惩罚近邻的斯巴达盟国，双方战事均无大进展。但到公元前 425 年，战局发生了较大变化。是年 5 月，斯巴达军第 5 次蹂躏阿提卡半岛，而雅典则兵取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角的派娄斯，并派德谟斯提尼率 5 舰驻守。

派娄斯附近有一良港，且大部是天然要塞，易守难攻，雅典占领后，以之为据点鼓动斯巴达奴隶暴动。斯巴达军闻知，撤兵回援，用战舰封锁海港，步兵进占派娄斯南部的斯法克特利亚岛，从海陆两面反攻两日，却无进展。第 3 日，雅典 50 舰前来增援，驱散斯巴达舰队，使岛上的斯巴达陆军陷于孤立。斯巴达被迫求和，但雅典在克里昂（？—前 422 年，此时伯里克利已死于瘟疫）的鼓动下，不允求和，反而增兵，与德谟斯提尼一起进攻该岛。他们乘夜登陆并突破斯巴达人的警戒线，拂晓前，登陆军全部上岸，包括 70 余舰的水手，800 名弓箭手，800 名轻盾手，德谟斯提尼的原驻军 200 人及盟军，迅速占领制高点，包围了敌人。战斗中，雅典的轻装步兵以箭、标枪、石头、投掷器远攻，而不与之肉搏，他们很灵活，进退自若，使斯巴达无法发挥其步兵方阵的优势。斯巴达人不熟悉这种战术，大部受伤或战死，少部退至南端的小堡垒，坚守待援。但雅典出奇兵，从其后面攀岸而上，猝现于其后，斯巴达人被迫投降。是役持续 72 天，斯巴达损失惨重，仅被俘者即达 440 人。

此战后，斯巴达求和不得，遂决定进攻北希腊，以瓦解雅典的盟国。公元前 424 年夏，斯巴达名将伯拉西达（？—前 422）率军 2000，横穿中希腊，进入卡尔息狄亚半岛。12 月，兵围雅典的北方重要据点安菲玻里，该城向驻守色雷斯的修昔底德求援，修氏虽然即发救兵，但晚了一步，该城已被攻陷。伯拉西达以此为据点，鼓动雅典盟邦背叛，极有成效，附近诸邦先后叛离雅典。雅典深感不安，除迁怒修昔底德援救不力将其流放外，派克里昂率兵反攻。公元前 422 年，克里昂率舰 30 艘、重

重量单位，1 塔兰特约为 26 公斤。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117 页。

Thucydides（公元前 460—前 399），古希腊史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者。

装步兵 1200、骑兵 300 以及同盟军出发，9 月进抵安菲玻里城下。此时伯拉西达的军队有所增加，除拥有 1000 轻装步兵、2000 重装步兵、300 骑兵外，还雇佣了 1500 名色雷斯军、伊东尼亚的骑兵与轻盾兵，其战术是先示弱迷惑对方，然后趁敌不备，猝然开城，南北两路突然袭击。克里昂见敌增军，加之援军尚未到齐，不愿冒险开战，决定分兵两路向爱昂退却。但正面撤退的左路纪律松散，队形混乱，伯拉西达见有机可乘，遂率军从南北两门杀出，前后夹击之，歼其大部，余者溃逃；继而调头攻击其右路，双方冲杀猛烈，克里昂率先逃走，中途被杀，其士兵退守一个小山头，击退敌军三次攻势，最后斯巴达盟军的骑兵和轻盾兵将其包围，以标枪远距离投射，使之无法保持队形，大部分战死，少数逃往爱昂。是役，双方主将均战死，雅典阵亡 600 人，斯巴达仅 7 人。伯拉西达出其不意，全获大胜，修昔底德评论道：“那不是一场正式的剧烈战争，而是一个意外的惊慌事件。”此战后，双方均感精疲力竭，无力再战，遂于公元前 421 年 4 月签订了为期十年的《尼西亚和约》，规定互相交还战争中占领对方领土，互换战俘，联合镇压奴隶暴动，战争遂暂告一段落。

(3) 雅典远征西西里

远征的抉择。条约签订后，平静了六年零十个月，但双方除交换战俘外，其他条款并未执行，故在此期间，双方虽未交兵，积怨却更深了。克里昂死后，亚西比得（约公元前 450—前 404）担任雅典将军，他极有才干，却好大喜功，一上台就鼓吹重启战端，提出了远征西西里的计划。当时，西西里岛上的雅典盟邦厄基斯泰与斯巴达盟国叙拉古发生纠纷，厄基斯泰向雅典求援，并愿意负担所需的军费开支。公民大会上，老将尼西亚（？—前 413）反对出兵，因为出兵就意味着把斯巴达留在后方，造成两线作战的危险；而且西西里远离故国，即使征服了，也难以统治，因此，防止斯巴达进攻才是首务，而“不要卷入一场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战争中去”。青年将领亚西比得为捞取政治资本，竭力主张派兵，因为西西里诸城邦的人口混杂，没有爱国心，是乌合之众，他们不会联合行动，相反，他们多数都怨恨叙拉古人，愿意与雅典结盟，因此取胜实属轻而易举；至于斯巴达会乘机进攻雅典，这不成其为理由，因为无论雅典出兵与否，斯巴达都能这样做。因而，雅典应当出兵攻取西西里，这既可以得到大笔金钱，又可断绝斯巴达的粮源。在此鼓动下，一些人认为取胜很容易，一些人希望乘机看看远地风光和取得一些经验，还有一些人希望暂时得到薪给，因而对远征都很热情。只有极少数人虽不同意，但害怕戴上不爱国的帽子，只得默许。公民大会因此通过了远征决议。远征军出发前夕，雅典城内发生了捣毁“赫耳墨斯神像事件”。公元前 415 年 6 月，亚西比得、尼西亚、拉科斯率远征军扬帆启航，全军共 2.7 万人，有战舰 136 艘、重装步兵 5100 人、轻装步兵 1300 人、骑兵 30 人、运输船 130 艘，规模宏大，其装备之精良、齐全、华丽，皆属一流，以至在“其他希腊人看来，它好像是一次表现雅典力量和伟大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363 页。

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431—442 页，第 445—446 页。

的示威运动，而不像是出发进攻敌人的远征军”。但远征军刚到西西里，亚西比得因有破坏神像的嫌疑，被传令回国受审。他认为这是其政敌的阴谋，回国也难以辩解，故在归途中逃往斯巴达，和盘托出雅典的计划，并献策：斯巴达应马上支援西西里，派陆军长驻雅典北部的狄西里亚。此两策后来给雅典带来了致命打击。

首战告捷与兵围叙拉古。远征军至西西里后，并未立即围攻首敌叙拉古，而是采用外交手段，欲先征服其邻邦，以孤立之，但未见效果，始于初冬之际兵伐。雅典军设下埋伏，而后诱敌出战。叙拉古初见敌至，甚恐，及见其久不来攻，渐起轻敌之心，中计出击。两军列阵开战，雅典方面阵容为：雅典人居中，两翼为同盟军，前锋占全军人数之半，成 8 列纵深方阵，另一半列成空心四方阵，每边 8 排，以作后援；叙拉古方面，全部重装步兵列为 16 排方阵，1200 名骑兵居右；双方的轻装步兵列于阵前。首先开战的是轻装兵，互相投石射箭，接着军号响起，重装步兵开进对阵，双方都勇敢顽强，互不相让，但叙拉古军终因缺乏临战经验，加之大雨倾盆，雷电交加，恐怖感顿生，不久全军被截为两段，开始溃败，雅典军乘胜追击，为其骑兵击回。是役，叙拉古阵亡 260 人，雅典伤亡 50 人，首战告捷。

叙拉古败后，退守城池，总结了失败经验：缺乏纪律，战术生疏，下令的将军太多（15 位），以致造成混乱。于是作了三方面的准备：其一，把将军减少为 3 人，授其全权，利用冬季练兵，扩充兵员，加强纪律；其二，加强城防，于城外筑垒，扩大防守范围，并在敌舰可能登陆的海域钉立木桩；其三，向斯巴达与科林斯求援。雅典方面，也积极准备攻城：在陆上，从南到北修筑了一道包围该城的长墙；在海上，积极占领有利港口，并破坏其木桩设施。四面包围叙拉古近一年，未能攻克。公元前 414 年，吉利普斯率 700 名斯巴达援军赶到，联合其西西里盟军 2000 余人反攻，占领了雅典军的几处工事，从北部进入叙拉古城。与此同时，科林斯的 12 条战舰突入雅典防守的大港，从南端登岸入城。援军至后，叙拉古人经过两次战役，破坏了雅典军修筑的围困长墙，使其切断叙拉古陆上外援的计划落空。是年秋，尼西亚见形势不利，向国内递交了一份悲观的报告：现在被包围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船只腐烂，海员消耗殆尽却无从增补；每次为燃料、粮秣、饮水都得苦斗一番；而敌方正在酿成一个大同盟，援军不断开来。因此需要增援或者撤军。雅典不愿撤军，于 12 月派出第二批远征军的先锋队，共 10 舰，2000 人。

吉利普斯闻敌援军即至，从次年春始，先后两次攻击，第一次进攻虽然损失 7 只战舰，却夺取了敌方大港南端的陆上基地。第二次以 80 舰对敌方 75 舰，采用新战术：以特别坚硬的船头对撞，使雅典战舰损伤不少；更奏效的是乘小船钻到敌舰桨架下面，用标枪杀其桨手。这些战术十分成功地击溃了雅典舰队，击沉 7 只，赢得了海上主动权。自此，雅典军陆上海上均陷于被动。大港海战与远征军的覆灭。公元前 413 年 7 月，德谟斯提尼率第二批远征军赶到，共 73 舰，5000 重装步兵，3000

该神像是雅典人为商贾与旅行者的守护神赫耳墨斯（Hermes）雕塑的石像，立于街头巷尾作路标。破坏神像，被视为亵渎神灵，须受惩罚。据猜测，此事系亚西比得的政敌指使所为。它的发生对远征事业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 响。请参阅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6 卷第 2、5 章。

弓弩手、投石手和标枪队，共 1.5 万人，旋即在陆上展开一系列进攻，但遭到敌方的有效反击，故效果不佳。德谟斯提尼见未能取胜，便建议撤军回国。尼西亚因为叙拉古城内有人要出卖该城，故不同意。至 8 月底，当他同意撤军时，出现了月蚀，愚昧迷信的尼西亚认为此乃不祥之兆，决定过“三九”（27 天）之后再走。吉利普斯得悉这一自杀性计划后，以战舰进攻，击沉敌舰 18 艘，并乘胜用战舰和商船横锁在一起，封锁了港口，截断其回国之路。9 月 10 日，雅典终于决定从海上撤退，当时尚有 110 舰。封锁港口的叙拉古船舰有 76 只，中央为科林斯支队，两翼为斯巴达主力舰队，排成一新月形阵势。雅典首攻其中央，并击退之，正待通过防线，

被敌军两翼包围，展开混战。在修昔底德的眼中，此战十分激烈：双方的桨手们，当受命将船划往交战地点时，从不退缩；舵手们也表现出很高的技术，彼此互相竞争；由于海面狭窄，无回旋余地，故不能实施撞击战术；双方交织在一起，碰撞在一起，稍远时彼此用标枪、弓箭和投石器对射，接触时则马上展开肉搏，双方士兵均想杀到敌舰上去。结果，叙拉古大获全胜，仅损失 26 舰，而雅典则损失 50 舰。

海上突围不成，雅典军便决定从陆上向西撤退，4 万军队以空心方阵队形退却，重装步兵在外侧，辎重队和其他人员夹在中间，沿途不断遭到敌人骑兵和轻装步兵的袭击，行动十分缓慢，第一天仅走 7 公里，第二天只前进 3 公里，第三、四日，为敌所阻，遂转向而走，第五日，全军断粮，当夜尼西亚率领的前军与德谟斯提尼所率的后队失去联系。次日后队被敌包围，经苦斗，所余 6000 人投降。再次日，前队也被围歼，1000 余人投降。至此，雅典共派出的 4.5~5 万远征军，全军覆没。

雅典兵败西西里，是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修昔底德评论道：“这是这次战争中希腊人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照我看来，亦是希腊历史中我们所知的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对于胜利者说来，是最光荣的一次胜利；对于战败者说来，是最悲惨的一次失败，因为他们是全军覆灭；……是整个的毁灭，海军、陆军——一切都毁灭了。”雅典遭此重创，失其最精锐的军队和几乎全部舰队，海上优势丧失了，注定了其最后失败的命运。

(4) 雅典战败及其原因

公元前 413 年春，斯巴达采纳亚西比得的建议，出兵阿提卡，以狄西里亚为据点，长期占领，或侵入农村，或践踏土地，或行掠夺，使雅典人力物力损失惨重，不仅丧失全部乡村、羊群和役畜，且造成 2 万奴隶逃亡，并被迫在两个战场上作战。雅典财政遂陷危机，为筹集军费，剧增盟邦贡税。西西里惨败后，形势更加恶化，外则盟邦叛离，同盟解体，内则政局动荡，面临险境。雅典于公元前 412 年动用其最后储金一部分，修建了 150 只战舰，在亚西比得率领下，两次重创斯巴达舰队，形势得以稍缓。民主派乘此胜利，推翻了持续 2 年（公元前 411—前 410）的贵族寡头政治，重掌政权。公元前 407 年，亚西比得率 200 舰凯旋回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547—548 页，第 563—564 页。

当时，他因引诱斯巴达王之妻，事败，回国重任雅典海军将领。

国，当选为将军，但在不久的一次海战中，雅典损失 15 只战舰，此事本与他无关，却被解除职务，迫使他再次逃亡。公元前 406 年，斯巴达 140 艘舰再次击败雅典舰队，击沉 30 艘，并将其余 40 艘围困于密提林港内。雅典以其最后力量造 110 舰前往救援，与敌方 120 舰战于阿吉纽斯群岛附近，并大败之，击沉 70 舰，雅典仅损失 25 艘，迫使斯巴达求和，但这是雅典的最后一次胜利了。

公元前 405 年，斯巴达求和不得后，派名将来山得（？—前 395）率 200 余舰远征赫勒斯滂海峡，割断了雅典与其黑海粮源基地间的联系。雅典立即派科农（？—前 342）率 180 舰前往争夺，入海峡附近的羊河（直译伊哥波塔米河）河口抛锚，与驻扎于拉姆普萨卡斯的斯巴达舰队遥遥相对。一连四天，科农连连挑战，来山得列阵以待，却不应战，仅派船侦察敌情。这时，逃命在外的亚西比得赶到，向科农建议不要扎营于开阔的滩头，应移驻附近的西斯塔斯，那里有港口与城市庇护，攻守皆宜。但科农请他滚开，说自己知道怎样指挥。第五日，雅典照例出征，见敌仍不应战，便返回，大部分士兵弃船登岸，或闲逛，或在营房睡觉，或准备早餐。斯巴达侦察船见此情景，便发出进攻信号，来山得即令全部战舰全速驶向雅典驻地。科农见敌来攻，急令所有人员就位备战，一时岸上乱作一团，匆忙中，有的舰船仅有两排桨有人摇，有的只一排，有的一个也没有。只有科农的旗舰等 10 舰人员到位，以密集队形冲击重围，其余舰只均落入敌手，岸上的水手也几乎全部被俘。科农逃脱后，担心回国受审，遂率残舰投奔波斯，途中，“巴拉米号”舰返回雅典，带回全军覆没的噩号。是役，斯巴达俘敌 3000 余，获舰 170 艘，雅典军力丧失殆尽。这就是未经战斗的羊河战役。

羊河战役之后，来山得以 200 舰封锁了雅典，加上陆上围攻，雅典遂成孤城，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坚守 4 个月，于公元前 404 年 4 月投降，投降条件堪为苛刻：拆毁长垣和要塞、交还一切国外领土、交出全部战舰、服从斯巴达领导等。至此，伯罗奔尼撒战争告终。

雅典战败的原因主要是战略决策与资源保障的失调。伯里克利鉴于敌方陆军强盛，提出一个陆上防守、海上进攻的计划，看似明智，实则不然，弱点极为明显。他的所谓陆上防守，实质是放弃全部乡村，仅守雅典城弹丸之地，这样本国资源供应大受限制，绝大部分费用仅依赖盟国贡税，因而随着战争持久，只能一再增加盟国负担，从 600 塔兰特，到 1300 塔兰特，再增至 1460 塔兰特，致使盟国不满，同盟解体。这样，雅典既无内备，又失外援，失败难免。远征西西里，以截断斯巴达粮源供应，此策略本无可厚非，但宜速战速决，取胜后即回国以应变，方为上策。但远征军未攻首敌叙拉古，反而采取了孤立敌人的持久战略，妄图以政治战争取代战术作战，虚度光阴，致使敌方有时间加强城防，坚守待援。待斯巴达援军赶到，战事拖延甚久，雅典终于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犯了兵家大忌，及远征军覆灭，精锐丧于异域，失败命运已经注定。瘟疫的流行也给雅典带来意外大祸，几乎整个战争期间，雅典皆为瘟疫所苦，雅典人“像苍蝇一样死亡着，垂死者的身体互相堆积起来，半死的人在街上到处打滚”，夺去雅典 1/4 人口的生命，2.7 万名

重装步兵死亡即达 4400 余人，占 15%，围攻波拉提亚的 4000 名士兵，40 天内死去 1050 人。瘟疫给人口本来就少的雅典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此外，奴隶的逃亡、政局的动荡、作战指挥的愚蠢等，也是雅典兵败的原因。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斯巴达人自以为希腊的自由时代开始了，但经过长期内战，双方均精疲力竭，希腊的鼎盛时代已趋终结，此后长期处于衰弱与动荡之中，为后来居上的马其顿征服希腊开辟了道路。

4. 主要军事著作

(1) 《历史》

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 484—前 425）所著《历史》，又称《希波战争史》，全书共 9 卷。其主要内容是记述公元前 478 年以前希腊世界与西亚地区间的斗争与军事事件。前 4 卷主要叙述波斯诸国王的业绩：居鲁士的成长及其征服米底（公元前 550 年）与巴比伦（公元前 539 年）、冈比西远征埃及（公元前 525 年），大流士一世的崛起及对西徐亚人的远征（公元前 513 年）等；同时亦叙述了埃及、亚述、巴比伦、吕底亚、米底、波斯诸国的传说、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政治、军事等情况。在记录了这些大背景后，第 5—9 卷全面叙述希波战争的进程。可谓视野开阔、气势磅礴，但亦蔓枝遍地、随访随说，通过本人的游历观光，将所见所闻记录在册，收集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成为研究当时地中海周边各国军事史的珍贵史料，我们目前所知的希波战争，主要史料即来源于该书。但希罗多德只是一个绝好的记事能手，他非常轻信，常常夸大其词，如说波斯第三次出征希腊的兵员总数有 5283220 人，就当时物质条件而言，这显然是个天文数字。他只是就事论事，对事件的发生，往往满足于表面原因，而不愿深究，如他所记的希波战争原因是：希腊人从波斯人那里劫走了一个妇女，波斯人从希腊人那里劫走一个妇女，希腊人又从波斯人那里劫走一个妇女。这似乎是认为，如此一场空前的大战，只是为了争夺三个女人，显然滑稽之极。总之，作为史家，他过于轻信，作为军事史家，其笔下的战争史是一个接一个非常生动、却难辨真假的战例，全无战略观念。其功绩在于，他首次记载了他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政治军事事件，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2)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公元前 460—前 399）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书 8 卷。其主要内容是叙述公元前 5 世纪后期希腊的内部争雄，尤其是雅典与斯巴达的军事冲突。作者本人是这场战争的目击者，并曾任雅典十将军之一，领兵与斯巴达交过手，故所记全属可信。作为军事史家，他比希罗多德高明，不仅以时间为序描述了这场时断时续持续 27 年的大战，亦不只是一个战例的联结，而是夹叙夹议，适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代表了他的军事思想。他认识到了经济对军事的制约作用，认为国库不充实就无法支持长期战争，也不能维持一支舰队，特洛伊战事持久，不是由于“人的缺少，而是由于钱的缺少、给养的缺乏”，这迫使希腊联军不得不分兵耕种土地、进行抢劫，不能全军参战，

否则，战争不会相持十年。在讨论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也一再强调“金钱比军备更为重要，因为只有金钱才能使军备发生效力”。他强调军纪的重要性，“如果大军的军纪特别好，使整个军队的行动恰如一个人的行动一样，那是最好的事，也是最安全的事”；而轻视敌人、毫无纪律的军队虽多无用。他认为，不能因为军队的优势而放松警惕，“在战争中，许多事情是预料不到的，攻击往往发生于一时的冲动，在数字上占劣势的军队，常常因为小心翼翼，而击败了过于自信而疏忽警戒的优势敌人”，警惕高的军队，“才可能在进攻时勇敢精进，在防卫时持重可靠”。在战略战术上，他也零星地提出了一些看法：“战争，无疑地，不是那种依照一定的模型来作的事情；而是它常常造成自己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个人要使自己适合于变动中的局势”；为将者应了解敌人的弱点，“知道充分地利用自己的部队，不采用显明的为人所共知的方式，而采用最适合于实际形势的方式作战”，“凭着这种出奇制胜的方式”，“可以把敌人蒙蔽”，从而获胜；“伤害敌人的最妥当的方式是发现敌人无疑地最害怕的那种方式，然后利用这种方式向敌人进攻”。这些论述类似我国《孙子兵法》所说的“兵无常形、水无常势”，“避实击虚、出奇制胜”等战术。在讨论战争起源时，他不将之归于偶然因素，而是深究其近因与远因，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在分析战败原因时，也不像希罗多德那样轻率地归于神意，他认为雅典兵败是由于内部党争内耗了力量；他们同时要对付自己的敌人和自己的同盟者；以及远征西西里等战略上的失策。相较而言，他比希罗多德更重视战略问题，被视为西方历史上第一位探讨军事战略的史学家，他的著述也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军事著作，但不是军事理论著作。

(3) 色诺芬的军事理论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55）雅典人，是古希腊颇负盛名的作家和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反对雅典民主制，拥护贵族政体。曾参加希腊雇佣军帮助小居鲁士争夺其兄王位的远征（公元前401年），在远征失败后他率万余雇佣兵退回希腊的撤军途中，显示了将才。后期主要从事著述，他才华横溢，文采飞扬，被喻为“阿提卡的蜜蜂”。一生著有多种关于历史、经济、哲学、军事等方面的作品。从军事角度看，《经济论》、《雅典的收入》讨论了耕战及战备问题；《希腊史》确定了伊巴密浓达新型方阵战术的定义；《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对战略与战术的划分作了尝试；《为骑兵长官筹谋》、《为骑兵筹谋》论述了骑兵战术与骑兵司令的职责；《居鲁士传》广泛阐述了军事学，包括军队的组织、军训、教育、补充以及战术等基本理论。但最负盛名的还是他的回忆录《长征记》，或称《万人远征记》，该书被视为西方历史上第一部军事理论专著。

综合其军事思想是：主张耕战互依、耕战合一、耕战并重。他认为农业和战术是“两种最高尚最必要的事业”，农业是其他技艺之母，可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0、113、360、112—113、84、360、488、19页。

以增加财产、锻炼身体、造就精兵；而“如果没有人保卫土地，耕种多少亩土地都是没用的，……如果没有劳动者的帮助，即使是勇敢的军队也无法生活”。强调军纪的作用，“纪律保证安全，缺乏纪律一向是致败之源”，“没有秩序的军队是乌合之众”，“毫无用处，很容易为敌人俘虏”，“他们你妨碍我，我妨碍你，有的走有的跑，有的站有的停，战车撞马队，驴车撞战车，担夫撞骑兵”，互相践踏，怎么能行军打胜仗呢？如果诸兵种“一队一队排列着，整齐地跟在他们长官的后面”，就可以无敌不摧。两军交兵勇者胜，“在战争中，决定胜利的不是兵员的数目或力量，而是看双方哪一方的部队，皇天在上，具有更坚强的心气”，即士气是制胜之本；为将者，应当鼓舞士兵的事业心和进取心，应当有高尚的志气，“使士兵觉得他们有责任跟随他去赴汤蹈火”、“立功扬名”。在西方历史上，他可能是第一位提出“因粮于敌”战略的学者，认为“从敌方弄到给养”非常重要，而且“在战争时期，武装起来去寻找粮食，往往比用农具采集食粮更为可靠”。其《长征记》一书提出了许多具体战术的实际运用，诸如夺山取道，宜佯攻正面，侧翼取之；面对强敌，应善使阵法，横阵不克，纵队击之；遭敌而退时，应兵分两路，明队诱敌，暗队潜行等。

色诺芬堪称一位军事理论家、战略战术家，“他的独创和发明的天才对后来希腊兵法影响深远。这种影响一直传留到现代”，一位现代军事科学研究者写道，“在亚历山大以前，对我们最有教益的军人毫无疑问是色诺芬……。是他向世人指出退师的战术是怎样的，怎样指挥一支后卫部队。《长征记》所给我们的战术独创性胜过若干其他任何书籍……。经过了二十三个世纪，还没有比《长征记》更好的军事教程”。

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17、14、65、28、66、64—65、17—18页。

色诺芬：《长征记》，英译本序言，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三、亚历山大帝国的军事

正当希腊城邦陷于危机、内争不休时，地处北部边陲蛮荒之地的马其顿崛起。公元前4世纪中期，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在位）执政，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在底比斯方阵基础上，创造了马其顿方阵这一古代世界最为优秀的战术，随即争雄希腊，经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一战，大破希腊联军，“敲响了独立城邦的丧钟”，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翌年，腓力二世召开全希腊会议（仅斯巴达缺席），以解放所有在亚洲的希腊城邦为由，号召希腊各邦对波斯进行“神速而幸运的战斗”。但公元前336年秋，正当他准备东征时，在其女儿的婚礼上被刺杀。其子亚历山大继位（公元前336—前323），承希腊军事技术之利器，奋其父之事业，自公元前334年始，东征波斯，经格拉尼库、伊苏斯、高加米拉、海达斯皮斯四大战役，不仅消灭波斯帝国，还将战火烧到印度西北部，在东地中海世界建立了一个地跨三洲的大帝国，演出了希腊世界最为辉煌的一幕。

1. 马其顿的军制、装备与战术

马其顿实行君主专制政体，其兵役制虽有兵民合一的性质，却与希腊的公民兵制有所不同。在腓力二世时，已有一支步兵3万、骑兵3000的常备军，步兵基本由农民组成，骑兵由贵族充任。征兵以区为单位，每区为一军事单位，提供步兵1个小方阵（4093人）、骑兵1个连（64人）。全国据此划分为6个提供步兵的区和16个提供骑兵的区。

马其顿军队主要由步、骑两兵种构成。步兵主要用于拼杀肉搏，咬住敌人；骑兵是主要的冲击力量，常用于进攻敌人步兵的两翼或迂回包围，实行决定性的打击。在希腊历史上，雅典、斯巴达等邦曾有少量骑兵，但作用甚微，只有马其顿首次将之作为一正规兵种与首要的制胜力量。马其顿步兵分重装、轻装和中装三种。重装步兵又称方阵兵，是列阵的主力，其武器是短剑和16英尺长的长矛，防护装备有头盔与较大的盾牌；轻装步兵由贫农和附属部落（色雷斯人和伊利里亚人）提供，其兵器为弓箭、投石器和标枪，他们仍担当其传统职责：两军对阵时，列于阵前，作预备攻击；中装步兵由希腊轻盾步兵演变而来，雅典最早创建轻盾兵，公元前426年，其步兵方阵被埃托利亚的标枪队打败，于是训练了一支轻盾兵，他们受过快速作战训练，穿棉胎或皮质的短衣，持标枪、刀剑、小圆盾，曾于公元前390年一战全歼斯巴达1个联队，足见威力。马其顿继承了此兵种，持14英尺长矛，右臂带一轻型盾牌，着胫甲和皮袄，作战时布置于右翼骑兵与重装步兵方阵之间，起连结作用，这样，中间方阵就如一堵运动迟缓的墙，右边是一扇运动迅速的门，而轻盾兵则如一个铰链，十分重要，当整个阵势呈斜形进攻时，若无此铰链，骑兵与方阵间必然中断，予敌以可乘之机。此外，还有投矛兵等。

马其顿骑兵也分重装、中装、轻装三种。重装骑兵是主要打击力量，着盔甲，持长矛、佩长剑或弯刀，马有铁甲护头。中装骑兵的装备与战

[美]小戴维·佐克等：《简明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

法不详，可能是一种辅助性兵种；轻装骑兵的武器为弓箭、短矛、投枪，但无防护装备，战斗中起着保护方阵两翼与后部的作用。当时，骑兵无马镫、马掌，也无马鞍，只有马披或坐垫，但却是起决定作用的兵种。

至亚历山大东征时，除上述诸兵种外，还有攻城兵、工兵、医疗队以及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支后勤保障部队。其指挥系统亦较齐全，虽然所有战斗兵种和勤务部队悉由亚历山大亲自指挥，但却有一个参谋组织辅助他，其中有秘书、日记记录员、国王计划保管员、测量员、战史家、随军预言家等。故有的学者说，“亚历山大所继承的军队，是古代最精良的军队，是有史以来配备最齐全的军队”。在军事技术方面，当时已发明了用于攻城的投石器木塔和云梯，用于渡河的以兽皮装谷壳密缝而成的简便皮筏，以及穿透力极强、射程较远的弹弓等。至希腊化时代初期，军事技术有所进展，投射武器有弩，此为一种带机架的弓箭，箭长44—185厘米，重达1.5公斤，射程可达三四百米；还有一种能自动装箭的弩。炮有三种，能准确投射小型石核和标枪的弩炮；投射石块、石核或铅核的重投掷机械木炮；以及石弩。石核一般为3.5公斤，重者达70公斤，射程300—500米。攻城器械方面，主要有破城槌、攻城吊车以及体积大、能活动的攻城塔等。三列桨舰被四列桨、五列桨舰所取代，大的战舰上设有战斗塔，塔上有投射机械。

马其顿步、骑兵的主要战术是密集纵深的重装方阵，即马其顿方阵。大方阵由1.6万—1.8万人组成，纵深有8、10、12、16乃至24列不等，因敌因地而变化。至亚历山大时代，方阵有所改进，整个阵势由两个大方阵组成，人数在3万以上。一重装步兵方阵16384人，纵深16横列，每列1024人，正面长约1公里。方阵的组织较为严密，其基层单位是洛考斯，即方阵的1个纵列，16人，有一指挥官；16个洛考斯（16×16）组成一个小战术单位辛塔哥马，共256人；16个辛塔哥马组成1个小方阵（16×256），共4096人；4个小方阵组成1个大方阵（4×4096），共16384人。此为重装步兵方阵的组织结构。两个大方阵既可前后排列，也可左右排列。中装骑兵的最小单位是连，64人；8连为1营，512人；8个营组成1个大的中装骑兵团，共4096人。重装骑兵的组织可能与此相似，它们“在攻击时采用各种队形：横队，普通的长方形纵队，菱形或楔形纵队”。整个方阵的打击重点在右翼，由中装步兵、国王的骑卫队和步卫队，以及重装骑兵组成；中央是重装步兵方阵，左翼由轻装步兵与同盟者骑兵组成。大部分轻装步兵和轻装骑兵置于战线前方，负责打击敌方的战象或战车；有时布置一部分轻装步、骑兵于方阵之后，形成第二线，另一部分则保卫辎重和营垒。诸兵种配合成阵，更具机动性。

重装步兵方阵的前6排士兵平持长矛，后10排斜持长矛。进攻方向可按前后左右灵活更换，整个阵势也可因敌因地而变队形；如敌包抄，则拉长成凸形；如包抄敌人，则突出两翼成凹形；既可变为不封闭的楔形或箭头形，也可收缩成“盾牌挨盾牌”的高度密集形，用以突破敌阵。因其变化灵活，兼盾坚如铁墙，矛密似刺猬，故成为西方冷兵器时代最为成功的战术之一。

小戴维·佐克等：《简明战争史》，第1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页。

2. 亚历山大东征

(1) 东征的目的

希波战争在希腊世界与波斯帝国之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虽然此战后的百余年间，双方并未公开大战，但都伺机插手对方事务，如希腊内战期间，波斯以调停人的身份捞了不少好处，希腊雇佣兵也曾干预波斯王位之争，因此，对立情绪并未消除，反而越演越深。希腊久存报复之心，却始终为内争所苦，无力外伐。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征服希腊后，号召进攻西亚，于是成为希腊人心目中的复仇天使。但亚历山大东征，其目的不仅是夺取一个波斯帝国，且有其更庞大的计划，他有一句名言：“一个有志之士的奋斗是不应当划出一条什么界线的”，他是“把世界当做自己的家乡”，以征服世界为己任。这个世界没有边际，不只是西亚、非洲，也不只是印度、西欧，甚至连中国和英国也要囊括在内，他说，“把中国海岸作为希腊的天然边界，也是很可能的。这样一来，我的马其顿的强大与安全就将得到永久的保证”¹。关于他的野心，阿里安曾说，“即使在亚

洲之上再加上欧洲，把不列颠诸岛也并入欧洲，他还是不会满足。他永远要把目光投向远方，寻找那些他还未见过的东西。”²可见，亚历山大东征的原因，既出于希腊人报复波斯的传统心理，更是他追求名位、好大喜功、图谋主宰世界的雄心暴涨所致。亚历山大接受过系统的希腊教育，视野开阔、熟悉兵法，显示出早熟的特征。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一役，他年仅18岁，率左翼攻势凌厉，旗开得胜，初显将才。公元前336年，其父腓力二世遇刺身亡，希腊诸邦群起背离，他即位时虽未足20岁，却颇成熟老练，内肃贵族谋反，外伐属国叛乱，运用战略奇袭，所到之处，望风而降，经年余征战，重新平服四邻，随即继承其父遗愿，东征波斯。

(2) 格拉尼库战役

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率3万余步兵、5000余骑兵东渡今达达尼尔海峡，与波斯军队相遇于格拉尼库河。波军闻敌兵渡海峡，将领迈农鉴于敌势强劲，士气高亢，曾建议先避其锋芒，实行毁粮草、焚庄稼、破坏城市的坚壁清野策略，使敌军无法立足。但主将阿西提斯“决不允许自己人的房子有一间被烧”，欲逞匹夫之勇，率军防守格拉尼库河南岸，5月，与敌军夹河而阵：2万骑兵沿河列队，形成一个长方形，近2万步兵和雇佣兵居后，欲发挥其居高临下的优势；亚历山大方阵进攻，中央是步兵方阵，两翼为骑兵。号角吹起，亚历山大令部队与水流方向成斜角前进，以免波军一齐来攻。两军在南岸展开了一场骑兵大混战，“希腊人拼命要登上彼岸，波斯人则千方百计阻拦，波军标枪如滂沱大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86页，第225页。

[法]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9页。

¹ 亚历山大从斯塔基拉写给雅典贵族学校校长亚里士多德的信，见《译文》1957年第7期，第102~103页。

雨，铺天盖地；马其顿的长矛似万道金蛇，左刺右扎。”马其顿军首攻失利，幸好亚历山大亲自率骑兵杀到，双方再绞作一团，“鞍上人斗人，脚绊拳击；鞍下马战马，冲撞奔腾，酣战如狂，难解难分。”由于马其顿军“英勇顽强、纪律严格，也因为他们用的武器较好，是用坚固的山茱萸木制成的长矛，而波斯人使用的则是短标枪”¹，不久，波斯步、骑兵溃逃。马其顿军转而进攻外籍雇佣军，他们早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大祸吓得呆如木鸡，脚下生根，不知抵抗或逃跑，迅被包围，死伤大半，被俘 2000 余人。是役，亚历山大斗志骁勇，战折两条长枪，亲手斩杀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的女婿和另一名高级将领，自己的头盔也被砍掉一块，险些丧命，以损失 105 人的代价，取得了其四大名战中第一战的胜利。

(3) “从陆地上征服波斯舰队”

波斯虽然首战败北，但仍然拥有 400 艘战舰，包括最精锐的腓尼基舰队，控制着制海权。雇佣的希腊将领迈农被任命为波斯海军司令后，欲把战争引至马其顿与希腊地区，与“不习惯服从别人”的斯巴达联合，鼓动希腊叛乱，攻击亚历山大的后方。马其顿战舰仅 160 艘，根本不能与之相拼。鉴于此，亚历山大提出了“从陆上打击敌舰”的战略：利用陆军优势，占领地中海东岸沿海诸市诸港口，夺取波斯的海军基地，使之不能招募补充兵员，无立足之地，“也就等于打垮了他们的舰队”。为实施此战略，亚历山大打了几次硬仗。

哈利卡纳斯围攻战。亚历山大既决定先解决波斯水师，因而沿地中海东岸而下，不久攻克敌方水师重要基地米莱塔斯，进军哈利卡纳斯城，该城经迈农亲自经营，城防设施较为齐备，城内有大批驻军，港口有战舰驻守，且地势险要，故易守难攻。亚历山大兵至，离城千米扎营，然后着手攻城：先将 9 米深、18 米宽的护城河填平，安装擂石塔，发石弹攻打守军，并用擂石器轰击城墙。守军欲火烧擂石器与擂石塔，出城袭击，被马其顿卫队逐回，折兵 170 人，马其顿方面死 16 人，伤 300 余。数日后，两个马其顿士兵酒醉夸功，带武器私自攻城，守军杀了这对莽夫，乘势向马其顿军射箭投石，双方在城根激战，守军再次被击回，险失城池。

次日，亚历山大以擂石器继续攻城，守军居高临下，奋勇反击，全力向各擂石器的前卫队射箭投石，颇为得手，并发动一次反攻，烧了部分掩蔽屏障和一座木制擂石塔，但亚历山大一出现，他们立即扔掉火把和武器，逃回城里。再数日后，亚历山大再次攻城，守军倾巢而出，“有些人向攻城擂石器扔火把以及其他引火物，以便把火势尽量烧旺。但就近增援亚历山大的部队发动了猛烈反击，无数大卵石从塔上擂过去，弹丸如雨。敌军相当容易地就被击退，逃进城里”，伤亡惨重，有的死于肉搏；有的死于城墙缺口，因缺口太窄，退军众多而被挤死或追杀；还有的是通过护城河上的桥时，桥断掉入河中，被同伴踩死的或被射杀。最大的屠杀是在城门附近，守军担心追兵尾随败卒涌入城内，过早关上城门，致使门外守军悉尽被诛。此战，守军阵亡近千人，马其顿损失 40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 31—32 页，第 38 页。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 41 页。

人。

波军守将迈农见此惨景，加之部分城墙被攻塌，另一部分百孔千疮，难以久持，遂纵火烧城，撤兵而去。亚历山大率兵入城，将之夷为平地。此时已至初冬。

伊苏斯战役。公元前 333 年春，亚历山大继续南征叙利亚沿海地区。此时大流士三世（公元前 336 年—前 331 年）率军 60 万（真正数字不可考）御驾亲征，他原驻扎于前亚述境内的索契，那里平坦无垠，适合其大军及骑兵调度，但不久又听信谗言，挥师北上，驻扎在亚历山大背后的伊苏斯城，惨杀了留在该城的马其顿伤员。攻占此处虽然能切断敌军的后援供应线，但因地势狭窄，“他的骑兵不能发挥作用，而且他那数量上的优势和大批的标枪兵和弓箭手肯定不会有有用武之地”¹。

亚历山大闻知，便回师北征，并鼓励士兵说：敌军虽众却因地势狭窄而不利其活动，却有利于调度方阵；敌军久于安乐，我军则久经沙场；敌军是乌合之众，我军则英勇善战；最重要的是，这是自由人与奴隶间的大搏斗；因此，波军败局已定，若能打胜此仗，便可称霸亚洲。士气顿时高涨。是年秋，大流士闻敌将至，先派 3 万骑兵、2 万轻装步兵防守城郊的品那拉斯河，以便调配其他部队：将雇佣的 3 万希腊重装兵置于一线，对付马其顿步兵方阵；两翼各布置 6 万重装部队；在左翼的山边，面对敌军右翼，部署 2 万兵力，并将所有骑兵调到右翼。其他军队组成二线，但因纵深太长，起不了作用。亚历山大见敌骑兵几乎悉聚右翼，与自己的左翼相对，遂加强左翼骑兵兵力，中央是步兵方阵，他则亲率右翼。战争一开始，他立即领骑卫队从右翼杀出，猛扑河边，以雷霆万钧之势恫吓波军，同时尽快进入混战状态，以减少波方排箭造成的伤亡。两军短兵相接伊始，波军左翼即不支而后退；但由于亚历山大的行动，方阵向右摆，因而出现缺口，大流士的希腊雇佣军乘隙而入，双方交织在一起，波军竭力把马其顿军推到河里，但马其顿军“决不甘心落后一步，更不能叫他们的威望和那战无不胜的美名受到任何损失”，因而战斗异常激烈。不久，“希腊雇佣军被切断，被马其顿方阵像割草那样大批摞好此时，80 艘腓尼基战舰、120 只塞浦路斯舰船来降，亚历山大大大喜，命其歼敌海军。推罗舰队见敌舰甚众且阵容严整，遂决定避其锋芒，龟缩于南北两港，封住入口。亚历山大乘机加紧筑堤，并将擂石器置于其尽头，令舰上也安设擂石器，同时清除石堆，从四周一齐进攻。推罗人在城垛口处竖起木塔面对堤道，从塔中向外擂石射箭，用各种投掷物及火箭反击敌舰，但形势日趋危艰。推罗舰队见势不妙，便出港偷袭马其顿舰队，结果大败，绝大多数战舰失去战斗力，缩回港内不再妄动。亚历山大见时机成熟，从四周一齐进攻，三天后终于把南城墙轰垮一大段，马其顿军由此冲入城内。与此同时，舰队在南北两港均得手，全歼推罗舰船，攻克北港的塞浦路斯舰队从北部杀入，占领了该城北部。两面夹击，展开了一场大屠杀。马其顿军因久攻不下，加之推罗人曾在众目睽睽之下残杀战俘，故怒火万丈，“不论看到什么人都狠命砍杀，有八千提尔人（即推罗人）倒在血泊中”。马其顿方面约有 400 人阵亡。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 57—58、62 页。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 78 页。

攻克该城后，亚历山大将其 3 万居民卖为奴隶。至此，历时 8 个月之苦战结束。亚历山大攻陷推罗后，决定远征埃及。此时叙利亚、巴勒斯坦均称臣，唯加沙不服。该城地处高岗，城墙坚固，物资储备丰富，并有一支阿拉伯雇佣军助战，企图长期死守。亚历山大兵至，绕城筑了一道 360 米宽、250 英尺高的土岗，将擡石器置于其上，平射石弹攻打城墙，“把城墙轰得弹坑累累，面目全非”，又在一段城墙下打洞，使墙基下沉，最后坍塌；同时，地面部队也用石弹将城墙轰平一大片。守军伤亡虽然惨重，但仍顶住了三次进攻。此时，80 艘腓尼基战舰、120 只塞浦路斯舰船来降，亚历山大大喜，命其歼敌海军。推罗舰队见敌舰甚众且阵容严整，遂决定避其锋芒，龟缩于南北两港，封住入口。亚历山大乘机加紧筑堤，并将擡石器置于其尽头，令舰上也安设擡石器，同时清除石堆，从四周一齐进攻。

推罗人在城垛口处竖起木塔面对堤道，从塔中向外擡石射箭，用各种投掷物及火箭反击敌舰，但形势日趋危艰。推罗舰队见势不妙，便出港偷袭马其顿舰队，结果大败，绝大多数战舰失去战斗力，缩回港内不再妄动。亚历山大见时机成熟，从四周一齐进攻，三天后终于把南城墙轰垮一大段，马其顿军由此冲入城内。与此同时，舰队在南北两港均得手，全歼推罗舰船，攻克北港的塞浦路斯舰队从北部杀入，占领了该城北部。两面夹击，展开了一场大屠杀。马其顿军因久攻不下，加之推罗人曾在众目睽睽之下残杀战俘，故怒火万丈，“不论看到什么人都狠命砍杀，有八千提尔人（即推罗人）倒在血泊中”。马其顿方面约有 400 人阵亡。攻克该城后，亚历山大将其 3 万居民卖为奴隶。至此，历时 8 个月之苦战结束。

亚历山大攻陷推罗后，决定远征埃及。此时叙利亚、巴勒斯坦均称臣，唯加沙不服。该城地处高岗，城墙坚固，物资储备丰富，并有一支阿拉伯雇佣军助战，企图长期死守。亚历山大兵至，绕城筑了一道 360 米宽、250 英尺高的土岗，将擡石器置于其上，平射石弹攻打城墙，“把城墙轰得弹坑累累，面目全非”，又在一段城墙下打洞，使墙基下沉，最后坍塌；同时，地面部队也用石弹将城墙轰平一大片。守军伤亡虽然惨重，但仍顶住了三次进攻。第四次时，亚历山大调来方阵，四面搭云梯冲上城墙，据说：“马其顿战士纷纷向前，展开攻城大竞赛，个个都说自己从不怕死，一定要第一个登上城去”，不久，全军涌入。但加沙市民顽抗到底，结果全部被杀，幸存的孤儿寡妇被卖为奴隶，亚历山大把附近部族移居城内，将之作为战争要塞。为时 2 月的加沙战事结束。

不久，亚历山大从加沙出发，水旱两路向埃及齐头并进。埃及总督见大势已去，“就客客气气地迎接亚历山大进入埃及城乡各地”。亚历山大整顿了埃及政务，将之分为两个行省，并修建亚历山大里亚城作为海军基地。至此，经两年战争，亚历山大实现了从陆地上解决波斯水军的战略，后顾之忧既除，便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大流士了。

(4) 高加米拉大战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 78 页。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 81 页，第 83 页。

公元前 331 年春，亚历山大率军从孟菲斯出发，经推罗进入两河流域，9 月底，与波军相遇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高加米拉。“在西方世界的战史中，所有一切的决定性会战，这一战要算是最惊天动地的。”此时，大流士因数次求和不成，又征集步兵百万、骑兵 4 万、200 辆滚刀战车和少数战象（真正兵力不可考），以决一死战。他吸取伊苏斯战败教训，选战场于开阔平地，以利骑兵和战车活动。其阵势为：中央为大方阵，两翼为骑兵。左翼为西徐亚和巴克特利亚等族的骑兵，在前面，面对亚历山大亲率的右翼，布置了 100 辆战车；全军最中央是大流士及皇家卫队，卫队两边是希腊雇佣军和波斯部队，中军前面，面对马其顿步兵方阵的是象队和 50 辆战车；右翼为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米底等族骑兵，前面也有 50 辆战车。所有其他各族部队，以纵深队形组成第二线。由此观之，波军阵势实为三线，一线为象队和战车，二线为骑兵，三线为步兵。亚历山大兵至，休整 4 天，并亲自侦察地形与波军部署，作到知彼及熟悉地形。根据敌情，将全军布成一个“空心大方阵”：骑兵在右，方阵居中，左翼为步、骑兵混合部队；在第一线后，部署了一条后备线，由两个“快速纵队”组成，两翼后面各摆一队，其位置与正面形成一个角度，若敌人绕过两侧进攻，他们可以反击，若敌不来攻，则可向内移动，增强正面兵力。总兵力为步兵 4 万、骑兵 7000。

10 月 1 日晨，战斗开始。亚历山大领军右移，波军也相应移动，大流士唯恐敌军移到不平坦之地，使战车失去作用，便令左翼骑兵进攻，“亚历山大的人马大批倒地，这是因为波军占有数量上的压倒优势，也因为西徐亚的骑兵和马匹都有较好的护身甲”^{__}，但亚历山大亲率的右翼顶住了攻势，并实施反击，将其阵线突破。同时，在中央，波军出动战车，企图冲乱马其顿方阵，但方阵兵让开战车，骑兵和标枪手先以排箭和标枪扼其攻势，再一涌而上，砍杀车夫和战马，挫败了滚刀战车。接着，亚历山大率军以纵队向波军方阵进攻，严整坚实、长矛如林的马其顿方阵也随之逼来，“不一会，本已提心吊胆的大流士，这时看到四面八方已陷入险境”，于是故伎重演，“第一个拨转马头，溜之大吉”，中部波军亦随之溃逃。

在左翼，波军突破了马其顿的阵线，一直冲到其辎重营，幸得马其顿的左翼后备部队赶到，大批砍倒来敌，方转危为安。此时，右翼的马其顿军受到两面夹击，正在纵兵追赶大流士的亚历山大得到飞报，立即引兵杀回，展开了整个战役中最激烈的骑兵会战，波斯部队一中队一中队地成纵队摆开，与亚历山大的部队面对面地对撞。“双方都没有像一般骑兵会战那样投掷标枪和调动马匹，而是人人力图向前冲击，以冲破对方的一切阻扰，仿佛只有这样才是一条生路。因此，双方都毫不留情，拼命砍杀，各人不再是为别人打胜仗，而是为了自己的性命拼死拼活。”^{__}但亚历山大还是战胜了敌人，率全军追歼逃兵。此役，马其顿军歼敌 30 万，俘敌更多，俘获残存战象及战车^{__}。经此一战，亚历山大征服了半个波斯帝国。

战后，亚历山大兵进巴比伦，获大批珠宝；进而兵抵苏萨，该城总

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 95 页。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 97 页。

督献价值 12000000 英镑的金条；继而攻陷帕塞波利斯，火烧波斯皇宫；公元前 331 年冬，为追赶大流士，兵抵原米底首府埃克巴坦那，获总值 43785000 磅的黄金，但大流士又东窜了。次年 7 月，亚历山大终于赶上了大流士，但他已被心怀二志的巴克特利亚总督唆使皇家卫队杀害。此后三年，亚历山大不断用兵，收复波斯帝国东部，消灭了这个大国。公元前 327 年夏，他率领 3 万大军东征印度，所到皆取，次年，在印度西北部的海达斯皮斯河畔，与印度国王进行了其平生四大名战的最后一个、也是战术上最卓越的一战。此后，他仍欲东征，“可是马其顿人看出，他们国王所进行的事业，只不过是一个苦差事紧接着另一个苦差事，冒完一次险又冒另一次险，他们的情绪早已开始下降了，营地里三五成群地对他们的遭遇叫苦连天，……有些人甚至理直气壮地表示不干了”，加之瘟疫横行，大批士兵病倒，在此形势下，亚历山大只得撤兵西归。公元前 324 年，班师巴比伦，十年征战遂告结束。

3. 亚历山大取胜原因

亚历山大以十年武功，征服波斯，建立了一个地跨三洲的大帝国，“他的成就在人世间达到何等辉煌的程度，无论在希腊还是东方，还没有一个人有过这么多，这么惊人的业绩”¹，可谓战功赫赫。究其原因有二。

客观而言，他的主要对手波斯帝国，此时已经腐朽，政局不稳，内讧不休，属国常怀二心，故虽幅员辽阔，军队甚众，却运转不灵，仅存大国之表，而无帝国之实。诸被征服属邦，或乘机壮大己势，或相机拱手献城，不愿卖力。亚历山大兵至小亚，除格拉尼库一役，几无战事；在地中海东部沿岸，除推罗、加沙两城外，余者请降；埃及文明古国，也“客客气气”地迎入，苏萨“献城归顺”。兵不血刃，已连下半个帝国。大流士三世，身为国君，实为懦夫，无德无才，昏庸无能，两次御驾亲临，均率卒数十万，却不识地理，不明兵事，指挥无方，畏敌如虎，皆于酣战之际，率先怯逃，或“一跃上马，逃之夭夭”，或“拨转马头，溜之大吉”。属国不臣，君无将才，亡国当属必然。

主观而言，是亚历山大治军有方、指挥卓越、战略战术运用精妙之故。每次战役，亚历山大均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为此曾负伤累累，几次险些丧命，与士卒“苦累同受、祸患同当、福禄同享”；赏功将士，慷慨大方，凡立功者，一个不漏地论功行赏，以资鼓励，对声誉极佳、或勇于危难者，“额外发给各式各样的奖品或奖金，对有特殊英勇行为或巨大贡献的军官，还赐戴金冠”²；他熟识将士，对各级军官及勇猛之卒，均能道出名姓，夸其功勋，如数家珍；他体察军心，当战争休整时，让新婚者回家探亲。在宽厚待人、重赏功卒之时，亦严格要求：“每个人在遇到危险时要想到纪律；进军中需要安静要作到鸦雀无声；需要欢呼时要喊得响亮；必要的时候，要喊出惊天动地的杀声。每个人都要机敏地服从命令，还要机敏地向部下传送。每个人都要牢记：个人的疏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 98 页，第 185 页。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 259、28 页，第 187 页。

忽会造成全军的危险；个人的努力也有助于全体的成功。”由于身先士卒、深察军心、严格治军，故将士一心，乐于效命。

在战略上，亚历山大也极为出色。远征波斯，有陷于两线作战的危险，故远征之前，先除后顾之忧：兵扫西北、南服希腊。在进攻波斯途中，亦将消除后方祸乱作为首务，征服波斯西海岸，既使强大的波斯舰队无立锥之地，又使其不能与希腊本土怀二心者联合为患，可谓一举两得。待埃及请降，后患根除，方放手追敌，可谓用心良苦。在打击敌人方面，他注重分化瓦解、抚剿兼施：对主动归顺者，“以礼相待”，予以自由，如印度王波罗斯战败归降，他亲自迎接，将“原有王国的主权交还给他”；对希腊诸邦，也极有耐心，让降者自持其政体，并不强求接受君主制；他尊重别国信仰，如兵取埃及后，不惜劳足千里祭拜阿蒙神，他尊重妇女，不让士卒强行无礼，对犯令的人间禽兽，处以死刑；他不搞种族歧视，不以本族为贵，不以他族为贱，视善人为亲属，视恶人为蛮种。这种兼容并蓄的政策足以赢得敌国人心。另一方面，对顽固不降者，则坚决予以打击，对推罗、加沙等，尽屠其民，夷为平地；对首起叛乱的底比斯，进行了有如“报千年仇雪万年恨那样的大屠杀。”恩威并用，足以使降者不敢二心。

亚历山大临敌制胜，大半要归于马其顿方阵这一战术的灵活调度。此种方阵，实为以寡击众的优越战术，它变动自若，攻守皆宜。如亚历山大一次征讨马其顿北部叛军时，前后受阻，便令撤军，将方阵疏成 120 纵列，两翼各部署 200 骑兵。他先令骑兵直竖长矛，尔后把矛头朝前用冲锋状，并左右摆；方阵本身，在他调度下，步法矫健、军容严整，并向左右两翼交替回旋，在很短时间内演示了各种队形变换，然后令左翼突出一部呈尖山状进攻。敌军看到其部队调度灵活、纪律森严，早已目瞪口呆，不等对方靠近就逃走了。“闪电”战也是亚历山大常用战术之一，如征服中亚，就常常以这种长距离的穿插、包抄、快速前进的战术取胜，达到战略奇袭的目的，靠此战术，曾一次俘敌 4 万、牛 23 万余头，足见其效。

以上所述，皆为制胜利器，也足以证明亚历山大不失为千古名将。关于他的将才，阿里安曾归结如下：“他采取行动时英明果断，即使在昏暗迷茫中，也从不犹豫；情况明朗时，则更是目光炯炯，成竹在胸。对部队，从装备训练到调动指挥，都异常精明巧妙。他善于鼓励士气，使全军感到前途光明。遇有艰险则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一往无前。在胜负难分成败不定之际，他能当机立断，大胆行动。他能急中生智，掐算如神，常使敌人措手不及，束手就擒。他对敌人的阴谋诡计经常保持高度警惕，绝少陷入圈套。他言必信、行必果。他在金钱问题上，对自己一贯苛刻，对别人则十分大方。他的品德崇高，人世罕见。”所陈当属公允。

公元前 323 年 6 月，被誉为“西方名将第一人”的亚历山大英年早逝，年仅 33 岁，他所建立的大帝国也随之解体。但经过他的努力，东西两大文明接轨了，形成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即希腊化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 230 页，第 93 页。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 257 页。

时代（公元前 323—前 30）。这个时代的成果以及亚历山大的将才，是后人所无法忘记的。

四、古罗马共和国前期的军事

罗马最初为意大利半岛第伯河南岸一小城邦。约公元前 753 年罗马建城，进入王政时代（公元前 753—前 510），即军事民主制时期，在此期间，曾一度受到伊达拉里亚人的统治。至公元前 509 年，建立了奴隶制共和国。当时它处于许多民族的包围中，意大利北部的高卢人、中部的伊达拉里亚人和萨莫奈人不断威胁着它的生存。自公元前 5 世纪初始，罗马采用结盟战略，进行了一系列扩张：公元前 477—前 396 年，经三次维爱战争击败伊达拉里亚人，占领第伯河流域及其南岸大片土地；公元前 343 年—前 290 年，经三次萨莫奈战争与一次拉丁同盟战争，彻底打败反罗马同盟者及萨莫奈——高卢人联军，占据意大利中部；再经 5 年的皮洛士战争（公元前 280—前 275），征服南部意大利，终于统一了意大利半岛。自公元前 3 世纪中期始，它两度与北非强国迦太基角力，并将其击败，称雄西地中海，迈出了征服地中海世界的第一步。在攻伐过程中，罗马军制发生了较大变化。

1. 罗马军制与装备的嬗变

古罗马军制是典型的兵民合一制。在王政时代，亦即军事民主制时期，军队以胞族为基础。当时；罗马有 3 个部落，30 个胞族，每一胞族提供 100 名步兵、10 名骑兵，全军共步兵 3000，骑兵 300。步、骑兵各由 3 名军事指挥官指挥。其最大的战术单位是千人队，下分 10 个基本战术单位百人队，3 个千人队构成其整个步兵武装力量。骑兵也分为 3 个战术单位，分别以 3 个部落的名称命名。王政时代末，骑兵增加了一倍，约 600 人。当时的武器主要是青铜剑，有较长的劈砍型和较短的戳刺型两种。匕首因刃状不同而分为树叶形、三角形、短剑形三种，也是青铜质，铁制较少，长度从 25—44 厘米不等，刀柄木制、骨制或石制。投枪据矛头形状分为粗大型与纤细型两种，大者长达半米以上，小者仅 10 厘米。它们是后来罗马轻装兵所用长矛和投枪的原型。士兵有头盔、木盾，最早的木盾制作简单，以木板为骨架蒙上牛皮即成。至公元前 7 世纪，使用青铜盾，时值伊达拉里亚人统治，罗马人可能从他们那里学会了使用青铜盾与方阵战术。至公元前 6 世纪，青铜圆盾被椭圆形大盾取代。

公元前 6 世纪中期，罗马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激烈，出现塞维·图里乌斯（公元前 578—前 536 年在位）改革，居民依财产多寡划分为五个等级，各等级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标志国家形成。胞族兵制遂被公民兵制取代。全体罗马贵族与平民均为公民，亦均为士兵，服役年限为 17—60 岁，17—45 岁在野战军中服役，46—60 岁战时负责守卫后方。他们自筹武器，战后解甲归农。只有参加 20 次远征的步兵和 10 次远征的骑兵，方免除兵役。诸兵种的划分及装备情况与财产资格相关：第一等级中一部分组成骑兵，自备全套骑兵武装，其他第一等级者组成重装步兵，其进攻武器有矛、剑，防护武装有头盔、圆盾、胫甲、胸甲，皆铜制或皮制。第二、三等级为次重装步兵，装备与重装步兵相似，但无胸铠和铜盾，仅有圆形木盾。第四、五等级公民为轻装步兵，无衣甲，前者持一矛，后者持投石器或弓箭。

塞维还建立了“百人团会议”作为军事与行政领导组织，“百人团”是军事基层单位。第一等级有98个百人团，其中骑兵18个、步兵80个；二、三、四等级各为20个，第五等级30个，工匠与乐师各2个，无产者仅象征性地有1个，共193个百人团。每一个等级中，又按年龄分为青年百人团（17—45岁）和年长百人团（46—60岁）。百人团大会既是人民大会，又是战士会议，充分体现了当时罗马的兵民合一制。军团最高指挥官称“军团司令官”，由百人团大会任命，数目3—8人不等。

公元前509年，罗马进入共和时代。共和初期，百人团会议仍保持其军事性质，但军团最高长官为两位执政官，他们由百人团会议选出，任期一年，具有军事与民政权。作为军权代表，他们是军团总司令，负责征兵，补充兵员，任命部分军团司令（另一部人由百人团大会选出），领导军事行动。至公元前5世纪末4世纪初，在统一意大利的战争中，罗马统帅卡米路斯（公元前447—前365）实行了军制改革。首先，他抛弃了按财产资格划分兵种的办法，以年龄和战争经验来配置阵列，更有利于提高战术；其次，改进和统一武器装备，由国家统一供给部分给养和武器。重装步兵使用投矛和双刃短剑，矛长1.5—2米，重4—5公斤，可投30米远；剑长约半米，宽4—7厘米；持半圆形大盾，高1.25米，宽0.8米，木制、蒙以牛皮，用铁片镶边，中央衬以铁片；着铜盔、胫甲、胸甲，胸甲皮制，其上有一块铜制护心镜。轻装步兵武器有剑、弓箭、几支轻投枪、投石器等，其衣甲为皮制头盔和轻铠甲；投矛手持圆形或半圆形皮盾，直径约0.9米，投石手和弓箭手无盾。后备兵用长矛作战，衣甲与重装步兵相似。骑兵使用长矛和长剑，持皮盾，但无马甲。在近代著名罗马史专家蒙森（1817—1903）的心目中，罗马人在武器使用上极为高明：“重标枪与剑配合使用，其产生的作用与近代战争中使用火枪与刺刀是极为相似的。标枪的投掷用来为刀剑的肉搏作准备，正好像先射一排枪，再用刺刀冲锋一样。”

古罗马的军纪一向极严格，奖惩分明。对战功卓越者，予以各种奖励：或由百人团大会表彰或提职、多分战利品，或退役后赐以金钱和土地等，并授以奖章。对第一个攻入敌城、敌舰或敌军堡垒的勇士，奖以花冠，即最高奖励；为将者，若一战歼敌5000人以上，授以月桂冠，举行凯旋式，此为最高荣誉。重奖同时，也施重惩。身为士卒者，必依令而行，违者处死，如士兵站岗时睡觉，或以石砸死，或乱棍杀之。对临阵怯敌或逃兵，施以“什一抽杀律”，即将逃卒横排一列，每十人抽杀一人。对犯小过之卒，动辄施以鞭笞、降职、服苦役乃至剥夺公民权等处罚。严格的军法有效地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

2. 战术与兵力的变化

(1) 战术

罗马王政时代初期的战术，已不可考。至王政后期，希腊甲兵方阵战术传入，使罗马从军队组织到武器装备，以及战术的运用，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希腊的影响。当时，罗马军团采用大型方阵作战，每一方

阵由第一、二、三等级的 60 个百团构成，人数在 6000 左右，皆持长矛，纵深 8 横列，前 6 列为重装步兵，后两列为轻装步兵。四、五等级提供的轻装步兵配合方阵作战，其人数在 1200 左右。方阵两侧为骑兵，前面有轻装步兵的散兵线。整个阵势人数约为 8000。从战术角度看，这是一种步骑混编的密集作战队形，其战术基本点立足于“震荡冲击”，没有后备队，力量来自爱国主义和严格的军纪，由于队形较呆板，不适应起伏不平的地形，故常被萨莫奈人和高卢人所打败。但罗马人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实行了新的战术。

卡米路斯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军团制改革，它带来了战术上的更新。首先，它以年龄、受训程度及经验原则取代了根据财产资格配置战士的原则。重装步兵，亦即真正的军团部队，排成三线：第一线枪兵为最年轻的战士，第二线主力兵是有经验的壮年士兵，第三线后备兵是久经沙场的老兵。每线由 10 个中队组成。其次是小战术单位化，即中队，一军团由 30 个中队组成，但诸兵种中队编制不一。枪兵、主力兵每中队 120 人，后备兵每中队 60 人。每一中队为一小方阵，通常纵深 6 列，每列 20 人，两人间隔约 1.8 米，正面宽约 36 米；各中队间隔约 36 米。第二线各中队布于一线各中队间隙的后面，可向前填补空隙，也可向左右移动，加强一线纵深。第三线与二线间隔距离稍远一些，由 10 个中队组成，是整个方阵的决定性力量。通过这两点变化，使每个人的能力和经验可得到充分发挥，加强了机动性、灵活性。每一军团配有 1200 名轻装步兵，他们以户籍为标准，不依年龄分类，布阵时列于正面和两翼，成散开队形作战。每军团还有骑兵 300 名，分为 10 个小队，一般布于两翼侧。整个军团成阵，正面约 720 米。每一军团编制为：

枪兵.....十中队（各 120 人），共 1200 人

主力兵.....十中队（各 120 人），共 1200 人

后备兵.....十中队（各 60 人），共 600 人

轻装步兵...六十小队（每队 20 人），共 1200 人

骑兵.....十小队（各 30 人），共 300 人总计步兵 4200，骑兵 300。

但此数字不是绝对的，实际上军团兵员在 3000~6000 人之间波动。

军团成阵作战时，两翼和正面的轻装步兵最先开仗，掷标枪，然后撤退，枪兵进入战斗，每人先投两支重投枪，而后以剑拼杀；若被击败，则退入第二线各中队间的间隙处，与主力兵一起对敌；第二线发生危机时，决定性的后备兵始加入战斗。由此产生了罗马的一名谚语：“事情发展到后备兵了，”亦即说事陷险境了。

古罗马的三线方阵是西方冷兵器时代最为完善的战术，恩格斯曾予高度评价：“罗马军队提供了在尚不知如何使用火药的时代所发明的最完善的一套步兵战术。它保持重装步兵和密集编队的优势，还做到：各个小的单位具有机动性；能在起伏地上作战；依次配备成几线，一部分用于支援与替换，一部分用作强大的预备队，最后，采用了一种比斯巴达的训练方法目的性更明确的单个士兵的训练方法。因而罗马军队战胜了同他们作战的一切军队。”

扎营也是罗马战术的一个重要方面。营地有临时与经常两种，经常

性营地相当于今日的兵营；临时性营地主要用于行军或出征。宿营有严格规定：早晨开始行军，下午扎营，晚上休息；次晨，闻第一次号声士兵卷起帐篷，第二次号声收拾行装，第三次时开始行军或出征。扎营既能防敌偷袭，又可作为休整、出击或战败藏身的据点。对此战术蒙森曾评论道：“彻底的设防营地体系使罗马人在战争中，可以获得攻守合用之利。他们可以依照环境而决定接受会战，或是拒绝会战。而在接受会战时，他们可以在营寨防壁之下作战，正好像在城墙之下作战一样。”

罗马攻城技术和战术的进步直接受惠于希腊化时代。首先是破城锤（意即牡羊），这是一根很长的大木梁，头部包以铁片或青铜片，状如羊头，但也有尖状和圆状的。攻城时，或由数名士兵抬着直接撞击，或悬于木架，通过士兵推动猛闯。活动攻城塔底部有轮可以移动，下层装有破城锤，上面几层有投掷器和轻装战士，他们射箭或擲石以驱散守城之敌；最大的活动攻城塔还装有跳板，士兵可以从上面冲上敌墙。此外，攻城战术还有弩炮（发射标枪、石块或长箭）、挖地道、火攻等。其中火攻战术不仅用于攻城，也用于野战，如将麻片蘸油系于长竿之上点燃，对付大象。

(2) 兵力估算

罗马共和前期的兵力，各时期变动较大。王政时代的胞族兵为步兵 3000，骑兵 300，共 3300 人；塞维改革时，若依照其 193 个百人团计，兵力当近 2 万；卡米路斯军事改革时，正值统一意大利的战争，兵力有所增加，当时罗马公民兵共 4 个军团，每军团以 4200 人计，当有 16800 人；此外，每军团配有盟邦军队的 5000 步兵、900 骑兵，共 23600 人，故其总兵力约 4 万左右。在布匿战争时期，罗马兵力急剧增加，据波利比乌斯统计，第二次布匿战争前夕，罗马及其盟军总兵力为步兵 70 万、骑兵 7 万余，这个数字显然过于夸大。根据霍普金斯的研究，在公元前 225—前 23 年间，罗马军队的正常规模是：兵员总数为男性成年公民的 13%。当时罗马人口约 600 余万，除老、少、妇女外，成年男性约 200 万，故其公民兵约为 26 万，加上盟军（在公元前 200 年左右，盟国供兵力约为罗马兵力的 3/5），其总兵力约在 30—40 万左右。

3. 第一次布匿战争

(1) 战争起因

罗马征服意大利半岛后，雄心勃勃，转而南图，直指迦太基势力范围。此时迦太基已立国 500 余载，雄居北非，西括西班牙南部，北及撒丁尼亚、科加嘉、西西里诸岛，为西地中海霸国，海外贸易极为发达，财力丰厚，被视为当时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可谓国富兵强。该国农民极少，故公民兵不多，其主要陆军为职业雇佣兵，训练有素，若指挥有方，

蒙森：《罗马史》；转引自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 113 页。

波利比乌斯：《罗马史》，卷 2，24，见《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43 页。

估算根据见霍普金斯《征服者与奴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28 页。

不失为精兵劲旅。但他们是为利而战，相较之下，罗马公民兵及其盟军更具优势。不过迦太基的海上力量比罗马雄厚。战争初，罗马根本没有舰队，而迦太基则随时可动员三四百艘五十桨舰船，而且大船皆据希腊化的海上技术最新成就装备，航务人员也富有经验。迦太基既兵强马壮，绝不允许罗马染指其势力范围，两国交兵在所难免。早在公元前 275 年，伊皮鲁斯国王皮洛士兵败东归时，曾预言：“我给迦太基和罗马留下多好的一个战场啊！”可谓先见之明。

公元前 265 年，叙拉古王海龙二世兵围西西里的墨西拿城邦，城内居民分为两派，分别向罗马和迦太基求援，迦太基捷足先登，打败海龙二世，占领了墨西拿。罗马早存夺取西西里及其商业城市之心，因而对此极为不满。但要对强大的迦太基开战，元老院尚举棋不定，最终森杜里亚大会（即人民大会）通过了战争提案，从而导致了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一系列海外大战的第一次交锋，即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264—前 241）。

(2) 米里海战

公元前 264 年，罗马出兵西西里，与叙拉古联合作战，至公元前 262 年，占领了西西里大部。陆上虽然节节胜利，但迦太基利用其海军优势进行了有效地反击，这使罗马认识到，若无舰队，不能从根本上击败敌军，因而在公元前 261 年决然兴建海军，并很快组建了一支由 100 艘五帆船、20 艘三帆船构成的舰队。但其船体笨重不灵活、船员训练不足、缺乏海战经验，为弥补此不足以及发挥步兵优势，他们采用了新的海战技术即“乌鸦战术”：在船头安设“接舷小吊桥”，这是一条 18 英尺长的长板，以大枢为枢纽，长板前端设一铁钩，接近敌舰时，吊桥便搭到敌舰的甲板上，像乌鸦嘴那样咬住对方，使其无法逃走，而后步兵从桥上冲过去，打一场海上陆战。罗马之所以能大破迦太基海军，皆赖此战术。

公元前 260 年，两军相遇于墨西拿附近的米里海角。对此战经过，古希腊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约公元前 204—前 122）曾有记载：初见敌舰，迦太基人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缺乏海战经验而满怀蔑视，自谓取胜如囊中取物，130 艘战舰未排成战斗队形便向敌舰驶去，待看到所有敌舰前部都悬着吊板，感到莫名其妙。战斗一开始，双方战舰因吊板而联结在一起，罗马士兵冲上敌舰，在甲板上展开肉搏，“一部分迦太基人被杀死，另一部分人在惊恐中投降了敌人，因为海上的战斗好像是陆上的战斗了”。此役，罗马人以其新战术歼敌舰 50 艘，首次取得了海战胜利。公元前 257 年，罗马海军再败迦太基舰队于撒丁岛附近。自此，迦太基丧失了海上优势，退至西西里西部三个据点，依垒固守，战争陷于相持。罗马意识到在西西里难以速胜，遂决定开辟第二战场，进军非洲。

(3) 北非战役

小戴维·佐克等著：《简明战争史》，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9 页。

波利比乌斯：《罗马史》，卷 1，23；转引自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61—262 页。

公元前 256 年，由 330 舰组成的罗马舰队向非洲进发，全部人员约为 14 万，行至西西里西南岸时，遇迦太基舰队拦截。迦太基舰队共 350 艘，全部人员 15 万。两军战于埃克诺穆斯海角。罗马人把自己的战舰列成楔形，而以运输船为楔形之底部，他们很容易地突破了迦太基舰队的阵势，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敌舰。在这场搏斗中，罗马人再度使用了乌鸦战术，迦太基人的右翼逃脱，左翼被歼。此役是西方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战之一，罗马以 24 舰的代价，歼敌舰 100 艘，其中 30 余只被击沉，64 只被俘，取得了中部地中海的制海权。接着罗马军登陆北非，攻克了距迦太基城不远的克鲁佩阿，俘敌 2 万余人。由于给养困难，罗马元老院作了一个错误决定，仅留守 1.5 万步兵、500 骑兵、40 艘战舰，其余回师，从而削弱了远征军力量。迦太基乘此时机重新招募雇佣兵，以斯巴达名将克桑提波斯为帅。公元前 255 年春，克桑提波斯率 1.2 万步兵、4000 骑兵、100 头大象与罗马军战于巴格拉达河的平川，罗马军几乎全军覆灭，仅 2000 余人逃回克鲁佩阿。此时罗马派来一支增援队，闻此噩号，便不再进攻，仅接应残卒返国。不料归途中，遭风暴袭击，364 舰仅存 80 艘，2.5 万士兵丧命，出征非洲以惨败告终。

(4) 战争的结束

此后，战事再转入西西里。罗马新造舰只 220 艘，对迦太基在西西里的重要据点帕诺尔姆司（今帕列尔摩）发动水陆进攻，以奇袭战术将之攻克。但它的舰队再遭风暴，150 舰沉入海底。公元前 250 年，迦太基增援西西里，并带有战象，准备夺回帕诺尔姆司。罗马军陈兵战壕内，坚守不出，迦太基军忍耐不住，攻打罗马阵地。罗马人用箭和标枪击伤战象，使之受惊回奔，扰乱其军队，再趁机杀出，大败敌军。此战的意义在于，它驱散了罗马人在大象面前的恐怖情绪。但在海战中，罗马失利，损失 100 余舰。公元前 249 年，其舰队再遭风暴，120 舰全沉海底。

此时，罗马处境异常艰难，金钱耗尽，人力锐减。但迦太基也犯了一个战略错误，将注意力集中于非洲防务，而把西西里的防守重任交与雇佣兵。罗马元老院见有机可乘，向富豪借债集资，建造了一支 250 艘的舰队，于公元前 241 年奇袭迦太基驶向西西里的运粮船及护卫舰，击沉 120 艘。不久又于爱格提斯一战，俘敌舰 70 只，击沉 50 只，全获大胜，占领了整个西西里岛。至此，战争以迦太基失败而告终。双方和约规定：迦太基放弃西西里，无偿交还一切战俘，十年内赔款 3200 塔兰特。但是，第一次战争只不过是因西西里而引起的一次前哨战，下一阶段才是一场夺取地中海西部统治权的斗争。

4. 第二次布匿战争

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迦太基雇佣的士兵发生了一场为时 3 年的内战，双方手段均极其野蛮，波利比乌斯称之为“在战争史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战争中最残酷和充满了无法无天行动战争”。罗马乘此时机，兵取撒丁、科西嘉两岛，并占领了西班牙一部。迦太基平服内乱后，

为弥补在地中海中部的损失，派名将哈米尔卡（？—前 229）带兵出征西班牙，八九年内，在当地招募了 15 万军队，占领了西班牙大部。及其婿哈斯杜路巴尔（？—前 221）继任西班牙统帅，进一步扩张势力，并营建新迦太基城，以至引起罗马的干预，双方议定在西班牙以埃布罗河为界。依条约，萨干坦城本属于迦太基的势力范围，但它亲罗马，公元前 219 年，哈米尔卡之子，继任西班牙统帅的汉尼拔将之攻陷，次年，罗马以此为由宣战，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218—前 201）正式爆发。

（1）汉尼拔

罗马人原计划兵分两路，一路兵伐迦太基，一路进攻西班牙，以牵制汉尼拔，使其无法回救。但此计划为汉尼拔所打乱。汉尼拔（公元前 247—前 183）九岁随父出征，在征服西班牙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军事经验相当丰富。公元前 221 年，他继任西班牙统帅时，年仅 25 岁，却已是一个成熟，毅力和体力都十分旺盛的人，堪称帅才。古罗马史学家李维（公元前 59—公元 17）评论道：“他多么大胆，多么不怕危险，他在危险之中多么小心谨慎；没有一种劳动可以使他的身体感到疲乏或在精神上感到沮丧，他以同样的忍耐力来熬过酷暑与严寒，……人们常常看见他裹在军用斗篷里和站岗或是放哨的战士们睡在一起，他的衣着和他的同龄人毫无区别，只有从武器以及马匹上才可以认出他来；不拘是在骑兵中，还是在步兵中，他总是一马当先，第一个冲出去战斗，而在战后最后离开战场。”他是世界古代史上一位卓越的军事家。罗马宣战时，他已作好一切准备，并制订了战略。他认为，罗马只是暂时拼凑起来的强国，其盟国并不心悦诚服，只要他兵伐意大利，“帮助意大利人向罗马作战”，他们就会叛离罗马。同时，千里行军进攻罗马防守薄弱的意大利北部，既可联合当地高卢人，又可达到战略奇袭的目的，可以一举三得。在战术方面，汉尼拔也占有优势，他深知亚历山大使用骑兵所带来的兵法上的革新，而罗马却未注意到此点。

公元前 218 年四五月间，汉尼拔率 9 万步兵、1.2 万骑兵、37 头战象自新迦太基城出发，于 10 月雪天越过阿尔卑斯山，这是一次精心计划、熟知敌情、巧妙而勇敢的行动，但沿途损失重大，进入波河河谷时，仅剩 2 万步兵、6000 骑兵了。从当地高卢人补充队伍后，便向罗马进军。12 月，与罗马军步兵 3.6 万、骑兵 4000 相遇于特利比亚河畔，汉尼拔以步兵正面牵制、以骑兵侧面进攻，重创罗马军。次年春，他离开冬季营地，率军绕过罗马设防阵地，直扑罗马城，诱罗马执政官弗拉米尼（？—前 217）率师追击，4 月，于特拉西美诺湖畔埋伏，前后夹击，一举歼灭罗马军队 4 万人，弗拉米尼战死。此役，“汉尼拔作战计划的完美有效地打击了敌人的士气，并使它完全丧失了抵抗力。这个伟大的迦太基人的才智是个决定因素。”

（2）坎尼战役

面对一系列的军事灾难，罗马暂时将共和国交给一位能干的军事独

李维：《罗马史》，卷 21，4；转引自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 294—295 页。

小戴维·佐克等：《简明战争史》，第 20 页。

裁官费边（？—前 203）。费边看到汉尼拔孤军深入、后援不济、缺乏粮草等弱点，便率军尾随汉尼拔，不即不离，使其不能肆意妄为，却不与之决战，必要时不惜退出几个阵地，固守丘陵地带，使敌骑兵无用武之地。他说：“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和绝顶的天才军事家作战。”这一拖延战术既使罗马军团免受打击，又能消磨敌军军力及士气，诚属良策，但却使罗马乡村及盟国遭到大量破坏，罗马主战派呼声越来越高，认为拖延战术有损罗马尊严。公元前 216 年，愚蠢蛮干的特林提阿·瓦罗当选执政官，罗马人要求他速战速决，瓦罗当即表示：看到敌人的当天就结束战争。

汉尼拔了解瓦罗的脾气，更知道其大部分军队是仓促募集的，缺乏训练。所以他采用激将法，夺取坎尼并控制其周围麦田。坎尼为罗马重要粮仓，瓦罗决心全力夺回，为此投入 8 万步兵、9600 骑兵。布阵时，他为了集中兵力而牺牲灵活性，放弃中队队形而改用密集队形，中央是 70 列步兵，各列间有一小段距离，两翼为骑兵，欲以步兵的强力冲击，突破敌方阵线。针对瓦罗的战术，汉尼拔将 4 万步兵和 1.4 万骑兵也分作三个战列，步兵居中，骑兵置两翼，各拉得很长，整个阵势呈凸向敌军的半月形。他还知道当地中午时猛刮东风，故选阵地时，使自己军队背对风向。同时，在山谷中埋伏精兵，并安排了 500 名诈降兵。

8 月 2 日，双方布阵完毕，各自临战训话，鼓励士气，然后步兵们大声吼叫，弓箭手、投射手和投石手前进，战斗猛烈。汉尼拔带部分骑兵也加入战团，见冲不垮罗马阵势，便令诈降兵行动。这 500 人从队列中冲出，向罗马一方奔去，假装投降，罗马人缴其械后，置于后阵。接着，汉尼拔率大队伪装后溃，罗马中军追进，此时迦太基阵势成新月形，汉尼拔适时令两翼骑兵及山谷奇兵出击，此时正当午时，东风刮起，使罗马人睁不开眼，秩序大乱。500 诈降兵也抽出暗藏的短剑，从背后进攻，“他们从一个行列到另一个行列，不分青红皂白地乱击，因为他们站在行列后面，所以屠杀了很多人。”罗马人四面受围，叫嚣最凶的瓦罗率右翼首先溜走，左翼随之，只剩下中央约万余人坚持战斗，不久被歼。

坎尼之战始于上午八九点钟，结束于黄昏后 2 小时。据波利比乌斯记载，罗马骑兵仅逃脱 370 人，余者被歼，步兵 7 万被杀，1 万被俘，全军覆灭。迦太基方面仅损失 5700 人。汉尼拔于一天之中，采用了四个策略：利用风力、以兵诈降、伪装溃退和山谷奇兵，全获大胜，足以使此战役成为千古名战。坎尼之战虽以其辉煌战术而载入史册，但在战略上并不是一场决定性会战。

(3) 美陶鲁斯战役

坎尼之战后，汉尼拔仍施其既定的结盟战略，一时也收到效果，南部意大利各邦、西西里的叙拉古、中部的萨莫奈人和卡普亚城，以及北方的山南高卢，均纷纷背叛罗马，马其顿也与汉尼拔结盟，一个敌视罗马的包围圈似乎形成了。但罗马并未垮台，费边重掌军权，招募新军，

阿庇安：《罗马史》，上卷，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156 页。

阿庇安：《罗马史》，上卷，第 165 页。

波利比乌斯：《罗马史》；转引自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 123 页。

派军监视汉尼拔的行动；同时善待盟邦，促其忠诚，对背叛者严加打击，于公元前 213 年至公元前 211 年间，先后攻克卡加普亚和叙拉古，将之夷为平地，以杀一儆百，挫败了汉尼拔的战略。

此时，罗马在战火中，已培育出一位卓越的青年军事家，即小西匹阿（公元前 236—前 184）。他极有将才，依蒙森评价，他有一种特殊动人的魔力，“好像是一个闪耀发光的光圈一样”，他沉着冷静、待人热忱、精于算计、信心坚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追随着智慧的领导”，“有一种纯正先知者的本质”，“在行动上王者之风……他是一位优秀的军官和一个精炼的外交家”，深得人心。他善于学习，从汉尼拔那里不仅学到了战争艺术，也学会了治军本领。公元前 210 年，领兵出征西班牙，次年，乘敌军分散，突袭新迦太基城，普施仁政，很快得到西班牙的民心，站稳脚跟。

西班牙守将、汉尼拔之弟哈斯杜路巴尔（？—前 207）丢失西班牙后，应汉尼拔之请，领兵越阿尔卑斯山增援意大利。公元前 207 年春，兵抵波河流域，连同新募的高卢兵，共 4.8 万步兵、8000 骑兵，与罗马两个军团相持。哈斯杜路巴尔派人送信给汉尼拔，以期联合行动。此时汉尼拔尚在意大利南部宿营过冬，罗马执政官尼禄和弗拉卡斯率 4 万步兵、2500 骑兵专门监视他。尼禄因其部下截住了送信兵，知悉迦太基军的计划，便决定留弗拉卡斯继续监视，他本人则领 7000 精兵秘密火速北上，增援己方的两个军团。哈斯杜路巴尔见敌援军赶到，遂决定先避其锋芒，于尼禄到达当夜，兵退美陶鲁斯河谷，不料向导逃走，为寻找道路费了许多时间，终被罗马人发觉，全速追上，将之包围。哈斯杜路巴尔被迫决战，布阵如下：中央为利古里亚人，其前面有战象，西班牙人居右，高卢人居左。罗马方面，尼禄军对敌左翼，另两个军团分别与敌中、右军相对。首先冲锋的是西班牙人，接着利古里亚人也卷入战潮。西班牙人久经沙场，熟悉罗马战法，利古里亚人也是一个顽强好战的民族，攻杀激烈。此时，尼禄所率的右翼因地形影响，尚未交战，见左方战事剧烈，遂留少数兵力牵制敌之左翼，亲自率主力绕过己方两军团的后面，直袭敌军右翼，逼其向中军退却。哈斯杜路巴尔见败局已定，孤身杀入敌群，最后战死。是役，迦太基方面损失不下一万，罗马阵亡者约 2000。会战结束当夜，尼禄率军火速回师，6 天后回到汉尼拔前面的阵地。此时，汉尼拔尚不知悉此会战。

美陶鲁斯战役是罗马的一次空前大捷，它恢复了罗马人的信心，战争主动权开始转到罗马手中。汉尼拔方面，虽然他的大名仍令罗马人谈虎色变，但外援无望，西西里、西班牙尽失，结盟战略失败。至公元前 205 年，身陷意大利南端一隅之地，处境艰难，再无取胜希望。

（4）撒马战役

公元前 205 年，小西匹阿回到罗马，劝罗马出征非洲，以迫使迦太基召回汉尼拔。元老院采纳了此建议，任命他为远征将军。次年，他率领 52 艘战舰、400 只运输船和 2.5 万士兵在乌提卡附近登陆，通过外交手腕得到同盟者努米底亚人的支持，该族首领马西尼沙为他提供了几支

宝贵的骑兵。随即战于乌提卡城郊，他采用夜袭战术，歼敌 4 万，生俘 5000。不久，他在罗马历史上首次使用骑兵冲锋，大破迦太基和另一支努米底亚人组成的援军，使迦太基丧失了骑兵来源地与粮食供应地。迦太基情势危急，便决定求和，同时召汉尼拔回师。

公元前 203 年 6 月，汉尼拔率军登船回国，尚有 1.5~2 万士兵。他回国后，开始招募骑兵，这个行动使迦太基人精神大振，拒绝批准和约，并拘禁罗马使臣。翌年，小西匹阿诱使汉尼拔进入撒马会战。这是一片开阔地，迦太基人在此缺乏水源，而罗马则可利用其骑兵优势。汉尼拔见势不利，便请求和，小西匹阿拒绝，只得列阵开战。在素质和训练方面，汉尼拔军远处劣势，故布阵带有冒险性。当时他的部队由三部分组成：其嫡系远征军、迦太基城防军以及临时招募的非洲兵，前二者战斗力强，而后者则靠不住。因此，他将城防军置于最前线，配以利古里亚人和高卢人的辅助队；非洲兵为第二线，他自己率领总预备队，构成第三线。在一线前面，布置了 80 头大象。2000 骑兵置于两翼，迦太基人居右，努米底亚人居左；由于骑兵太少，他无法再施迂回至敌军的两侧翼的坎尼战术了。其计划的正面突破，这是一场赌博，成败关键在于大象队，如大象听话，则乱正面之敌，这既可使一线出击有利，又可使二线新兵士气顿增，最后，凭借第三线精兵作决定性打击。罗马方面，小西匹阿仍是传统的三线阵法，不过稍有改变，将第二、三线各中队与第一线各中队对齐，使方阵产生许多通道，以让敌方战象通过。他本人率老兵组成第四线。意大利骑兵居左，马西尼沙所率的努米底亚骑兵居右。

据波利比乌斯记载，会战由两方的努米底亚骑兵开始，同时汉尼拔命战象冲击，但由于受到罗马人号角齐鸣、惊天动地的惊吓，左翼大象调头后冲，致使己方的努米底亚骑兵大乱，马西尼沙乘机率骑冲击，很快将敌赶出战场，并开始追击。中央大象虽然冲进罗马方阵通道，却很快被制服。接着意大利骑兵击溃了迦太基骑兵，并猛烈追击。骑兵追出战场后，双方步兵开始短兵相接。最初，汉尼拔一方占了优势，但由于第二线未能支援，致使一线逐渐后退并终于向后逃跑，为了夺路，与第二线自相砍杀。罗马的一、二线兵相互配合，向前推进，紧逼着他们向第三线退却。由于汉尼拔的第三线拒绝让路，他们便绕过侧翼，落荒而逃。此时战场景象十分凄惨，尸骨堆山，血流遍野，小西匹阿命令清扫战场，以便作最后攻击。他将一线士兵撤到两翼，命二线与三线士兵以密集队形前进，与汉尼拔的第三线进行最激烈的苦战，由于双方数量、精神、勇气、兵器大体相当，故战事迟迟不决，双方都发挥出最大的勇气，奋力拼杀，互不相让。如果仅此相拼，汉尼拔尚有获胜希望，但在此紧要关头，马西尼沙追击逃卒的骑兵赶回战场，从后面冲锋，致使迦太基军彻底失败，汉尼拔率少数骑兵逃走。是役，罗马方面战死 1500 人，迦太基则在 2 万以上，还有同样多的人被俘。迦太基兵败投降，被迫订立和约：放弃非洲以外的全部领土，除保留 10 艘船舰外其余悉交罗马，50 年内赔款 1 万塔兰特，非经罗马允许不得与任何国家开战。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

撒马战役决定了西地中海的统治权，它使罗马人跨出了意大利的门槛，走上了支配整个地中海区域的通途。此后的 50 余年里，它不断东征，

两次马其顿战争的胜利使它获得了希腊的统治权；公元前 192—前 190 年发动的叙利亚战争使它夺取了小亚细亚和色雷斯，迈出了东侵西亚的步伐；至公元前 149 年，罗马鉴于迦太基的经济复苏，惧其东山再起，悍然发动了以强凌弱的“帝国主义战争”，即第三次布匿战争，经三年鏖战，彻底毁灭了迦太基。至此，罗马已成为东起小亚、西抵大西洋、横跨地中海的霸国。

5. 汉尼拔战略战术得失

汉尼拔率卒不及三万，面对十数倍于己之敌，纵横意大利半岛 16 载，所战皆捷，使罗马人闻风丧胆，这不能不归功于其战术天才。他善于学习，布阵之时，既发挥亚历山大骑兵的战术，也吸收了罗马军团方阵的优势，步骑协同，威力非常；他善于判断敌情，击其弱点；精密计算，有备无患；指挥灵活，善出奇谋；利用地形，出敌不意。这使他成为一位能够应付任何环境的将才。波利比乌斯评论道：“对于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所遇到的一切命运，不管是好是坏，其起因只能是汉尼拔这一个人和他的一颗心。这个人的影响是太巨大，简直是惊人，他的心可以适合于一切人力范围内的任何工作。”蒙森也认为，“他喜欢采取偏僻和出人意料的路线，埋伏阻击和所有的一切计谋对于他都是家常便饭。他对于对方的性格，喜欢作极谨慎的研究，这也是前无古人的。他组成了一个当代无双的谍报系统——甚至于在罗马城内，他也经常派有侦探——所以他对于敌人的一切计划，都能经常获得情报。他本人也常常化装和戴着假发，亲自去搜集情报。在这个时代的历史书中，几乎每一页都可以证明他的军事和政治天才。”另一方面，罗马战争观念的呆板、机械，也使他的天才得以发挥尽致。罗马在统一意大利、与蛮族作战的过程中，取胜全赖罗马方阵这一卓越战术，纯粹依赖士兵的勇气、纪律和训练，至于将道，则聊胜于无。他们的统帅，不要求经验、能力、熟识地形、指挥灵活等将才，只需善于调换一些战斗队形即可。这种军事教员式的将领显然不是长于兵事的汉尼拔的对手。

汉尼拔是一位天才的战术家，这无可非议，但他不是一位卓越的战略家。汉尼拔制胜战略，在于瓦解罗马盟邦，在其四周联成一个敌视罗马的包围圈，迫使罗马投降。此本为良策，无可厚非。但也有不周之处，此策的立足点，在于盟国对罗马不忠，他以为，自己大军一到，敌盟便会自然解体，这本身就有主观臆断之嫌。况任何良策，皆宜因敌而设，顺势而变，不可固持一谋。坎尼之战后，此策虽有成效，但罗马的拉丁盟邦却无一叛离者，当此之际，汉尼拔就应当认识到，罗马联盟的力量首在罗马城，应当率兵攻陷之，如罗马城破，其盟国定不战自降。但他仍固守旧策，几度兵临城下而不攻，坐视罗马摆脱困境，恢复军力，诚如李维所论：“这个时间上的延误，已经挽救了这个城市和这个帝国。”

时间分别在公元前 200—前 197 年、公元前 171—前 168 年。

波利比乌斯：《罗马史》；转引自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 123 页。

蒙森：《罗马史》；转引自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 124 页。

直至西班牙、西西里、卡普亚尽失，方幡然悔悟，却为时已晚。待小西匹阿远征非洲成功，无奈引兵回国，致使纵横 16 载，终究劳而无功。撒马一战，敌方占有一切优势，败北亡命，非个人之力所能挽回，遂成为千古憾事。

有的学者以为，汉尼拔所以不攻罗马城，是“非不为也，乃不能矣”，谓其无攻城之器，亦无攻城之卒。此论似不够全面，汉尼拔军确无攻城战具，但坎尼一战，罗马瘫痪，无力监视其行动，此时他声势大振，势如日当中天，完全有时间有能力赖盟国之力，修攻城之具，训攻城之兵，但他一味墨守旧策，不思改更。由此观之，汉尼拔之功，成于其战术运用之精妙娴熟；汉尼拔之败，首在固持一策，不能顺势变通。因此，我们可以称他为天才的战术家、军事奇才，却不可视其为战略大家。

五、亚述军事帝国

亚述人是西亚塞姆语系的一支，约于公元前三千年代中后期，在两河流域北部以亚述城为中心建立国家，实行贵族寡头政体，尔后过渡到君主制。该国延续二千余年，在与周边各国抗衡中，曾两度中兴，但旋即衰落，至公元前9世纪，始以强国姿态步入帝国时代（公元前9—前7世纪）。亚述纳西帕尔二世（公元前883—前859）与沙尔马纳塞尔（公元前858—前824）父子可称帝国初期有为之君，在开疆拓土方面战功赫赫，但很快处于守势。“中兴之主”为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公元前745—前727），他改革军事，再起争霸，将帝国带入极盛时代。其后，沙尔马纳塞尔五世（公元前727—前722）、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1—前705）、辛那赫里布（公元前704—前681）、阿萨尔哈东（公元前680—前669）、亚述巴尼拔（公元前668—前631）均以征服他国、镇压叛乱为务，西占叙利亚、埃及，北击乌拉尔图，南取巴比伦，东占埃兰，使帝国版图囊括西亚、北非，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军事帝国”，并维持鼎盛态势达百余年之久。亚述的鼎盛与其优越的军事制度密不可分。

1. 亚述的兵制

亚述人是一个好战的民族，这是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帝国初期，亚述实行民兵制，全体亚述成年男子，皆为战士，平时放牧、耕地，战时自带武器，应召出征。随着亚述的不断扩张，需要一支训练有素并能常年作战的军队，因而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进行了兵制改革，采用募兵制组建了一支常备军。每一地区的首长在其辖区自由民中募兵，他本人担任统帅，常备军的装备与给养由国家供应，是军队的核心，也称“王室兵团”。在国家危急之时，根据需要征集民兵参战。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亦从被征服和被并入亚述的国家或部族中征兵，如辛那赫里布曾把俘虏中的1万名弓箭手和1万名盾牌手编入军队，亚述巴尼拔也从被征服地区的射手、盾牌手、手工业者及铁匠中补充兵员。国王有专门保护自己的扈卫队。

亚述素以兵种齐全著称，有车兵、骑兵、步兵、工兵四种。车兵出现于公元前9世纪，由贵族充任，在帝国前期，备受重视。战车有两种类型，萨尔贡二世以前的战车车身矮且短，轮有6辐，车厢前部为圆形；晚期的战车较高大，几乎与马背平齐，车厢呈正方形。战车木制、单辕、两马牵引。一乘人员为2—4人不等，若2人同乘，则一人驭马，一人应战；若3人同乘，则一人为卫士，左手持盾保护甲士，右手持枪或剑击退近敌；国王及显贵的战车，一般4人同乘，一人驭马，另2人持盾护卫。战车兵的武器有用于远射的弓箭和用于近攻的长枪和短剑，其衣甲是一件缀满金属片的外罩，长达膝部；头盔以金属鳞片制成，呈尖状。帝国中期以降，战车兵的优势逐渐被骑兵取代。

骑兵首次出现于公元前9世纪，其发展亦以萨尔贡二世为界分为两时期。前期骑兵无马鞍，主要兵器是弓箭与佩剑，持盾，作战时一般成对行动，一名弓箭手配备一名伙友，伙友为弓箭手操纵缰绳，以便骑兵

自由射箭，无兵器。弓箭手着尖顶头盔，身穿嵌花边的紧身衣。后期骑兵已有马鞍，但只是一块方形的布或皮革，无马蹬，马鞍使骑手活动自如，无需伙友揽缰即可独立作战；装束也有改进，正规骑兵穿紧身衣，腰部以下渐宽，后襟短，前襟长，腰扎宽带，下身穿紧身裤，足登靴子，并有护胫。这一时期的骑兵因使用兵器不同而分为弓箭手和长矛手两类，弓长不足 4 英尺，箭长不过 3 英尺，都有佩剑。“骑兵在亚述军队中所占比例最小，但技术训练最严，装备最好，贵族将士均骑马奔赴战场。”

虽然车兵和骑兵冲杀力强、机动灵活，但步兵是战场拼杀的主力。各个时期步兵的种类不一。萨尔贡二世以前，步兵分为三种：弓箭手的弓长约 4 英尺，箭长 3 英尺余，作战时两兵配合，一人射箭，一人持盾掩护，射箭时两人一般均用单膝跪势；剑手一手持短剑或匕首，一手操金属盾或柳条盾；矛手持不足 5 英尺的短矛，也有盾牌。各类步兵衣甲相似，身穿铁片铠甲，腰束护腰，头顶铜盔或铁盔，臀部以下全裸。萨尔贡统治时期，将步兵归为弓箭手与矛手两类，而将剑手变为国王的卫兵。弓箭手又分为三类：轻弓箭手无头盔和盾牌，全身只着一件紧身短裤，射箭采用立射与跪射两种姿势；次重弓箭手和重弓箭手衣甲与前期相似，作战时有伙友持盾保护，不过前者射箭采用跪势，后者采用立射；此外，重弓箭手的袍子较长，达于脚面，盾也较大，有一人高。矛手着鸟冠状头盔，右手持 4—6 英尺长的矛，左手持圆盾。至辛那赫里布时代，弓箭手分为四等：重弓箭手头顶尖顶头盔，身披锁子甲和无袖披肩，有一二名伙友持盾掩护；次重弓箭手衣甲与前者相似，两人一组，无伙友保护；轻弓箭手与次轻弓箭手无头盔，着紧身衣，围短裙，后者无护耳。矛兵分重矛手与轻矛手，持凸面盾，前者衣甲与重弓箭手相似，负责保护国王，后者用于攻城。至亚述巴尼拔时代，弓箭手与矛手各分为重装与轻装两类，其衣甲装备与前代无显著区别。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两个新的步兵种类，即长把锤兵和战斧兵。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实行兵制改革，除扩大原有诸兵种编制外，新设工兵与辎重兵。辎重兵的任务是运送粮草，工兵的职责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建城筑垒、营造攻城战具等，其武器是双头战斧或手斧。此外，亚述步兵中，还有投石手和临时组建的攻城兵。可见，仅就步兵而言，其种类已十分繁杂。

亚述上至国君，下至普通士兵，均以马革裹尸共勉，作战十分勇敢。高昂的士气，既源于爱国心及战利品的诱惑，也因有严格的军法。亚述军纪之严，为古代世界所罕见，对违令者的处罚，轻则示众、降职、强制劳动，重则鞭笞、割鼻、割舌、剜眼，直至斩首、赐毒酒，尤为残酷的是将罪人的子女烧烤供神。严厉而残酷的军纪保证了士卒的勇气。

2. 兵器与战术

亚述人善于制造各种武器并因此而驰名古代东方。其进攻性兵器有战车、剑、战斧、匕首、投石器、破城锤等。矛有两种，短矛长约 5—6

英尺，长矛 9—10 英尺；弓有曲形弓与角形弓两种，木制，弓弦长约 4 英尺，箭杆用木或芦苇制成，箭头铁制或青铜制，呈菱形。防护性武器有头盔、铠甲、盾牌，头盔有尖顶式和鸟冠式两种。盾牌也有三种：柳条盾一般较大，长与士兵身高相当，宽可掩护二三人，呈长方形或上部呈尖顶状；车兵多用小型圆盾，金属制，直径 2—2.5 英尺；凸面盾多为长方形，长 4—5 英尺。亚述有专门的兵器库，如辛那赫里布和阿萨尔哈东在国都尼尼微修造的一座武器库，可以容纳马、骡、驴、骆驼、战车、载重马车、大车、箭筒、弓箭等各种器具和鞍具。亚述兵器的最大特点是铁制，以至有的学者认为：“亚述人的军队是有史以来使用铁制兵器的第一支大军。萨尔贡皇宫中某一单独的武库，即曾装有两百吨的铁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述帝国的强盛要算是铁器时代的后果之一。”

亚述的工兵为世界军事史上首创，由于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故其修造野战营垒及攻城器械的专业技术有较大提高。亚述的野战营垒呈长方形或椭圆形，较为高大，围墙可能用砖垒成，每间隔一段距离设一塔楼，用以监视敌人和应急。从保存至今的废墟来看，其要塞建筑技术也较为高超。亚述的攻城技术较为发达，攻城器械有云梯、投石器、破城槌等，亦使用挖地道等战术。投石器有两种，小的制作简单，用一条绳子系住一小块皮革的两端即成，兜上小石块后，轮转三圈，发石击守城之敌，以掩护攻城兵；大的投石机制作不详，据说能将 10 公斤重的石块射出 500—600 米。早在公元前 10 世纪，亚述人即已发明攻城槌，槌身是一根大木梁，头部包以金属皮，状如矛头或喇叭，它一般有保护操作者的外罩，罩为柳条制、木制、兽皮制或金属制，有轮可以移动。最好的攻城槌安装在攻城塔内，塔身木制，但其顶盖和前壁是金属板，顶盖下有一平台，供弓箭手射杀守城者之用，有 6 个轮子。亚述的筑城术与攻城战具为波斯人仿效，后来又为希腊罗马人所继承和改进。

亚述帝国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征服史。其最大贡献即在军事方面，至于其他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建树，则聊胜于无。在战略战术上，亚述人有许多创新。亚述的战法经历了两个阶段，初期是“混合的群体混战”，即诸兵种混合作战；萨尔贡二世以后，“混合的群体被单一兵种的密集队形所代替”，即用方阵作战。亚述军队有一定的战术编队，据目前所知，有 10 人队、50 人队和 100 人队三种战术单位；诸兵种编队时也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如一辆战车和 10 名骑兵配合 200 名步兵作战。对亚述方阵，恩格斯曾有专门研究，他说，“亚述的步兵战术在运动的规则上和队形的排列上显然取得了某些进步。弓箭手或是站在前面作战，这时他们每一个人都由盾牌手来掩护；或是站在后列，这时，第一和第二列的长矛手弯下腰或跪下来，以便弓箭手射箭。”由此推知，亚述步兵方阵可能由盾牌手、弓箭手和两列长矛手共四列横队组成。方阵两翼为战车兵和骑兵，骑兵列于战车兵之后。亚述人作战，一般是全线出击，同时也注意正面拼杀与侧面进攻相结合，击溃敌人后，车兵与骑兵便迅速地追歼逃敌，以确保全歼敌人的有生力量。亚述人善于使用各种“军事的奇计”，如偷袭、绝粮等。实施绝粮战术时，他们占据一切山中隘路、

布雷斯特德：《文明的征服》，转引自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 9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7 页。

水源、渡口，截断敌人一切交通，使敌军无法得到水、粮食供应和增援。

亚述人注意到了“知彼知己”的重要性，注重军事侦察和谍报工作，驻外使节须按时汇报别国情报，诸如战争准备、军队调动、缔结密约、迎送使节、密谋和起义、要塞构筑、叛逃人物、经济状况等；重视保障交通线和通讯联络，精心维护驿道，以利快速行军；遇有战况，则以烽火报警。一旦决定用兵，则求快速进攻、快速追击、闪电般地打击，使敌人来不及集聚兵力。亚述另一重要战略是攻心战，实行恐怖主义。亚述人以斩首多寡论功，故无论是与敌对阵，还是攻城掠地，都一味砍杀，以杀人为务。他们生性残忍，对于战俘的处置，极尽残酷之能事：或集体坑杀、割鼻削耳、断手断脚、剥皮拔舌、杀头分尸，或将活人戮于木桩，或以火炙烤，或当其面，剜出其儿女的眼睛。亚述巴尼拔曾自吹道：“我所捉住的叛军首领，有的活剥皮，有的烧烤，有的埋在城墙脚，……有的剁脚剁手”；“我把所捉住的三千战俘都活活烧死，一个活口都没留下”；“凡是反叛亚述及反叛我者……有的我割掉他的舌头，再叫他死；有的我把他活活埋掉；有的，我斫（zhuó）下他的手足，拿去喂猪喂狗。”从尼尼微发现的许多浮雕来看，有剥皮拔舌、开肠破肚、剜目斩首等惨象，可知以上大言不惭之语，并非虚言。亚述诸王以征服为务，树敌甚多，之所以如此，旨在杀鸡儆猴，使敌临战气馁，使降国心存恐惧，不敢叛离。

3. 亚述的征服战争

公元前9—前7世纪的亚述国王，凭借装备的精良、强大的兵力、严密的军事制度，不断用兵，东征西讨，在西亚历史上首次建立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军事帝国。限于目前的资料，我们很难详述其用兵的具体经过与每个战役的细节，仅作一概述。

(1) 征服开始

亚述帝国的开国之君当数亚述纳西帕尔二世，他在位25年，远征14次，扫平两河流域北部周围十余个城市国家，并不断向西推进，征服叙利亚、黎巴嫩及腓尼基，使帝国版图直达地中海。据说他生性残忍，一生嗜好挖俘虏的眼睛，曾杀死450头雄狮、390头野牛、200只鸵鸟、30头大象。公元前858年，其子沙尔马纳塞尔继位，继续扩张，终生未离鞍马，在位35年，发动了32次侵略战争。当时，叙利亚诸国与北方强国乌拉尔图联合，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他上台后即不断进攻乌拉尔图，兵锋直抵该国中心凡湖一带；此后又与叙利亚地区强国大马士革领导的各国联军四次交锋，最后一次投入12万兵力，仍无进展。直到公元前842年，乘其不睦之际，再度用兵，于城郊一战，斩其步兵16000、骑兵480、俘战车1121辆，并于次年攻陷大马士革，重新平定了叙利亚。在东南方，他征服巴比伦，洗马波斯湾。但由于亚述诸王非常残暴，一味使用

《亚述巴尼拔年代记》，转引自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卷二，台北版，第237—238页。

马斯皮奥：《逝去的帝国》，1900年伦敦版，第85页（G.Maspero, The Passing of the Empires 850 B.C. to 330 B.C., London, 1900）。

高压政策，军旅所到之处，灭国屠民，毁城灭族，烧杀无度，对战俘或集体坑杀，或施以肢解、剜眼、火焚等酷刑，以观战俘痛苦为乐事，故怨声载道。被征服诸族乘亚述国内政局不稳、血溅宫廷之机，先后举起义旗；加之此时乌拉尔图在一明君治理下，国势兴盛，不断南征，夺取幼发拉底河上游，取代了亚述在西亚的优势，因而在公元前 9 世纪末 8 世纪初，亚述暂处守势，积蓄力量，以期再起。

(2) “中兴之主”

公元前 8 世纪中期，军事将领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登上王位，他凭实力乱中夺权，是位经验丰富、足智多谋的君王。他上台之初，即审时度势，对传统的军政体制和统治政策作了改革。为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他将原来较大的总督区划为较小的行省，任命省长治理，另派专员监督政务，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对被征服地区居民，改变传统的斩尽杀绝政策，实行强制移民，命令他们迁居指定地区，分散安插，这既保存了人力，又使其不致为患。在军事方面，他实行募兵制，组建常备军；实行军事移民，培养一个职业世袭的武士阶层，组成地方兵团，以戍守地方或备征调；为扩大兵源，在部分被征服居民征兵；创建工兵、辎重兵新兵种，首次使工兵成为一独立兵种；并以铁制武器取代铜兵器。通过上述改革，他不但加强了中央集权，增强了国力，稳定了被征服的居民，而且组成了一支组织完善、兵种齐全、装备精良、兵员充足、战术高明的劲旅。他用这支精兵重启争霸，将亚述带入了极盛时期。

提格拉斯·帕拉沙尔继位之初，亚述四面临敌，尤以北面的乌拉尔图和西陲的大马士革为首。为此，他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略。公元前 745 年，他平定巴比伦内乱，树立了亲亚述的政权，稳定了后方。次年，他首先征服了东北的米底各部落，斩断强敌乌拉尔图的左膀；再次年，西征北叙利亚各国同盟，再断乌拉尔图的右臂。公元前 743 年，兵锋直指乌拉尔图，两军战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康马甘地区，乌拉尔图几乎全军覆没，其王只身骑母马逃走，传为笑柄。亚述收复了幼发拉底河沿岸地区，并乘胜深入敌境追击，俘敌 72950 人。公元前 736—前 735 年，亚述再次北伐乌拉尔图，直捣其国都吐施帕，虽因地势险要未能攻克，却使之仅余孤城一座，一时不足为患。

打击乌拉尔图与打击大马士革的战争是交替进行的，在此战中，亚述王运用了迂回进攻、剪除羽翼的战略。公元前 742—前 740 年，亚述西征，迫使叙利亚各国臣服；公元前 739 年，以大马士革、以色列为首的西方 19 国联合叛乱，亚述军在黎巴嫩山区大破联军，各国再次请降；公元前 732 年，提格拉特·帕拉沙尔四征叙利亚，兵临大马士革城下。亚述军以连为单位布阵，每连第一排为 5 辆战车，第二排是 15 名骑兵，第三排置 25 名重装步兵，50 名轻装步兵布置于两翼和后面。摆好阵势，在杀声震天中展开厮杀：战车对战车、骑兵对骑兵、弓箭手互相对射，十分激烈。亚述方面取得了优势，使敌人开始退却，亚述步兵随即登场，其青铜盾和头盔使敌人的箭被弹飞、刀斧变钝，他们则不断射出排箭和石弹，使大马士革军溃不成军，狼狈逃回城里坚守。亚述军以树木在城周筑起栏杆，像“把鸟关在笼子里”一样将该城围起来。次年，提格拉特·帕拉沙尔见相持不下，遂令攻城：以 20 架投石机不断发射重石猛击

南墙，使之松脆，再以攻城槌撞松脆处，终于撞塌一个缺口，亚述兵从此杀入，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最后平定了该城。此役，亚述军烧杀无度，仅在北门，被斩下的人头即堆成一座小山。2万居民被俘。大马士革王遭擒，据说他曾被带到亚述王面前，亚述王一言不发，只凶狠地瞪了他一眼，便挥剑砍下他的脑袋。

正当亚述在北方和西陲用兵时，东南方的迦勒底人夺取了巴比伦的王位。公元前729年，在巴比伦祭司集团的支持下，亚述出兵赶走了篡位者，并与巴比伦结盟。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在其年代记中洋洋得意地宣称：“我把卡尔杜尼阿什（即巴比伦）的广大国土直到最遥远的边疆都收归自己的政权之下，并开始对它加以统治。……海滨国王梅罗达克·巴拉丹（迦勒底人首领）不来朝见我的先王，也不来吻他们的脚，现在在我的主人亚述神的可怕威力面前战战兢兢了，……跪在我的面前吻我的脚。我收取了黄金、大量的山上粉末贡金、黄金制品、黄金颈饰、宝石……花衣服、各种草、牲畜和绵羊等贡物。”至此，四字平服，其版图包括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小亚东部，使帝国腹地从两河流域北部直达波斯湾。因此，提格拉特·帕拉沙尔被称为帝国的“中兴之主”。

(3) “亚述的拿破仑”与帝国的兴盛

公元前727年，沙尔马纳塞尔五世继位。他曾两次西征，打败叛邦腓尼基城市推罗及其同盟者以色列。但由于他的某些经济措施触犯了贵族、富贾和祭司的利益，遭致不满，结果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一军事将领萨尔贡取而代之。萨尔贡二世即位之初，国际形势极为不利：北方的乌拉尔图国力恢复，正在拉拢邻近小国，以期反攻；西陲叙利亚诸国与埃及联合，举起反旗；东南之迦勒底人首领梅罗达克·巴拉丹登上巴比伦王位，并与东方强国埃兰联合，不服管辖。但萨尔贡二世富有军事才能，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选择有利战机予以打击，通过一系列征讨，平定了叛乱，并进一步扩张了版图。

公元前720年，萨尔贡二世首先南征，进攻巴比伦与埃兰联军，却未能消灭其主力，遂转锋西征，攻陷了以色列首都撒马利亚，并平定了大马士革。随即大破推罗、加沙与埃及联军，占领了整个叙利亚地区，迫使埃及法老称臣纳贡。公元前741年北伐乌拉尔图，俘敌20170人，逼其王自杀。这时，巴比伦王梅罗达克·巴拉丹因行某些措施与巴比伦贵族不睦，而其盟国埃兰内乱又无力支援，萨尔贡二世见有机可乘，便于公元前710年兵分两路进攻巴比伦，城郊一战，巴拉丹兵败，负伤逃往埃兰，亚述军俘敌9万余众，“在欢呼声中进入了巴比伦”，再次平定了东南部。萨尔贡二世作战灵活，有力地维持了帝国的鼎盛态势，有的史学家称之为“亚述的拿破仑”。

萨尔贡二世死后，其子辛那赫里布即位。此时，巴拉丹率部从埃兰返回巴比伦，继续与亚述对抗。辛那赫里布遂领兵征讨，与巴比伦、埃兰联军战于两河平川之地，由于指挥得当、装备精良，亚述军大破敌军，三度征服巴比伦，俘获208000人。此后，又平定腓尼基与犹太国的叛乱，

但远征埃及却劳而无功。正当他用兵西陲之际，巴比伦再度叛乱，由埃兰领导的反亚述联盟席卷东南之地，军旅之众有如“一群群遮天蔽日的蝗虫，所经之处，踏起的灰尘如一层厚厚的云层，使天空阴暗，呈现灰铜色”。辛那赫里布见巴比伦反复无常，便几度兴兵打击，其中一战歼敌 10 万，在辛那赫里布眼中，这场拼杀异常激烈：“我像一头吼狮，搭上马轭，戴上作为战争标记的头盔，怒气冲冲地跨上我那使敌丧胆的战车，左手紧握亚述大神恩赐的强弓，右手高举夺命标枪，杀向那群顽固的背叛者，犹如切瓜斩菜一般，……他们一个一个地躺下，就像牛羊进入屠宰场一样，他们的血在广阔的平原上流淌，犹如暴雨过后的积水，战马的小腿被血浸泡，皇家战车被染红了。”至公元前 689 年，他终于攻陷巴比伦，将之化为废墟，“他的将军进行了收尾工作：一连洗劫 89 个城镇和 820 个村庄。……战利品丰厚：208000 名俘虏，7200 匹马，11073 头驴，5230 只骆驼，80100 头牛，800500 只羊”。辛那赫里布虽然战功卓越，但晚景凄凉，被互争王位的儿子们杀死于神庙之中。

公元前 680 年，其子阿萨尔哈东即位。由于埃及一再唆使叙利亚诸国叛乱，他决定予以打击，并为此作了一系列准备工作：首先采取睦邻措施，重建巴比伦城，迫使城内敌视亚述一派的首领“像狐狸一样地溜到埃兰去”，安定了后方；继而攻陷叙利亚叛首西顿，把西顿王“像鱼一样地从海里捞了回来”。直到公元前 671 年，他才亲率大军远征埃及，攻克其国都孟菲斯，取得了“下埃及、上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王”的尊号。但两年后，埃及再次叛离，阿萨尔哈东镇压不成，病死于军旅途中。

公元前 668 年，亚述巴尼拔继位，承其父志，率领 22 个属国的军队前往镇压，夺回孟菲斯，攻克上埃及首府底比斯。3 年后，再次征服叛乱的埃及，并洗劫了古都底比斯。10 年后，埃及再度独立，亚述巴尼拔因为正在对付东面的强敌，鞭长莫及，只得不了了之。当时，其弟萨马什苏姆肯统治巴比伦，与埃兰联合公开反叛。亚述巴尼拔甚为恼怒：“至于巴比伦的子民，我曾赐以荣耀，赏以各种颜色的袍子，使他们带上金戒子；巴比伦的子民一直受到亚述的保护，……但萨马什苏姆肯，这个伪兄弟，不遵我的圣谕，反而兴兵作乱……，我要让他们尝尝恐怖死亡的滋味：利刃分尸、投入烈火、挨饥受饿、瘟疫横行，我将取他们的性命。”公元前 652 年，他率兵征讨巴比伦，围城达 4 年之久，致使城内“由于饥饿而吃自己亲生儿女的肉，咀嚼皮带”，终于攻克之。接着便攻打最后也是最顽强的敌人的埃兰。埃兰国土包括伊朗高原及中亚一部，境内多山，国力亦强，不易征服。据说亚述巴尼拔用兵之前，曾在女战神石像前痛哭流涕，祈求保佑，幸得女祭司口传神谕“既然你向我

马斯皮奥：《逝去的帝国》，第 306 页。

《萨尔贡二世年代记》，转引自马斯皮奥《逝去的帝国》，第 306 页。

马斯皮奥：《逝去的帝国》，第 276 页。

《阿萨尔哈东年代记》，转引自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第 501 页。

《英国博物馆泥版文书 K4》(Tablet K4 of the British Museum)，转引自马斯皮奥《逝去的帝国》，第 418 页。

马斯皮奥：《逝去的帝国》，第 422 页。

伸出了求援之手，而且你的眼睛浸满了泪水，我将赦给你一个恩惠！”方敢多次用兵打击，曾两度攻陷其国都苏萨。至公元前 639 年，终于俘获其王，平定埃兰全境。事后，亚述巴尼拔自我吹嘘道：“以一个月零二十五天的行军，我到达了埃兰，我在其田地里撒盐及撒荆棘的种子，所有埃兰人，无论男女老幼，从皇子到皇孙、高官显吏至士兵工匠，所有埃兰牲畜，无论马、驴、骡、牛、羊，我一概都掳来了。除了人畜外，我更带走了苏萨……以及其他城市的钱财。仅一个月工夫，我令埃兰完全变成了废墟。我相信，那儿现在已无欢笑、无人声、无牛羊！”在亚述巴尼拔统治下，亚述帝国达到了其最大版图，东临伊朗高原，西抵地中海，北达高加索，南接尼罗河。

(4) 帝国的灭亡

亚述帝国不重视农业生产，以攻城掠地、猎取战利品立国。一旦攻城不克、掠地不得，便会闹饥荒。一次，亚述巴尼拔久攻巴比伦不下，即出现下列景象：“亚述城市，空前悲惨，……饥饿加上疫病，满街都是病人。居民与士兵，强者相竞至村中觅食，留下来的，尽属老弱之辈，逃亡者肩踵相接。亚述巴尼拔惧群起效尤，乃尽捕逃亡者处以酷刑，士兵被捕回者，先拔舌头，再活活打死；对于逃亡的百姓，则如五十年前其祖父辛那赫里布之所为，大行集体屠杀。尸积如山，久无人葬，以致鸟兽争食。”正因为如此，亚述诸王只得不断地征服，每攻陷一城，即大肆抢劫，将一切财物，悉尽刮走；每降服一国，则迫其进贡，贡金之多，令人吃惊，如埃及年贡黄金 180 公斤、白银 9 吨。为了巩固战果，亚述实行恐怖政策，动辄杀人十数万，毁城灭国，如亚述巴尼拔征服埃兰后，使其成为荒芜之地，“让凶恶的野兽、毒蛇和爬虫到那里去自由栖息”；亚述纳西帕尔二世曾得意傲慢地在其铭文中说：“我用敌人的尸体堆满山谷直达顶峰；我砍掉他们的首级，用他们的人头装饰城墙；我把他们的房屋付之一炬；我在大城门前建筑了一道墙，包上一层从反叛首领身上剥下来的皮；我把一些人活着砌在墙里，把另一些人沿墙活活插在尖木桩上并且斩首。”这版铭文即使今人读来也会毛骨悚然。亚述王不但残杀战俘，对敌国国君与贵族的处罚更为残忍，或用短枪刺进其眼、用绳穿透其腮，拉着示众；或生剥其皮，尔后投入火炉；或将其剁成肉块等，以便“让大家看到皇帝是多么会惩罚自己的敌人”。亚述诸王的不断征服，使帝国臻于极盛。另一方面，由于横征暴敛，手段残忍，又使被征服国难以诚服，“三户亡秦”之心越坚，他们随时背叛，不断消耗着亚述的国力，终于使这个庞然大物由盛转衰。公元前 633 年，亚述巴尼拔死，其后诸王缺乏才干，难守父业。这时，小亚兴起了吕底亚王国，南部的迦勒底人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 626 年），伊朗高原上出现了新兴的国家米底，新巴比伦王国与米底王国南北夹击，不断进攻亚述。公元前 614 年，联军攻陷亚述城，两年后又引水攻克其国

马斯皮奥：《逝去的帝国》，第 405 页。

《亚述巴尼拔年代记》，转引自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卷 2，第 203 页。

马斯皮奥：《逝去的帝国》，第 422—423 页。

转引自《世界著名古国王朝》（一），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73 页。

都尼尼微。至公元前 605 年，扫清亚述残余势力，这个主宰西亚近 300 年之久的军事帝国灭亡。

亚述曾独霸西亚、威震北非；其兵精将猛、装备精良、兵种齐全，为一世之劲旅；其攻城技术，发展相当可观；至于战略战术，更是历代追求，不遗余力。故亚述之灭亡，非兵不广，非器不利，更非战不胜，实乃恃强好武所致。亚述王以残暴凶悍闻名，他们不重农耕、发展经济，以征服他国、掠夺外族立国，故每得一国、每掠一地，极尽压榨之能事。这必然导致普遍的不满与反抗，而一旦兴兵叛离，亚述诸王便大行高压之策，毁城灭国、尽图其民、斩尽杀绝。辛那赫里布一次惩罚埃兰，即出现下列惨状：“34 座要塞和城镇被毁，……我进行了围攻、屠杀并予以占领，生俘其居民，我摧毁了它们，使之化为灰烬，熊熊火焰，直冲霄汉”’ 对战俘的处罚，更是令人惊心。一味的高压、凶狠的杀戮，并未能达到其目的，带给它的只不过是仇恨的加深，准备反抗，因而形成恶性循环，这就决定了亚述帝国的历史必然是一部血与火的征服战争史。由亚述诸王一手炮制的这个魔圈，虽使亚述一度极盛，却也树敌甚众，逐渐耗尽了帝国的国力，最终走上了灭亡的道路。亚述的亡国表明，以军事统治为基础的帝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不可能永存于世。

六、波斯帝国的军事

亚述帝国灭亡后，新巴比伦王国和米底王国共同主宰西亚，但它们也只是昙花一现，旋即被伊朗高原东南部的波斯帝国（公元前 6—前 4 世纪）所吞并。波斯原为米底属国，至公元前 6 世纪中叶居鲁士一世（公元前 558—前 529 年）兼并米底，进而击败吕底亚，兵取两河流域，遍占西亚为一统，建立了帝国。至其子冈比西（公元前 529—前 522 年）继位，兵伐埃及，使其版图扩及北非。大流士一世（公元前 522—前 486 年）当政时，使帝国臻于极盛，并首次发动了希波战争（公元前 492 年）。薛西斯（公元前 486—前 465 年）承其父志，两次进攻希腊，却均以惨败告终。此后，由于宫廷内讧时有发生，以及地方势力的坐大，帝国逐渐衰落，仅具帝国之表，为亚历山大于公元前 4 世纪后半期发动的东征创造了条件。

1. 波斯兵制与兵种

波斯兵制经历了从民兵制到募兵制的发展过程。波斯兴起之初，国家种族单一，所有波斯成年男子均有服兵役的义务，当时军队称“卡拉”，即“人民”之意，充分体现了民军的性质。进入帝国阶段后，由于兵源充足，波斯国君招募了一支常备军，悉由波斯人和米底人组成，有时也雇佣外国军队。他们平时保卫国家安全，或驻扎于各省要塞，为波斯军队的骨干力量。常备军的核心是称为“不死队”的近卫军。近卫军全由波斯人组成，最受国王重视。在大规模用兵时，常备军显然不够，便广泛征集士兵，各行省皆需提供一支军队，招兵工作由军区的专门机构执行。

波斯皇帝非常重视军队的管理和控制，措施有六：（一）派驻“耳目，”监视军官行动；（二）禁止本省人就地驻防，避免结党营私，形成山头；（三）为便于管理，将全国划为五大军区，各设一名直接向皇帝负责的军区首长；（四）实行政武分职，各司其职，相互监督；（五）为确保军队忠于皇帝，各级军官均由波斯贵族充任，高级将领由皇亲国戚担当；（六）国王每年定期检阅全国军队，如人员足额、兵强马壮、武器齐备，则该部队各级军官皆得晋级，并获重赏；如达不到标准，不符合要求，则认为该将领玩忽职守，免其职务，并予以严厉惩罚。

波斯的军事刑罚甚为严厉。目前，尚无史料说明其军法的详情，但可通过它对逃避兵役者的处罚而见一斑。帝国规定，所有 15—50 岁的成年男子，均必须服兵役，逃避兵役者，无论任何理由，皆属罪大恶极。大流士一世远征希腊时，一位三个儿子的父亲，请求免其一子服役，结果三子全被斩首示众；薛西斯时，一位五个儿子的父亲，当其四子均已上前线，请求留最后一子撑持家务时，结果此子被分尸两半，置于军队必经之路的两旁。

军费开支主要由各行省承担。大流士一世改革规定，除波斯本部外，其余行省均需缴纳不同定额的贡赋。如小亚被划为两个行省，共纳白银 900 塔兰特（1 塔兰特约合 26 公斤）；巴比伦—亚述行省，缴银 1000 塔兰特；埃及行省缴银 700 塔兰特，纳谷物 12 万美狄姆诺斯（约合 6240000

公升)；印度贡赋最重，须缴纳 360 塔兰特砂金，折合成白银，则为 4680 塔兰特。据希罗多德统计，各行省纳贡总数一年可达白银 14560 塔兰特，约合 400 吨。这是帝国进行战争的经济基础。

波斯有车兵、步兵、骑兵三兵种。车兵的装备不详，其数目不会太多，据色诺芬的记载，帝国战车最多时也不过 200 辆。步兵是波斯的基本兵种，人数最多，建制齐全，分为弓箭手、盾牌手、枪兵、投石手。盾牌手和枪兵属重装步兵，装备较好，有头盔、护胫、铠甲；弓箭手和投石手是轻装步兵，衣甲稍差，作战时最先打击敌阵，而后重装步兵始拼杀。骑兵是其主要冲击力量，重装骑兵有铠甲，持长矛；轻装骑兵头顶厚粗布做的胄，兵器为弓箭和盾。波斯重视骑兵，帝国境内设有养马场，如巴比伦的一个养马场，有种马 80 匹、牝马 1.6 万匹，以保证战马的供应。战马有额甲和披胸保护。波斯也有舰队，主要由腓尼基等地中海东部沿岸属国提供，最多时达千余艘，其中战斗力最强的是腓尼基舰队。此外，军队中还有大量的辎重兵。波斯军队的编制有 4 级：十人队、百人队、千人队和万人队，万人队亦称团。

2. 装备与兵力估算

波斯的战车为木制、单辕、双马驾馭，车厢较高，车轮安置于车体后部。这与亚述战车颇为相似，其特点在于，车上安有滚刀，故又称滚刀战车。滚刀是一种较长的镰刀，安于车轴之上，向外伸出。战车人员配备不详。滚刀战车主要用于冲击敌阵，将其队伍捣烂，据阿庇安报道，其威力非常，能“把一些敌人斩为两段，把另一些敌人碾得粉碎”，敌兵“被切为两半，还没有停止呼吸，或者被切为碎片，或者挂在镰刀上面”。但在抗击亚历山大入侵时，并未显出多大威力。

弓箭是波斯军队的主要兵器，弓箭手、轻装骑兵均以弓箭作战。矛有长矛和短矛两种，重装骑兵和车兵使用长矛，部分车兵使用短矛，作为投射武器。重装步兵也使用长矛。其他兵器还有剑、战斧等。波斯的盾有柳条盾和木盾两种。柳条盾较大，高达战士鼻端，宽约 50—70 厘米。木盾稍小，其长度可保护从肩到大腿的躯干部分，盾周边包有皮革或青铜皮。波斯的头盔为青铜制或铁制，但仅优秀的士兵才有，头盔主要有半球形圆顶头盔和球锥体形头盔两种。波斯人的铠甲是鱼鳞甲，带有袖子，以鱼鳞状的青铜片或铁片连缀而成，此外，也有用亚麻、毡子、皮革等材料制成的铠甲。仅重装步、骑兵才着金属衣甲。总的说来，波斯军队的衣甲较差，希罗多德在叙述希波战争时，常常提到波军由于衣甲太差而失利。

以上仅是帝国常备军的装备情况。每遇大战，帝国境内的各民族均需提供军队，如薛西斯远征希腊时，就有亚述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利比亚人、吕底亚人等 44 个民族提供的 44 支军队。这些军队的装备各不相同，五花八门：亚述人头戴青铜盔，身穿亚麻胴甲，手持盾牌、枪、短剑或狼牙棒；印度人身穿木棉制衣服，使用藤弓和带铁头的藤箭；阿

希罗多德：《历史》，第 236—238 页。

阿庇安：《罗马史》上卷，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423 页。

拉伯人身穿系腰带的袍子，使用长弓；利比亚人着皮革制衣服，使用经过火烤硬的木制投枪；色雷斯人头戴狐皮帽，身穿紧身内衣，外罩五颜六色的袍子，脚穿鹿皮靴子，使用投枪、小圆盾与小短剑。各族提供的骑兵、水师的装备也各不相同。波斯军队无论从种族、兵器、衣甲、战法等方面来看，都是一支杂牌军。

波斯帝国素以军队众多著称。据希罗多德述说，薛西斯远征希腊，兵力达 170 万；据色诺芬记载，在公元前 5 世纪末，它仍有军队 120 万；帝国灭亡前夕，大流士三世几次与亚历山大作战，率兵均在 60 万乃至百万以上，这些数字显然被夸大了，但估计其总兵力在四五十万左右，可能不会相差甚远。波斯虽然军队众多，但它是一支由几十个民族组成的杂牌军，有战斗力的并不多，除波斯人和米底人组成的常备军可称精兵外，其他各族支队皆属乌合之众。这些支队的武器、衣甲、战法均不同，波斯皇帝也从未想到对他们实行优化组合，进行统一训练，使之成为一支劲旅；相反，作战布阵之时，总是按种族原则排列，让他们按照各自的战法作战。这就使得整个阵势步调难以统一，无法发挥其人数众多的优势。这支军队，以其压倒的绝对优势征服西亚的那些寡民小国，尚能取胜；一旦遇上希腊、马其顿那样训练有素、战术高明、组织严密的铁甲方阵，就相形见绌，溃不成军了，马拉松、伊苏斯、高加米拉等战役，便是明证。

3. 波斯帝国的战争

(1) 居鲁士首建帝国

波斯人与米底人同文同种，在米底王国兴盛的近百年间，波斯一直受其统治。当时，波斯共有 10 个部落，6 个农业部落，4 个游牧部落，尚有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气质。其部落联盟首领已形成世袭制，由阿黑门尼德氏族袭任，虽有王位之尊，却只是米底辖下一行省之长而已。居鲁士继位后，趁米底与新巴比伦交恶、连年用兵、国势渐衰之际，率族起义，独立建国。据希罗多德记载，居鲁士是这样鼓动起义的：第一天，他令波斯人带着镰刀去开垦荒地；次日他杀羊屠牛，让他们尽情吃喝。然后问他们，是喜欢昨天的生活还是喜欢今天这么生活，波斯人一致回答：昨天带给他们的是痛苦，今日是快乐。居鲁士于是鼓动造反，“如果你们愿意听我的话，那你们就可以享受……幸福，……但如果你们不肯听我的话，那你们就要受到无数像昨天那样的苦役。因此，听从我的吩咐而取得自由罢。”^①波斯人对米底的统治早已不满，于是群起响应。米底王闻讯，把全体米底人武装起来前往镇压，但两军一对阵，米底军即分化，部分作战，部分公开投降，绝大多数则临阵逃脱。居鲁士乘胜于公元前 550 年灭亡米底，“原来是奴隶的波斯人现在却成了美地亚（即米底）人的主人”^②。

居鲁士灭米底时，已组建了一支军队，其精锐是贵族骑兵和农、牧民步兵。波斯人从 15—20 岁须接受骑射技术训练，故骑兵战斗力强；据

① 各族军队装备详情，请阅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493—500 页。

② 色诺芬：《长征记》，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23 页。

希罗多德说，其步兵亦能征善战。居鲁士凭借这支军队，开始对外征服，先迫使原米底属国亚述、亚美尼亚等归顺，进而图谋小亚与叙利亚。面对波斯咄咄逼人的攻势，埃及、巴比伦与吕底亚组成了反波斯同盟。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国富兵强，有富甲天下之誉，其兵刀马娴熟，勇武好战，“他们通常是在马上作战的，他们手持长枪，而且操纵战马的技术也非常高妙。”该国国王克洛伊索斯（约公元前 560—前 546 年在位）恐波斯势力日益强大，便先发制人，于公元前 546 年率军与波斯战于叙利亚的普特里亚，双方均伤亡惨重，未分胜负。克洛伊索斯率兵回国后，为克服势单力薄，便请埃及与巴比伦出兵助战，以期共破强敌。但居鲁士不待其援军赶来，就迅速突入其国境，直捣其国都萨尔迪斯，迫使克洛伊索斯率兵出城迎战。鉴于吕底亚骑兵善战，居鲁士布阵时，将随军运粮及行装的骆驼集中起来，置于前线，步兵随后，骑兵为第三线。他所以用骆驼打前阵，据说是因为马害怕骆驼，闻不得骆驼的气味。此策使克洛伊索斯赖以取胜的骑兵优势化为泡影。果然，两军相接，吕底亚的战马一见到骆驼就回头逃窜，扰乱了自己的军阵，但勇敢的吕底亚人纷纷跳下马来，与波斯人展开徒步拼杀，激烈的战斗持续了 14 天，最后居鲁士俘虏了克洛伊索斯，占领了萨尔迪斯。继而，居鲁士又用构筑土丘的战术攻克了小亚地中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城邦。占领小亚细亚后，波斯挥师东征，辟中亚的大夏、粟特为行省，形成了对两河流域东西夹击的有利态势。当时，巴比伦的对外贸易线已被切断，经济萧条，这引起了商业贵族和祭司对国王的不满。居鲁士乘机煽动，以大量金钱贿赂，并许诺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市场”，使他们能获巨利。公元前 538 年，由于有城内叛臣相助，波军几乎兵不血刃，“和平地胜利地进入了巴比伦城”¹，新巴比伦王国灭亡。居鲁士赢得了两河流域传统的至尊称号：“世界之王、伟大之王、正统之王、苏美尔与阿卡德之王、天下四方之王。”

巴比伦既纳入旗下，居鲁士便决定打击最后一个顽敌埃及。为此着手准备，对属国实行了一系列宽厚开明的政策，其中一项是，将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公元前 604—前 562 年）攻陷耶路撒冷时俘虏的 4 万余犹太人释放回国，并帮助这些“巴比伦囚徒”重建圣殿，此举深得犹太族的人心，继而叙利亚诸邦也表示效忠。这样，居鲁士既建立了进攻埃及的基地，又获得了强大的腓尼基舰队。但这时，中亚草原西部的游牧民族不断骚扰帝国东北边境，居鲁士只得先予以打击。在锡尔河右岸，波斯军队袭击了马萨革泰人，并俘获该族女王托米丽斯之子，不久将其杀害。女王发誓报仇，“不管你多么嗜血如渴，我也会叫你把血喝饱了的。”²公元前 529 年，女王率兵与波斯军决战，双方开始以箭对射，继则刀枪肉搏，但游牧民族的铁骑终略胜一筹，结果，波斯军队大部战死，居鲁士阵亡。女王砍下他的脑袋，放入一盛满血的革囊里，说：“把你的头用血泡起来，让你饮个痛快吧！”居鲁士虽死，但经他建立的波斯帝国业已形成。

希罗多德：《历史》，第 66、68、40 页。

《居鲁士文书》，见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史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9 页。

希罗多德：《历史》，第 106—107 页。

(2) 冈比西远征埃及

居鲁士之子冈比西继位后，决心完成其父未遂的遗愿，以征服埃及为首务。公元前 526 年，冈比西率波斯大军与腓尼基舰队水陆并进，经尼罗河三角洲和孟菲斯两次大战，大破埃及军及其外国雇佣军，于次年攻克孟菲斯，俘埃及法老普萨美尼托斯。为了考察这位亡国之君的心境，冈比西先令法老之女穿上奴仆衣服，手提水瓮去打水，再令其子嘴咬马嚼子，以绳牵着押上刑场。据说，这位法老目睹自己儿女的不幸遭遇，只低头不语，但当他看到昔日旧友、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向波斯人行乞时，却高声恸哭起来。这使冈比西大感惊奇，派人问他，为何看到女儿受虐待、儿子前去受死时不哭不叫，却为一个非亲非故的乞丐痛哭呢？法老回答说：“居鲁士的儿子，我自己心里面的痛苦已经超过了哭泣的程度，但我的伙伴不幸遭遇却引起了我的同情之泪。”这个答复使冈比西起了恻隐之心，免去其死罪。

冈比西在征服埃及与利比亚后，又计划了三次征讨：迦太基、利比亚沙漠中的绿洲地区及埃塞俄比亚。但他的海军腓尼基舰队不愿进攻自己的同族（迦太基人为腓尼基人殖民后裔），只得作罢；进攻绿洲的 5 万军队因遭风暴葬身沙漠；他亲率大军进攻埃塞俄比亚时，因断粮，无功而返。据希罗多德记载，此次用兵，冈比西没有准备粮草，致使还未走完全程的 1/5，军粮即耗尽，但冈比西一意孤行，一味猛进，结果驮兽吃尽，最后发展到吃人：每 10 个兵中抽签选出 1 人来让大家吃掉，在此情况下，他只得回师。冈比西生性卤莽，据说患有“严重的精神错乱症”，在统治埃及期间，大肆胡作非为，曾用长枪刺杀埃及的圣牛，用脚踢死自己怀孕的妻子（也是其亲妹），拆毁了许多埃及神庙，鞭笞埃及法老的死尸等，使埃及出现了“前所未见、遍及全国的最大惨祸”，埃及人深以为恨。在他统治末年，波斯、米底等地出现了暴动，并很快在埃及引起连锁反应。冈比西镇压埃及暴动后，匆忙引兵回国，不料军旅途中，猝死于叙利亚。

(3) 大流士重振帝国

冈比西猝死成为全帝国沸腾的信号，“人民骚动起来，在国内，在波斯，在米底，也在其他各省，发生了巨大的恶祸”，巴比伦、埃兰、埃及、亚述诸省纷纷独立。在波斯本部，有一米底僧侣高墨达冒充已被冈比西秘密处死的胞弟巴尔狄亚（即司美尔狄斯），以免除兵役赋税 3 年，没收部分波斯贵族的牧场、牲畜、土地和奴隶为号召，顺利地夺取了政权。但这场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高墨达的措施触犯了波斯贵族的利益，他们与出身王族的大流士勾结，暗杀了高墨达，推翻了这个为期 7 个月的政变。此后两年，大流士一世出征 19 次，俘获 9 位国王，镇压了这场几乎颠覆整个帝国的起义。

大流士平定国内形势后，意识到了地方势力坐大的危害性，为此对

希罗多德：《历史》，第 199 页。

《贝希斯敦铭文》，见林志纯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178 页。

政治、经济、军事作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他把全国划分为 23 个行省（行省数目各时期不一，最多时达 30 个），每省设总督一人，执掌一省之行政、司法、税收大权；另设督军一人，统领一省的驻军。他们直接向皇帝负责，互不相属，以互相监督。为防止叛变，在总督身边设“皇室秘书”，负责宣读中央下达的各项指令，另派“国王的耳目”（亲信）到全国秘察地方军政人员的活动。军政分权的行省制与监督体制的设立，有力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及地方军队的控制。军队是帝国的支柱，为确保国王对军队的控制，大流士自任最高统帅，并参照亚述兵制，采取了 6 项措施：（1）建立一支由波斯人组成的近卫军，包括 1000 骑兵、1000 枪兵和 10000 号称“无敌”的步兵，其人数保持不变，如有缺员立即补足，因此希腊人称之为“不死队”。（2）在全国设五大军区，每一军区长官统辖数省督军，直接向皇帝负责。设立军区既便于中央指挥，亦可加强地方防卫，对军事管理有重大意义。（3）亲自规定各省驻军的规模及其兵种人员，对军事要塞戍卫军队的人数也亲自核定；同时，实行驻地调换制度，禁止本省人就地驻防。（4）利用腓尼基人等海滨民族组建了一支拥有战舰千艘的舰队。（5）各级军官概由波斯贵族担当。（6）每年定期检阅军队，国都附近驻军由国王亲自检阅，边远地区则委派专员检阅。这些措施提高了帝国的军事威力。此外，大流士还统一了币制，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网，规定了各省的贡赋制度。通过以上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增强了国力，确保了国王对军队的控制。

在进行改革的同时，大流士也展开了一系列军事征服，向南重新占领埃及，进而兵取北非的利比亚一带；于公元前 518 年，东进攫取了印度的西北部；在西面与北面，为打击欧亚草原的西徐亚人，他组织了东起中亚、西迄黑海北岸的远征，至公元前 513 年，亲率大军横渡波斯普鲁斯海峡，兵抵乌克兰草原，虽折兵 8 万余众，却占领了色雷斯地区。结果，他不仅恢复了帝国的版图，而且使之进一步扩大：东起印度西北，西抵地中海东部沿海及爱琴海许多岛屿，南接北非，北达色雷斯，形成了一个地跨三洲、古代西亚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

（4）帝国的衰亡

大流士一世一手建立起来的大帝国，不到百年便烟消云散。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为希波战争。这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扩张战争，薛西斯曾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我们征服了那些人（指雅典人）和他们的邻居，……我们会使波斯的领土和苍天相接了，因为我……把整个欧罗巴的土地征服，把所有的土地并入一个国家，则太阳所照到的土地便没有一处是在我国的疆界以外了。”野心虽大，均以惨败而告终。战争结果表明，波斯帝国赖以取胜的人海战术不是希腊密集方阵和优越的海上战术的对手，这个强大的帝国被弱小的希腊击败了。波斯的锐气和实力，一挫于马拉松，再挫于萨拉米湾，三挫于普拉提亚。最终，称霸世界不成，反而丧失了不少既得土地。

希波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显赫一时的波斯帝国开始衰落。这场海陆

大战使帝国的专制统治发生了危机。波斯是一个奴隶制军事帝国，它依赖强大的军事力量，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生活方式各异、语言、宗教及风俗习惯不同的地区和民族纳入其版图，虽然大流士多方控制，却未能使它们成为一个有机体。希波战争使帝国元气大伤，此后，渴望自由的被征服诸邦不断爆发起义。巴比伦于公元前 484 年和公元前 480 年先后两次暴动；埃及在公元前 480、469、465 年三度起义，而在公元前 405 至公元前 340 年间，起义从未间断；其他地区亦不同程度地掀起了反帝国的斗争，而小亚沿海诸邦，已于希波战争结束时获得独立。公元前 366 年，波斯西部各省联合举兵造反，直到公元前 359 年才被镇压下去。这种征服再征服、镇压再镇压的活动，进一步消耗了帝国的实力。

另一方面，自薛西斯以后，为争夺王位，父子成仇、兄弟反目、宫廷喋血事件连接发生。从公元前 465 年薛西斯被杀开始，以后的六位国君，无一善终，或死于廷臣之手，或在儿子刀下伤命。一次宫廷政变，老王自知身陷险境，渴望亲人相救，儿子来了，不由稍感欣慰，不料儿子却说：“我来是要你死。”世间恐怕再难有比这更残酷的了。宫廷内讧使中央集权制逐渐变得有名无实。可以说，居鲁士和大流士一世是波斯帝国的缔造者，薛西斯是继承者，以后诸王则贪图享受，为争权夺位而自相残杀。帝国后期，无论是国王，还是各级官吏，都腐化堕落，大兴吃喝之风。波斯贵族的习惯是一天只吃一餐，但这一餐，却从中午吃到深夜，他们不务正业，每天最关心的就是吃，并要求味道鲜美，这当然难守前辈开创的基业。

地方叛乱、宫廷内讧、统治阶级不务正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恶果。它使地方势力坐大，国力严重削弱，整个帝国一盘散沙，亦使军备废弛，军队训练松懈。更严重的是，由于连年征战，军队中出现了反淘汰现象，强壮的、优秀的、英勇的都战死沙场，留下来的不是老弱便是残兵。因此帝国末世，已仅存其名而无其实了，军队虽多，却属乌合之众，终无大用。如阿塔薛西斯二世（公元前 404—前 359 年在位）于公元前 401 年镇压其弟小居鲁士叛乱时，尚有卫队 6000 骑、步兵 120 万、滚刀战车 200 辆，却被其弟的万余希腊雇佣军打得落花流水，侥幸取胜后，又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这支不足万人的军队横穿帝国腹地，安然返回希腊。军队战斗力之弱由此可见一斑。

至亚历山大东征之时，波斯帝国的衰落已积重难返。末代皇帝大流士三世，虽有百万之军，却素质低劣，训练极差，缺乏战术操练，因此，人多根本无济于事。波斯步兵不是马其顿长矛方阵的对手，相反，这些乌合之众正是方阵打击的好目标；波斯骑兵亦不复昔日雄风，不可与亚历山大的铁骑匹敌。亚历山大以 3 万余众，经格拉尼库、伊苏斯、高加米拉三次大战，便将这个衰落的帝国灭亡了。古罗马史学家阿里安对大流士三世曾有一段精彩的评论，这也是波斯末世军力颓废的写照：“在打仗上，大流士基本上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他的一生只是一连串灾难。自登极以来，一直没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即位不久，其军队便在格拉尼库河畔遇上那次骑兵大劫；随即，小亚细亚诸邦相继陷落，一直到西里西亚的海岸线也全部失守；稍后，他本人在伊苏斯遭到惨败，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儿老小成为阶下囚；再后，又丢失了腓尼基和整个埃及；最后，高加米拉一战，波斯帝国的浩荡大军折损殆尽，他自己则

成了弃国出逃的罪犯，犹如丧家之犬，“以国王兼囚徒的身份，顶着奇耻大辱，囚禁在车中，仆仆风尘，终于死在本应最忠于他自己的人的屠刀之下”，可谓众叛亲离，穷途末路，这是他一生的悲剧。大流士三世死后，他的帝国被亚历山大帝国所吞并。

七、公元前 8—前 3 世纪印度的军事

古代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地理版图包括今日的整个南亚次大陆。古代印度的历史分期，包括印度河文明时代、吠陀时代、列国时代和帝国时代四个阶段。本章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包括吠陀后期（公元前 9—前 6 世纪）、列国时代（公元前 6—前 4 世纪）和孔雀帝国时期（公元前 4—前 3 世纪）。在此期间，印度经历了波斯、马其顿入侵，列国争霸及摩揭陀崛起，驱赶外族，统一南亚次大陆，建立帝国的过程。因此，其战争极为频繁，兵制、武器等亦有较大变化，尤其是在帝国时期，还出现了论及军事思想的著述。所以，它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1. 列国时代到帝国时代兵制的发展

(1) 武装力量体制

军队的构成。古印度的兵制，在很大程度上与后期吠陀时代（公元前 900—前 600 年）形成的种姓制有关。吠陀后期，印度社会已分为四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是祭司贵族，并干预政务，为国王出谋划策；刹帝利为武士等级，是军队的骨干力量和统帅，掌握军政大权；吠舍是雅利安人平民，战时应征从军；首陀罗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战时也要服兵役。由此观之，当时的兵制尚未脱离民军的范畴。

公元前 6 世纪，印度进入列国时代。各国均有常备军，如阿凯诺斯王国有 2000 骑兵、30000 步兵、30 头战象；波罗斯有步兵 5 万余、骑兵 3000、战车 1000 辆、战象 130 头；阿迦拉索伊有步兵 4 万、骑兵 300；马洛伊有 9 万步兵、1 万骑兵、900 辆战车；阿巴斯塔诺伊步兵 6 万、骑兵 6000、战车 500。据此估计，当时印度总兵力约为步兵百余万，骑兵 10 余万。其中最强大的国家是摩揭陀国。

摩揭陀国的孔雀王朝时期，军队由六部分组成：（1）摩罗，即职业军队或世袭军队。据阿里安记载，当时印度民分七等，其中第五等级是士兵，人数仅次于农民，以从军为职业，武器、马匹概由国家提供。他们只打仗，平时训练、玩乐，从国家领取优厚的薪饷，足以养活家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记载有一种“国之战士”，说他们“骁雄毕选，子父传业、遂穷兵术”。这两段记载可能指的就是这种军队。他们是常备军，是国家基本武装力量。（2）布利陀，即雇佣军，他们战斗力强，但为利而战。（3）什列尼，即行会军队，由城市手工业者组成，以手工技术为军队服务，相当于后勤兵。他们服役期较短，实际上是一种民兵。（4）阿密多罗，结盟的外国军队。（5）密多罗，藩王或同盟者提供的军队。（6）阿陀毗迦，指森林部落（野蛮部落）的军队，据说骁勇善战，但不易指挥。帝国时期的兵力无准确的数字。据说孔雀王朝的

当时印度约有二三十个国家。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 270—271 页。

玄奘：《大唐西域记》，章巽校点本（1977 年版），第 38 页。

开国之君旃陀罗笈多（公元前？—前 297 年）有一支步兵 60 万、骑兵 3 万、战象 9000 头的大军，这个夸张的数字仅供参考。

兵种。古代印度的兵种，各时期不尽一致。大致说来，吠陀时代只有车兵和步兵两种，至吠陀晚期，随着野象的驯服与骑马技术的提高，始形成传统的步、车、骑、象四兵种。至列国时代，这四兵种是常备军的主体，史诗和佛教文献中均有反映，如《摩诃僧祇律》载：“军有四种：象军、马军、车军、步军”（卷 18 下）。此外，还有水军、后勤兵等兵种，如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史诗《摩诃婆罗多》提到有八兵种，即车、象、马、步、辎重、船舶、密探和地方向导。其中，密探的主要任务是潜入敌国，刺探军情，相当于今日之侦察兵；向导为军队引路，报告敌情，作用虽然不小，但人数不多，似不能作为一兵种。孔雀帝国时期的军队，依然以传统的四兵种为主，另加海军与辎重兵。这也反映在其军事机构的设置上，据《政事论》一书记载，帝国军事机构共六部，由 30 名官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每部 5 人。第一部为海军部，设舰队司令；第二部是后勤部，主管运输等事务，负责征集粮秣，用牛队运输粮草与军械，为军队提供擂鼓者、持锣者、马夫、机械匠等勤务人员；第三部主管步兵；第四部负责骑兵；第五、六部分别主管车兵和象兵。

诸兵种的装备多种多样。步兵分为枪兵和弓箭手，枪兵一手持标枪，一手操盾；弓箭手也有盾，很受重视，以至古代印度人将军事艺术称为“弓箭学”。他们都有一把很宽的大弯刀。车兵由贵族充任，战车由 2 马、3 马乃至 4 马牵引，一乘战车兵员为 3 人或 6 人，若 3 人同乘，则 1 名驭手，2 名甲士，持弓或矛作战；若 6 人同乘，则 2 名驭手、2 名弓箭手、2 名盾牌手，战斗激烈时，驭手也持标枪参战。象军为古代印度兵种的一大特色。战象由野象训练而成。捕捉的野象驯服后，对其加以操纵、转动、前进、践踏、杀害，以及与其他象战斗等 7 个项目的训练。训练有素的战象在战争中能发挥有效作用，据说在战场上，如象倭战死，大象会用鼻子将其卷住带回，或站在旁边保护他，还有的会勇猛战斗，为主人报仇。一头大象配备弓箭手 3 人，立于象背的厢中作战，象倭坐在象颈上，手持刺棒指挥战象的行动。骑兵的兵器是两支长标枪，其所持之盾较小，其战马无鞍、蹬，马背上仅有一块方布。为控制战马，马嘴上套有皮套，套中安有铜刺或铁刺，马嘴里也安有嚼子，缰绳系于嚼子两端，一拉缰绳，马嘴便会被刺疼，从而听从指挥。

编制与管理。列国时代军队的编制，史料记载不尽相同。据《摩诃波罗多·初篇》，当时编制是三三制：其最小单位“波特提”相当于今日之班，由一象、一车、三马、五兵组成；3 个班组成 1 个塞那穆克，3 个塞那穆克组成 1 个怛勒摩，3 个怛勒摩组成 1 个哥纳，3 个哥纳组成 1 个瓦希尼，3 个瓦希尼组成 1 个普利特那，3 个普利特那组成 1 个杰穆，3 个杰穆组成 1 个阿尼吉尼，3 个阿尼吉尼组成 1 个阿克绍希尼。阿克绍希尼是其最大单位，相当于现代一个军团，其兵员总数为 2.187 万乘战车，6.561 万匹马，10.935 万名士兵。同一史诗的《备战篇》与《和平篇》记载的编制不但与此不同，而且它们之间也相差甚远，如《备战篇》所载编制为：500 辆战车与 500 头战象组成 1 个塞那，10 个塞那组成 1 个普利特那，10 个普利特那组成 1 个瓦希尼，瓦希尼兵员为战车 5 万辆，战象 5 万头。编制上为何存在着这些差异，目前尚难解释清楚，很可能

是各国的编制不同。帝国时代的军队编制，所知甚少，仅知其步兵编制分为十人队、百人队、千人大队三级。

古代印度的军队由各级军官管理和训练。训练的主要内容是操练在马、象、车上的作战功夫，步兵的作战技巧，尤其训练诸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以及使用各种兵器的技能等。帝国时期诸兵种由各自的军事机构管理，各司其职。设部管理各兵种在世界上属首创。此外，国王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防止军官叛变，还实行密探制。密探有两种，国外密探相当于现代的间谍；国内密探主要用来监视军民行动，又分为固定密探和流动密探两种。固定密探伪装成学生、僧侣、农夫、商贩、苦行者等，居住于城乡，负责监视一般民众的行动，同时传递情报；流动密探包括帮手、暗杀者、投毒者等，国王依其忠诚和能力，以适当的服饰、职业、家世等为掩护，派往各地监视各级军政人员，包括军队统帅、将军、卫戍司令、要塞司令、边防军首领、森林部落首领等，国王根据密探的报告对他们实行奖惩。密探制度有效地保证了国王对军队的控制。

(2) 军事法规与薪俸

在印度史诗和其他文献中，我们没有发现有关治军的条文，但却有许多对敌人和俘虏的规定，如《摩诃婆罗多》记载，身穿甲冑的战士不应同未穿衣甲的刹帝利战斗，骑兵不应攻击车兵，战斗应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不应使用带毒和带钩刺的箭，不应用箭射杀孤立无援、麻木或战败的人（《和平篇》）。不应杀害因恐惧而藏匿起来的人和旁观者（《战斗篇》）；不应杀害举手求饶的敌人，应优待战俘及其未婚妻，一年后送她们回家（《和平篇》）；不应杀害头发散乱者、面对别处者、无箭无衣甲者，以及武器损坏的人（《迦尔纳篇》）；有病或受伤者，应予以照顾（《和平篇》）；交战中不允许暗箭伤人（《沙利耶篇》）。《摩奴法典》中也有类似记载，如战斗中不允许使用奸诈兵器，像内藏尖锥的棍棒、带钩有毒的箭，或燃火的标枪（卷7第90条）；车兵不要进攻步兵，也不要打击弱如女性或合掌求饶，或头发苍苍，或在睡眠，或无甲冑，或赤身裸体，或解除武装，或旁观，或正在与他人厮杀的敌人；更不要打击武器已坏，或苦于忧伤，或负重伤，或怯懦，或逃走的敌人（卷7第91—93条）。该法典认为这些皆为“武士种姓无可非议的和首要的法律；刹帝利在战斗中杀敌时，决不可违犯它”（卷7第98条）。这些对待敌人、善待俘虏的规定，已接近于现代国际法规定的条款，它为我们论述的这个充满血腥屠杀的世界，染上了一点人道主义色彩，为古代世界所罕见。

古代印度军人，从各级军官到士兵均有薪俸。据《政事论》记载，帝国时代军人的薪俸如下：军队总司令官年薪为4.8万帕那，军队司令官1.2万帕那，要塞司令1.2万帕那，军队首长、象兵司令、骑兵司令与车兵司令各8000帕那，步、骑、车、象诸长官各4000帕那，军医、驭手、驯马驯象者各2000帕那，甲冑监督1000帕那，训练过的士兵500帕那，吹喇叭者500帕那，象馆500—1000帕那，固定密探1000帕那，流动密探500帕那，引导密探的仆人250帕那。

古代印度一种币制单位，其重量已不可考。

(3) 兵器与战术

古代印度兵器种类较多。列国时代，据说已有 86 种不同的武器和 84 种棍棒，较常用的有 10 种，如弓箭、矛、标枪、战斧、剑等。史诗中还提到几种威力较大的军械，一种是铁制或钢制的能飞旋的铁饼；一种是火箭，据说一次能杀死一百人；还有一种是能发巨石的弩炮。防护性装备有盾牌、金属盔、衣甲、护胫、射箭手套等。

帝国时代兵器种类更多，依其作用可分为军械、进攻武器与防御装备三类。据《政事论》记载，军械类共 26 种，其中固定的器械 10 种，活动的器械 16 种。前者如：萨尔瓦多帕陀罗，是一种投石机，状如车轮，安于城墙上，一转动轮盘，石块即若骤雨般降落；波胡木哈，是置于城墙上的守望塔，数名弓箭手可在此一齐射箭；亚那迦，为一种安装在轮子上的长木棍，可向敌人投掷。活动器械如：优特帕提摩，这是一种钉有许多铁钉的大木梁，置于城上，用以滚杀攻城之敌；苏迦里卡为一种预防敌人投掷石块的大型皮囊，内装棉花或羊毛；旁查利迦是一种在木头上钉许多铁钉的障碍物，放在护城河中，防止敌人攻城；斯帕里克陀拉为一种带刺的粗木棍，即大狼牙棒。这些军械主要用于城防。进攻性武器约 20 余种，尖端锋利的有 11 种，如砾积底，约 4 臂长的金属制手执武器；恭特，长 5—7 臂的标枪；帕罗斯，长约 24 英寸的双柄铁制兵器；尖端如猪耳形的锋利木棍；重量 7—9 迦尔沙的轻投矛，以及三角矛、尖角矛等。此外，还有弓箭、剑、斧、铲、戟、锯、镐等。其中弓箭最受重视，弓长约与持弓者身高相等，箭长约 3 肘，制作得非常强劲，射箭时人需坐在地上，用左脚蹬着弓背，再把弓弦往后拉满，故印度弓箭手射出的箭，据说无论是盾牌、胸铠还是盔甲都能穿透。《政事论》记载的防护装备有 20 种，大致可分为衣甲与盾牌两类。衣甲包括全身甲、头盔、咽喉甲、胸甲、膝甲、手甲几类，或皮制，或植物纤维制，但铁制居多；盾牌有木制、竹制、兽皮制等。

古代印度军队作战是列阵而战，阵法多样。吠陀时代的战法，据有的学者研究，大致是：“军队伴随着高昂的战歌、鼓号的响声，挥舞着军旗迎战敌人。战士站在战车的左边，他们身旁是驭手，步兵以密集的阵列战斗，村落联着村落，部落接着部落。武士以黄铜衣甲和头盔防身，用弓向敌人发射羽毛箭，带毒的箭头用兽角或金属制成；或用矛、斧、标枪和投石器追杀敌人。当敌人被征服时，欢呼声、鼓乐声响彻云霄，如同暴风骤雨”。这段描写颇为生动。列国时代，阵法增多，据《摩诃婆罗多》记载，有针阵、苍鹭阵、鹰阵、鳄鱼阵、圆阵、雷电阵等。佛教文献《四分律》也载：“阵者，四方阵，或圆阵，或半月形阵、或张甄(zh n)阵，或函相阵”(卷 16)。可惜这些阵法仅存其名，我们已难知其如何布成。帝国时代的阵法，据《政事论》记载，主要有 4 种：

一臂为肩关节至中指尖的长度。

1 迦尔沙相当于 16 克。

一肘为肘关节至中指尖的长度。

马俊达：《古代印度军事制度》，加尔各答，1955 年版，第 23—24 页 (B.k.Majumdar, The military System in Ancient India, Calcutta, 1955)。

若正面进攻，用“鳄鱼阵”；若从两翼进攻，用“金刚杵阵”；若从后面进攻，用“车阵”；若从四面进攻，则用“密集阵”。可见阵形多变。攻城战术也较多，《政事论》提到有4种：污染敌人护城河或将其排干；挖地道或用装甲象冲开缺口；如守敌甚众，则以攻城器械摧毁之；使用各种火攻手段。

总之，古代印度的武器装备与战术十分丰富，以至有学者认为：“在作战技术上，印度人远较亚洲其他民族优越，”古代印度人“所以未能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者，往往是由于骑兵的劣势所致。古代印度的指挥官更多地信赖象而不大信赖马。”若单以武备而论，此说较有见地。

2. 摩竭陀的统一战争

公元前6—前3世纪在印度历史上是一个列国割据走向国家统一的过程，亦即摩竭陀国家发展壮大、吞并邻国、建立统一帝国的过程。在此期间，还伴随着波斯和马其顿的入侵。

(1) 摩竭陀称霸列国

自公元前6世纪始，印度进入了列国时代。当时，次大陆北部有16个大国，重要的有摩竭陀、迦尸、鸯伽、居萨罗、居楼、拔祇、末罗等，它们多位于恒河流域。众列国中，地处恒河中游的摩竭陀最为强盛。该国初期的历史，我们所知甚少，但在曷利昂伽王朝（公元前554—前430）时期，摩竭陀开始勃兴。该王朝的频毗沙罗（即瓶沙王，约公元前554—前493）统治时，采取远交近攻之策，与西北部的犍陀罗、北部的居萨罗等国交好，全力吞并东邻的鸯伽，两国经常发生战争。据《佛本生经》记载，“两国交界处有一条瞻波河，那是蛇王的住所，蛇王坎皮耶统治该河。有时，摩竭陀国王攻取鸯伽国；有时，鸯伽国王攻取摩竭陀国。有一天摩竭陀王与鸯伽国打了一仗，他见形势不好，乘马而逃，鸯伽兵紧追不放。他跑到瞻波河边时，恰洪水上涨。他想，‘宁可淹死在河里，也不死于敌人手中’。随后他连人带马一起投入水中。那时，蛇王坎皮耶在水中建有一座用宝石装饰的宫殿。这时他正在庭院里沉醉于狂饮欢宴中，恰巧跳进水中的国王和马正落在蛇王面前。蛇王见到这位魁伟的国王后对他怀有好感，站起身来让他坐在自己的王位上，叮咛他不要害怕，并问他为何投河自尽。国王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蛇王听后说：‘不要害怕，大王，我将使你成为两国的主宰。’他这样安慰他，连续7天对他非常尊重，至第7天，蛇王和摩竭陀王离开了蛇宫，借助蛇王之力，摩竭陀王俘获了鸯伽国王，将其杀死，两国同归他统治”（卷4第506目）。这个故事虽属神话，但最终，摩竭陀征服了鸯伽。由此，摩竭陀控制了恒河下游，夺得了与南方贸易的水路通道，经济实力增强。瓶沙王称霸列国的主要手段是外交和联姻。相传他有500个妻子，大部分是其他国王的公主，其第一夫人为居萨罗国王波斯匿之妹，嫁妆是一个岁入10万钱的迦尸村。瓶沙王的外交政策，扩大了摩竭陀的影响，征服鸯伽后，国土扩大，据《五分律》的夸张说法，境内共有4.2万个村落。

公元前 493 年左右，阿闍世（约公元前 493—前 462）弑父继位，积极推行扩张政策。阿闍世的弑父暴行，引起居萨罗王波斯匿的仇恨，收回其妹的嫁妆迦尸村，遂成为两国相争的导火线。初时阿闍世获胜。后来，波斯匿王采用一隐士的车阵战术，把精兵布置于山顶的两侧，包围了阿闍世，迫使他率军投降。这是《佛本生经》的记载。《撰集百缘经》记载的战术则不同：波斯匿采纳一将士的建议，集中 4 兵种设阵，“于阵前锋，先置健夫，次置中者，后置劣者。”“寻共交战，即破彼军，获其象马，即便捉得阿闍世王，大用欢庆”（卷一）。虽然各经所载情节不一，但结局均为和平解决，据说波斯匿王嫁一女给阿闍王，双方联姻。阿闍世进行的另一场大战是进攻北方的拔祇国。拔祇国势力较强，与末罗、迦尸、居萨罗结成东印度政治联盟，并任盟主。阿闍世为征服该国，先在恒河南岸营建华氏城，“以防拔祇国”；继则施以政略，破坏其内部团结；最后才兵戎相见，战争从公元前 484 年持续到公元前 468 年，长达 16 年之久。战争详情已不可知，但互有胜负，据佛教文献记载，一次水上大战，阿闍世大败，“单马回国”。最终，阿闍世取得了胜利，不仅征服拔祇，连迦尸、末罗等国也被迫臣服。他成为了东印度的霸主。

阿闍世的后代和取而代之的希苏那伽王朝（公元前 430—前 364）统治时，继续推行扩张政策，征服摩竭陀西部的阿般提，进而吞并拔沙、居萨罗等国，称雄列国。约公元前 364 年，摩诃帕德摩·难陀暗杀希苏那伽王朝的末代皇帝，建立难陀王朝（公元前 364—前 324）。据史料记载，摩诃帕德摩是位理发匠，成为王后的情夫。由于她的影响，他取得了国王的信任，升至近臣的地位，阴谋谋害了国王，以后充当王室儿童们的监护人，篡夺了最高权力，杀死年轻的诸王子，当上国王。他是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和征服者，在位 28 年，先后征服了迦尸、居楼、般闍罗等 11 国，统一了整个恒河流域，其版图扩张到中印度部分地区。至此，除西北一隅外，摩竭陀已统一了次大陆北部，成为南亚第一强国。在古希腊作家的笔下，难陀王朝相当强大，其军事力量甚为可观。据柯蒂阿斯报道，它有骑兵 2 万，步兵 20 万，战车 2000 乘，战象 3000 头。普鲁塔克报道的数字更高，据他说有骑兵 8 万，步兵 20 万，战象 6000，战车 8000。故有的学者猜测，亚历山大兵取印度西北部后，之所以未进军恒河流域，除士兵厌战外，难陀王朝军力的强大也是原因之一。

（2）反马其顿的战争

正当摩竭陀国逐步统一恒河流域之时，印度西北部先后遭到了波斯和马其顿的入侵。公元前 6 世纪前半期，西北印度小国林立，重要者有犍陀罗、剑浮沙、波罗斯等。居鲁士建立波斯帝国后，曾一度用兵东征，将印度河以西地区纳为属国。公元前 518 年，大流士进一步东进，征服犍陀罗，占据了印度河流域。西北印度诸国虽然向波斯称臣，但独立性较强。公元前 4 世纪马其顿兴起，其国王亚历山大消灭波斯帝国后，于公元前 327 年率军侵入印度河流域。有些小国不战请降，但有些国家和部族则兴起抵抗，在这些反马其顿的御敌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是海达斯皮斯河之战。

海达斯皮斯河是印度河以东第一条支流，该河东岸是由波罗斯王统治的国家，军力较强。亚历山大降服 叉始罗国后，决定征服这个国家。波罗斯王为抵抗侵略者，于公元前 326 年亲自率大军防守该河东岸。其战斗部署如下：200 头巨象布置在约 1000 名步兵之间，排成 8 列，组成中央战线。波罗斯坚信这一特意部署的巨兽会吓倒敌兵，并使其战马受惊而难以驾驭。在象的后面部署了由 3 万名步兵组成的密集队伍，两翼凸出，步兵的纵列从象群中间向前推进。整个阵势颇似城池，站立的象群有如城池的塔楼，象群中间排列的步兵则如塔楼间的一道道墙。战线两翼有骑兵和战车掩护。骑兵为 4000 名，战车 300 辆。

亚历山大兵至，见敌于对岸列阵以待，难以明渡，便令骑兵于夜间沿河堤来回奔跑，虚张声势，佯装强渡，他则亲率步兵 6000、骑兵 5000，秘密在该河下游不远处的一岬角地带渡河。接近对岸时，始被敌方哨兵发觉。波罗斯即派 2000 骑兵与 120 辆战车前去拦截，但为时已晚。亚历山大击溃这支援军后，沿河而上，直扑波罗斯的大军。在此战中，亚历山大改变了传统的布阵方式，令步兵方阵居后，骑兵居前，并派 2000 骑兵迂回至敌军左翼之后。战争伊始，亚历山大的骑兵即前后夹击印度的左翼骑兵，使之难以招架，向大象靠拢。印度象信急忙驱象迎战，但马其顿方阵适时向前推进，从四面八方它们投枪射箭，并因此而乱了自己的阵脚，被大象撞了个乱七八糟。印度骑兵见有机可乘，再次出战，却被马其顿骑兵击回。不久，马其顿步兵在骑兵的配合下，将战象挤到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这些大象胡冲乱撞，践踏破坏。不管是敌是友，都受害不小。……有的大象由于厌烦，又已无人驾驭，……仿佛被大祸临头刺激得发了疯，不停地左奔右突，横冲直撞，践踏破坏，不遗余力”。马其顿部队有回旋余地，“大象冲来，他们就退；大象一逃，他们就追。一直不断地用标枪投射它们。”而印度部队却与此相反，他们夹在大象之间，受的伤害更大。当大象精疲力尽、缓缓后退时，亚历山大令骑兵将其围住，同时令步兵重整密集方阵进攻，结果，印度骑兵几乎全军覆灭，步兵也伤亡惨重。战斗中，波罗斯表现很出色，“他不但是位统帅，而且也是一名勇猛的战士，”“只要哪怕还有一部分部队仍在坚守阵地继续战斗，他本人也继续英勇战斗”，不过最后，他终于被迫投降。此战，据阿里安记载，印度步兵阵亡者近 2 万，骑兵约 3000，战车全部被毁，幸存大象全部被俘；马其顿方面，步兵战死者约 80 人，骑兵约 230 人。

海达斯皮斯河战役的最大特点是象战，这亦是世界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象战。亚历山大于此一役，打了他平生战术运用最为卓越的一仗。征服波罗斯国后，亚历山大继续东侵，占领了一些土地，但由于士兵久离故国、厌战情绪与日俱增，只得班师西归。不过，他已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并驻军留守。

(3) 孔雀帝国的战争

亚历山大撤军后，西北印度局势动荡，反马其顿的起义时有发生；

马俊达：《古代印度军事制度》，第 66—68 页。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 175—176 页。

而东印度的难陀王朝，由于横征暴敛，统治亦不稳定，人民起义不断。因而，整个印度北部一片混乱。此时，出身卑微的旃陀罗笈多在二代谋士考底利耶的辅佐下，乘机崛起于乱世，从各地招募军队。据《政事论》记载，他招募的队伍由五种人组成，即强盗和匪徒、蛮人、有组织的行劫匪帮、森林居民、最英勇的武士宗族部落。他以这支队伍起家，很快成为义军首领，较顺利地打败了马其顿驻军，占领了印度河流域及其以东的大片土地。约公元前 324（或前 321）年，他在西北部自立为王，而后又兴兵东征，推翻了难陀王朝，建立了孔雀王朝（公元前 324 或前 321—前 187）的统治，公元前 317 年，马其顿驻军全部撤离，从而统一了北部印度。公元前 305 年，塞琉古王国力图恢复对印度河流域的统治，侵入印度，旃陀罗笈多与之进行了两年的战争，详情无记载，仅知战争于公元前 303 年以印度胜利而告终。根据双方和约，孔雀王朝取得了印度河流域以西直至今阿富汗的部分地区；作为报答，回赠战象 500 头。

约公元前 297 年，旃陀罗笈多去世，其子频头沙罗（约公元前 297—前 272）即位。关于此人，除了他的名字外，其他几乎一无所知，但从其绰号“歼敌者”来看，他在开疆拓土方面可能有所贡献。至其去世时，孔雀帝国的版图已扩张到德干高原，整个印度半岛仅东海岸的羯陵伽及南端的几个部落尚未臣服，后由其子阿育王完成。

阿育王（约公元前 269—前 232）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年青有为，曾被其父两度任为总督，平服过又始罗的叛乱。他即位之初极为暴虐，据佛教文献的夸张记载，曾残杀同父异母兄弟 99 人，诛杀 500 大臣、500 嫔女，并设人间地狱。其主要战功是征服羯陵伽，完成了印度半岛的统一，将帝国带入了极盛时代。在孔雀王朝统治前期，羯陵伽是一个独立国家，海外贸易发达，经济富庶，军事力量亦较为强大，拥有步兵 6 万，骑兵 1000，战象 700 头。阿育王即位的第八年，起倾国之师大举进犯羯陵伽。这是印度古代史上规模最大、也最有影响的一次大战，可惜其详情无史料记载。此战使羯陵伽受到了空前的浩劫。据阿育王 13 号摩崖诏令记载，他“从那里掠走的人数是十五万，在那里有十万人被杀，并有许多倍于此的人死亡。”

羯陵伽战争标志着孔雀帝国武力扩张时代的结束和文治时代的开始。据说，阿育王对此战所造成的灾难深感悔悟，皈依了佛教，以佛法治国，从而使其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在其第 13 号摩崖诏令中说：“征服羯陵伽国以后，天爱善见王（即阿育王）便专心致志地热衷于正法的义务，渴求正法，并在百姓中灌输正法。这是由于天爱善见王对征服羯陵伽深感悔恨的缘故。在征伐一个独立国家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屠杀、死亡和人们的流放，对此天爱善见王感到无限的痛苦和悲伤……。天爱善见王现在认为，通过正法赢得的胜利，才是最高的胜利……。凡是利用这种方法取得的胜利，到处都能洋溢出一种称心如

Chandragupta 一词之音译。据说他出身于乡村一个养孔雀的家族，故称其建立的王朝为孔雀王朝。

亚历山大死后，他建立的帝国三分，其部将塞琉古（Seleucus，公元前 305—前 280 年在位）控制西亚，建立塞琉古王国（公元前 305—前 64）。

《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0 页。

意的气氛，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会如此。”阿育王之所以改变政策，与其说是真心奉佛，不如说是当时四宇平服之故。但以文治取代武功，是值得肯定的。不过，阿育王后期奉佛，显得过于虔诚，不但本人奉法忌武，还诏令子孙后代采取“忍让政策，”这必然导致忽视武备的加强。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摩竭陀帝国的尚武精神，随着羯陵伽战场上的最后一声哀鸣而消失。阿育王放弃了祖传的军国主义而发扬正法取胜的政策，它必然会严重削弱帝国的军事实力。”有的学者进而认为：“羯陵伽的征服标志着孔雀王朝政治势力衰弱的开始。由于羯陵伽战争的杀戮而在阿育王心灵上所产生的变化，引起了孔雀帝国政策上的革命。正如所有热衷于宗教而放弃政治谋略的国王一样，阿育王为外族征服印度铺平了道路。”的确，阿育王死后，孔雀帝国便很快衰落了。究其原因，若单从军事方面而言，以上所论不无道理。

3. 《政事论》的军事思想

《政事论》是古代印度一部重要的著述。传统认为它是孔雀王朝的开国功臣考底利耶所著，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另有些学者认为，该书非考底利耶所著，其成书较晚，或云公元1世纪、公元3世纪，乃至公元7世纪始成书。但该书的核心部分写于帝国初期，是研究孔雀王朝时期社会状况的珍贵史料。全书15卷，论及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军事等内容，中心是讨论治国安邦之策。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一部军事著作，因为它不仅讨论了兵制、兵种、编制、薪俸、兵器、防御设施等问题，也含有较丰富的军事思想，简介如下：

(1) 战争观《政事论》认为，战争与外交、国力紧密相联，欲取得军事胜利，就必须善于利用外交手段，同时充实国力。它指出，在国际斗争中共有6种外交策略，即和平（缔约）、战争（彼此伤害）、对峙（冷淡）、进军（力量增强）、寻求庇护（附属他国）以及双重政策（与一方和平而与另一方战争）（第7卷第1章第2目，后文简称为7.1.2）。国王使用何种策略，应视自己的条件而定：处于劣势则和平，国势兴盛则战争，势均力敌则对峙，具有优势则进军，力量耗尽则寻求庇护，有盟国相助则诉诸双重政策（7.1.13—18）。概而言之，就是一切以我为中心，审时度势，合于利则战，不合于利则止，在国际斗争中，不存在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战争之胜负是对综合国力的检验，因而《政事论》十分重视增强国力。它提出了“国家七要素说”，认为国家是国王、大臣、国土、卫城、国库、军队和同盟七种要素组成的一个有机体。七要素关系合谐，则国力强盛；反之，则国力衰弱。七要素中，国王是核心，大臣辅佐国王，其他五要素是国家得以维持的基础。国土是生产、税收、

葛维钧《阿育王铭文》摘译，见《古印度帝国时代史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雷乔杜里：《古代印度政治史》，加尔各答，1953年版，第365页（H-Ray-chaudhuri, Political History of Ancient India, Calcutta, 1953）。

班纳吉：《史前、古代和印度教时期的印度》，德里，1979年版，第92页（R·D·Benerji, Prehistoric, Ancient and Hindu India）。

参阅崔连仲《从佛陀到阿育王》，第三章第三节：“考底利耶的治国安邦策”。

兵力的源泉，没有国土，则一切无从谈起。它说：“卫城的保证、国库、军队、供水系统和谋生职业，在国土上有它们的源泉”（8.1.29）。军队是国家的支柱，它“植根于国库，如果国库匮乏，军队则倒向敌人或杀害国王”；反之，“如果缺少军队，则国库肯定丧失，”因为“军队是获得和保护国库的手段”（8.1.48，43，51）。卫城是国防的据点，“国库和军队都处在卫城中，这个地方也是危难时本国人民的避难所”，如果缺少卫城，则国库将落入敌手”（8.1.25，39）。《政事论》十分重视军事与国力的相互关系，并把军事置于国际环境中加以考察，这种从宏观上来探讨军事问题的思路为当时世界所罕见。（2）战略战术论

兵种与地形。《政事论》将军队分为步、车、骑、象四个基本兵种，并分述其作用：骑兵的作用是在地面、宿营地和森林中搜索敌人；占领平坦地、水池、渡口、有利地势；摧毁敌人的供应与贮备，保护我军的供应与贮备；清剿敌人、坚定军心；扩大袭击范围；驱赶敌人；向敌人首先发动进攻；穿插、分割与突围。象兵的作用是行进于部队前列；开辟新路、临时营地和渡口；驱散、践踏敌人；渡河与下水测试深度；稳定军心；破坏敌人的防卫土墙、城门和塔楼。战车兵的作用是抵抗敌人的四军；瓦解未被击溃之敌；使敌恐惧；显示我军强大；制造恐怖的喧嚣声。步兵的作用是随时随地携带兵器，准备作战（10.4. 13—16）。四兵种作战，要因地制宜：若地势平坦、能见度好、土质坚硬，用车兵；若地势起伏不平，则用其他三兵种。

因敌制胜。《政事论》提出，打击敌人要战术灵活。以精兵对敌弱兵，以双倍于敌的兵力攻敌劲旅；不断骚扰敌人，乘其疲惫予以歼灭；若敌军强大，应先以敌之叛军、外国军队、森林部落军队与之相拼，消耗其兵力，而后予以重创。进攻方向的选择，应视地形而定：若敌之前方阵地崎岖不平，则从后面进攻；若敌之后方阵地崎岖不平，则从前面攻之；若敌之一翼阵地居险要之地，则从另一翼进攻。所有这些，均体现了灵活用兵、因敌取胜的战术原则。这与我国古代《孙子兵法》所提出的以逸待劳、以强击弱、集中优势兵力等作战原则极为相似。

料敌我之备，决定攻退。《政事论》对此作战方法论述较为详细、具体。它列举了不宜作战的17种情况（第10卷第2章）：在密林和荒野中长时间行军；在无水的地方；无饲料、燃料和饮水时；在艰难的路上行军；遭敌袭击而蒙受伤亡时；为饥饿所折磨时；通过沼泽地、水深的河流、攀援于坎坷不平的谷地和山峦时；拥挤于只能单行的道路上时；在崎岖不平的山路小径上行军时；军中无辎重时；正在用餐时；经长途行军而疲惫不堪时；正在睡觉时；受疾病、时疫和饥谨袭击时；步兵、战马、战象生病时；未占取有利地形时；当所有灾难共同降临时。在上述境况下，不宜作战；反之，若发现敌人处于上述诸境，则应立即用兵歼灭之。概而言之，就是当天时、地利等因素于我有利，则兴兵而战；若于敌有利，则息兵退守。

秘密战争。《政事论》将战争分为三类，即公开宣战的战争、突然袭击的战争和无声的战争，无声的战争即秘密战争。这种战争由密探来进行。该书将密探分为国内密探与国外密探两类，国外密探除深入敌国搜集情报外，还要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如在敌营中扮着酒保，应伺机将毒酒送给敌兵；或贩卖熟肉、熟食，

将毒药掺于其中，贱价赊销给敌兵；扮着商人者应将毒药投入象、马的饲料中，使敌人的骑兵、象兵不能出战；扮着牲口贩子、猎人、耍蛇或耍象者，临战之时应将各种毒蛇猛兽驱入敌营，加剧其混乱；扮着铁匠者应乘乱放火；伪装成叛军、外国军队和森林部队的密探队，应背后下手，里应外合；隐藏于森林中的密探，应在狭路上破坏敌人的运输线，袭击敌人的援军和辎重队；夜战时，密探应制造混乱或恐怖，或潜入敌国国王寝帐，将其暗杀（12.4.1~22）。《政事论》十分重视密探的作用，它设想的敌后密探，已成为一条无形的战线。

结盟与树敌。《政事论》是为一个“未来的征服者”写的。这位征服者要征服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许多国家，如何逐一消灭呢？这就需要结盟与树敌，施以远交近攻之策。《政事论》认为，邻国是天然的敌人，而敌人的邻国则是自己的盟友，应尽力争取；但盟国与敌国并非永恒，一旦消灭了邻国，昔日盟友即成为敌人，应消灭它。在征服战争中，对强国要加以武力打击，同时运用各种手段离间它与其盟国的关系，乘其彼此矛盾之际从中渔利；对弱者则应施以安抚政策；对盟友应使其处于不强不弱的状态，因为强则难以控制，弱则不足以牵制敌国。

总之，《政事论》含有丰富的军事思想，既有宏观探讨，亦有微观描述，在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已被译为多种文字。但它往往是就事论事、直观描述，未作高度提炼，较少使用概括性较强的术语，故其理论性稍显不足。

八、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

东周始于周平王(公元前 770—前 720)东迁洛邑,一般以公元前 476 年为界,分为春秋(公元前 770—前 476)与战国(公元前 475—前 221)两个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时代由统一王朝分裂为诸侯争雄、再走向统一的时期,是社会急剧变革与充满战争的时代。春秋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据统计,军事行动共 483 次,大战 376 次;战国时代,“天下并争”,战事更为频繁与酷烈,“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孟子·离娄篇》)。此兵连祸结的形势,乃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这一深刻转型的反映。

这一时期,由于铁农具和牛耕技术的推广,水利灌溉事业之发展,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农业奴隶逐渐解放,自耕农普遍出现,国、野界限弥合,井田制瓦解。其上层建筑之反映则是王纲解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再变为“自大夫出。”于是出现了春秋五霸相迭、战国七强争雄的局面。随着战争的升级,各国为适应规模愈大的战争,相继改革军制,以致武装力量体制、兵役制度、军事法规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并渐趋完备,初显我国封建社会军制之端倪。与此同时,作战方式从车战发展为步骑兵作战,战术有了重大革新,出现了总结军事经验的著述,军事思想也取得了辉煌成就。

1. 军制与战术

(1) 指挥系统

军事领导权的变化。西周时期,天子分封诸侯,为之建国,诸侯分封卿大夫,为之立家,各有武装,但统属周天子。《国语·鲁语》载:“天子作师,公帅之,以惩不德。元侯作师,卿帅之,以承天子。”由于王掌军权,故“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春秋前期,大体也保持这种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三级制。春秋中后期,周王军权沦丧,齐桓、晋文等五霸迭相登场,“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尊王攘夷”的名义,直接向中小国家征赋调兵,剪除异己,扩充势力,公开与周王分庭抗礼,由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此后,军权仍在下移,诸侯军权又旁落卿大夫之手,以至“公室益卑”,“政在家门。”至春秋末期,公室军权被各卿大夫瓜分殆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变为“自大夫出。”卿大夫成为战国时期新兴诸侯之前身。战国时代,七雄并举,经过争霸和制度改革,各国建立了封建政权,国君独揽军政大权,确立了国君——郡县——乡里的军事领导体制。同时,在军队管理上,实行文武分职。为确保国君牢掌军权,各国均实行兵符调兵制。兵符是国君任将时颁发的军权凭证,其状如虎,故又称虎符。兵符分为两半,左半由领兵者执持,右半留于国君手中,两半相合,方有调兵权。凡发 50 兵以上者均凭兵符行事。春秋战国时期,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经历了三级旧制到虎符调兵制的演化过程。

武官系统的独立。春秋时期,军队最高统帅为国君,军队各级指挥官概由卿、大夫各级贵族担任,即实行“军将命卿制”。这与西周无异,文武不分,将相合一。据《周礼·夏官》,当时的领导体制大致是:

大司马(军)——小司马(师)——军司马(旅)——舆司马(卒)——两司马(两)——公司马(伍)。当然,具体到某一国,可能稍有出入。如鲁、宋二国的司马仅司军赋,或掌武备,并不领兵。战国时代,各国相继废除“军将命卿制”,实行政武分立、将相分职。国君之下,最高文官为相,武官为将。将的称谓不一,齐、赵、魏、燕称将、将军、上将军、大将军;秦国先后称大良造、将军、国尉;楚称柱国、上柱国。随着将相分职和武职的固定,军事机构也建立起来,据《六韬·王翼》载,“将”有作战、参谋、通讯、侦察等 72 名辅助人员,相似于今日之司令部。“将”以下的武官也较完备,如秦国即设有左右将、副将、万人之将、千人之将、帅、卫尉、中尉、兵尉、持节尉、伯长、什长等。与此同时,在郡、县、乡、里也建立了由国君统一控制的掌管军队的各级军职。

(2) 武装力量体制

兵力估算。随着战争的逐步升级,春秋前期、后期与战国时期,兵力总数变化较大。春秋前期,大致是大国三军、车千乘。依《周礼·夏官》的“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计,则齐、晋、秦、楚诸大国的兵力各近 4 万。春秋后期,各国兵员明显增加。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晋国约有战车 5000 乘;楚国仅 4 县就“赋皆千乘”,战车当不下晋国;齐艾陵一战,损车 800 乘,秦一公子奔晋,带车千乘,估计秦、齐二国各有战车二三千乘。若依每乘兵员 75 人计,则晋楚大国兵力不下 30 万,齐秦等国也不下 20 万。总兵力比前期增加约五六倍。战国时期,各国兵力空前扩大,兵员剧增。至战国中期,动辄以“带甲数十万”、“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计,连最弱的韩国,也有兵卒 30 万(《战国策·韩策一》)。当时兵力总数约为:步兵 540 万—580 万,车 5400—5800 乘。一车以 8 人计,则车兵约为 4.5 万,骑兵 5.2 万。总计约为 570 万。

较春秋后期,兵力增加 1 倍多。

兵种及其编制。春秋时期,各国武装力量大体由两部分构成。(一)国家军队,包括王室军队和诸侯军队,此为常备军;(二)家兵,包括王侯禁卫军与卿大夫的族军。其兵种有四:车、步、舟、骑。战国时代,武装力量主要由规模庞大的常备军及禁卫军组成,族军则不复存在。同时,步兵剧增,骑兵独立,舟师强化,是其不同于春秋的特点。

车兵是春秋首要兵种。各大国战车均在千乘以上,至中后期,数量更多,各国有 2000—5000 乘不等,可谓车兵鼎盛时期。车兵由甲士与徒兵组成,一车甲士 3 人,驾者居中,持弓者居左,操矛者居右;车下徒兵,春秋前期为 27 人,后期为 72 人;加上所配给的一辆辎重车上的 25 人,则春秋后期一乘兵员为 100 人。

据此,最近有的学者参照《司马法》与《周礼·大司马》,估计春秋中期以后的车徒结合编制或许如下:

伍——两——卒——旅——师——军《周礼》5 人 25 人 100 人 500 人 2500 人 1.25 万人乘——小偏——偏——伍《司马法》1 乘 5 乘 25 乘

125 乘至战国时代，车兵地位下降，战车减少，各国最多不过千乘，编制也相应减少，从秦兵马俑来看，一乘车卒约为 8 人。不过，战车装备有所改进，有的轴端装有矛头，用以冲杀。

步兵。春秋时代，除车下徒兵外，还有独立步兵。中原诸国，最早使用独立步兵的是郑国，公元前 719 年，曾用“徒兵”作战；公元前 632 年，晋“作三行以御狄”，“三行”即左、中、右三行，这可能是最早的独立步兵建制；公元前 542 年，晋将魏舒（？—前 509）“毁车以为行”，临时解散车兵为步兵，打败狄人。在北方山国及南方的吴越，步兵是首要兵种，如吴楚柏举之战，吴用“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所谓“多力”“利趾”，即步兵劲旅。当时吴国步兵编制为：行（100 人）——旌（1000 人）——方阵（1 万人）（《国语·吴语》）。这说明春秋时代步兵已渐展威力。至战国时代，步兵成为主要兵种，其规模远非春秋可比。各国均有几十万乃至百万步兵，名称也繁杂，如“武卒”、“苍头”、“武士”、“带甲”、“虎贲”、“技击”、“锐士”。除步卒外，还有侦察兵、通讯兵、辎重兵等。战国步兵刚脱离车兵独立，其编制还受车兵编制的影响。其编制情况，据《尉缭子·伍制令》载为：五人为伍，十人为什，有什长；五十人为属，百人为伯，有伯长；伯长之上有千人之将、万人之将。万人之将以上有左右将，再以上为大将军。但各国编制仍存小异，如秦为：伍（5 人）——屯（50 人）——将（100 人）——五百主（500 人）——二五百主（1000 人）——大将（《商君书·境内》）。

舟师。舟用于战，始于春秋。当时吴、越、楚等水乡，舟师已成为一新兵种，常用于战争。如公元前 549 年，楚“以舟师伐吴”；公元前 508 年，吴以舟师败楚；公元前 485 年，吴舟师浮海北上伐齐。春秋中后期，舟战技术和造船能力均有较大提高，舟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战国时期，吴、越、楚、齐、秦等国，舟师有了更大的发展，成为独立兵种。舟师的规模也相当大，如秦有战船万艘，“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史记·张仪列传》）。吴越的舟师数量多且种类齐全，有小羿（yì，一种船）、大羿、楼船、桥船等。舟兵经过专门训练，除使用弓、弩、戈、戟等常规兵器外，还有专用于水战的钩矛，能“退者钩之，进者拒之”（《墨子·鲁问》）。春秋战国舟师编制，无文可考，不过《越绝书·兵法》所载吴越大羿的编制，或可供参考：“大羿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zhào，桨，此处意为桨手）五十人，舳舻（zhú lú，船尾船头）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各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 91 人。

骑兵。春秋时期，中原周边游牧部落和国家，已有为数可观的骑兵；中原诸国是否亦有，尚存质疑。战国七雄中最早建骑兵者，当推赵国。公元前 307 年，赵武灵王（公元前 325—前 299）“胡服骑射”，效法蛮族，着短装、束皮带、穿皮靴，以利骑马射箭，建立了正规骑兵，曾“率骑入胡，辟地千里。”此后，他国先后也建立了骑兵部队。骑兵机动性强，“能离能合，能散能集”，孙臆曾指出其有“迎敌始至”、“迎敌击后”、“绝其军粮”、“出其不意”、“烧其积聚”等十利，故发展较快，七雄骑兵，各有数千匹乃至万匹，成为仅次于步兵的第二大兵种。值得注意的是，战国中后期，不仅用骑兵单独作战，也用它与步、车协

同作战，如赵将李牧（公元前？—前 228）曾以骑兵 1.3 万，与步、车联合，斩匈奴 10 万余骑。战国骑兵的编制，据《六韬·均兵》载为：5 骑一长，10 骑一吏，100 骑一率，200 骑一将。但各国是否都如此，尚难核实。

武器装备。春秋兵器为青铜制造，大体可分三类。（一）进攻性兵器，如戈、矛、剑、戟、殳（sh，一种竹制兵器）等，其制作工艺提高，规格划一，开始制式化。（二）抛射性兵器，即弓箭，箭头为青铜质，形制由传统的扁体型改为三棱锥型，提高了穿透力与杀伤力；弓用“干、角、筋、胶、丝、漆”六材制成，质量大为提高。春秋后期，出现了弩。（三）防护性兵器。以皮甲为主，有人甲与马甲之分，人甲由身甲、甲裙、甲袖组成；身甲由胸甲、背甲、肩片、胁片约 20 片编成。马甲由马胄（护马头）和马甲（护马身）组成。攻防设施也有进展，各国都蜂起筑城，墙高堑深，悬门锁城，已形成较完整的防御体系。同时，攻城器械也应运而生，有掩兵堆土的辘轳（f8n w5n）、攻城的大櫓（盾）、登城的云梯、撞击城门的重型冲车等。各类武备，皆由官府制作保管，战时发给将士，即所谓“授甲”“授兵”。

战国时代，由于铁器开始使用并得到推广，武器装备较春秋具有四个特点。（一）传统的进攻武器如矛、戈、戟、剑、箭等更为锋利，且多为铁制，杀伤力提高。春秋后期始出现的弩得到改进，成为当时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先进武器，并普遍使用；种类有用手臂发射的“臂张弩”，脚踏发射的“蹶张弩”等。弩的弓力大、命中率高、穿透力强，能“发于肩膺之间，杀人于百步之外”。（二）发明和改进了一些新式进攻武器，如云梯、钩拒、铁杖、铁椎、方脑铁叉、铁械锁、斧、钺等。其中，云梯与巢车、楼车等普遍用于攻城。这是因为，战国时代强调“四塞以为固”，各国均加强关塞城池的防御能力，同时修筑长城，加强国防建设。（三）防护性武器制作更为精致，如在河北易县出土的一件战国后期的铁胄，以 89 块铁片组成，从顶部一层压一层编缀，共 7 层，高 27 厘米。（四）武备管理更趋完善，统一由国家制造与管理，有专门的兵器库，已形成定期发给军队兵器、车辆、甲胄的制度。另外，战国军队还实行“采章”制度，各分队所属士卒需在不同的部位佩戴颜色不同的徽章，以便区别和管理。

（3）兵役制、军赋制与军训制

整个先秦时代，奉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因而兵役、军赋、军训三者密切相关。

兵役制。西周时期，实行国人兵役制，国人“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春秋初期仍沿此制，如管仲在齐国“作内政而寄军令”：“五家一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国语·齐语》），即是此制。居民军事化，出为伍，入为农，战时为兵，闲时军训。他国亦大同小异。与此同时，为保持一支常备军与提高战斗力，许多国家还实行世兵制，如齐划士农工商四民，分居而处，各司其职，职业世袭，规定“士之子恒为士”，培

养一个专务兵事的军士阶层。齐国常备军兵员，主要来源于此阶层。实行世兵制，不但可保证兵源固定，而且兵卒间、官兵间彼此熟识，“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管子·小匡》），有利战事。可见，春秋时期，实行的是民兵制与世兵制相结合的兵役制。不过，春秋中后期，稍有变化。随着战争频率升高，战争规模扩大，需要更多的兵源，于是各国纷纷取消“国人”当兵的特权，将兵役对象扩大到“野人”（农业居民）。晋于公元前645年“作爰田”“作州兵”（将田地分给人民，让其当兵纳赋），首先打破“国”“野”界限。其后，各国纷纷效法，如鲁“初税亩”、“作丘甲”，楚“量入修赋”，郑“作丘赋”等，均向“野人”征兵征赋。

战国时代，出于兼并战争的需要，各国竞相扩军，征兵范围进一步扩大。较之春秋，兵役制变化有四。（一）春秋以甸或丘为单位征兵，战国则实行郡县征兵制。（二）春秋征兵，户不过一人，且数户轮流出一人，或八户抽一，或十户抽一，服役年限为18—60岁；战国则是一切适龄适役者均需服役，“自六尺（15岁）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周礼·地官·乡大夫》）。（三）春秋征兵仅限于男性，战国时，适龄女性也应征入伍，用于运送辎重、防守城池。《商君书·兵守》载：“守城之道……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墨子·备城门》也载：“守法，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少十人。”可见，妇女从军普遍。（四）开始推行募兵制。为扩大兵源，提高士兵素质、战技，一些国家开始用考选、招募勇士的方法组建军队。如齐之“技击”，魏之“武卒”、“奋击”，秦之“锐士”，皆属此类。募兵要求甚严，如考选“武卒”，需全副武装、带三天粮、半日内跑百里。此为军中精锐，如齐之“技击”，“进如锋矢，战若雷霆，解如风雨”（《战国策·齐策一》）。不过，募兵仅限于数国，并未全面推广。总之，自春秋到战国，兵役制经历了从民兵制、世兵制到征兵制、募兵制的发展过程。

军赋制。西周赋税不分，至春秋，赋税分离，用之于军为赋，用之于政称税。春秋前期，兵卒战时向国家领取兵器、马匹，军粮自备，国家可能向国人征收车、马，故尚无正规的军赋制。军赋成制，约在春秋中期以后，其标志是军赋摊入户及其土地收入。当时军赋数目，据《司马法》载：甸为征收单位，一甸576户，出车1乘、马4匹、牛12头、甲士3人、徒兵72人。即一乘之兵员、装备（《左传·成公元年》引）。不过，各国为扩大军赋，都先后改革，大大突破了此数。如鲁“作丘田”（公元前590年），以丘为征收单位，一丘144户，交原一甸应出之赋，赋量增加近3倍。楚、郑等国也采取措施，把军赋摊入土地，增加赋量。经半个世纪的改革，军赋制渐趋完善。春秋末期，军赋继续扩征，与土地税合流。当时军赋按土地收农产品，作为政府制造保管武备之用。另外，卿大夫也“有赋于军”，各诸侯国要向王室供赋，后期向侯伯（诸侯之长）交赋，如“鲁赋八百乘，郑（zh）赋六百乘”。

战国军赋有很大发展。兵役与军赋征收已经分开。兵役徭役合称“力役之征”，军赋称“布缕之征”，它们与按田亩征收粮食的“粟米之征”，合为战国三大赋税。较之春秋，战国军赋另一不同点在于，军赋不再交农产品，而是交钱，并按人口计征。当时各国的租赋、兵役、力役普遍

较重，如秦经商鞅变法后，“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经此横征暴敛，各国军赋充实，齐秦“粟如丘山”，赵、燕、楚皆“粟支数年。”

军训制。春秋战国时代，军训制有相当发展，由自发性转向正规化。春秋时代，寓兵于农，故需“百姓通于军事”，主要通过狩猎来进行。狩猎分四时进行，各称为春蒐（s#u，搜）、夏苗、秋猕（xi3n，秋天打猎）、冬狩，都是在农闲时进行。《春秋》载，鲁国有“大蒐”5次、“狩”4次，足见其频繁。至春秋中后期，军训内容增加，打猎减少，名称也有改变，称为“春振旅、夏茺（bá，宿于草间）舍、秋治兵、冬大阅”。此时，各国注重兵教，军训开始专门化。一方面，学校里设有专门的军事课程射、御，据说80户设一学校，贵族及士人子弟8岁入学，15岁开始学射、御；军事学习也有时间限制，学校要“春合诸学，秋合诸射”。另一方面，军队中也有专门训练，各国对常备军皆实行分科训练，如晋国，其全军的御手、勇士、养马人员以及车、徒协同，均有专人负责训练。

战国时期，各国均认识到“士不先教不可用”的道理，故军训更趋精进与正规化。当时军训内容包括：“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的步伐、队列训练；闻鼓即进、鸣金则退的号令教育；了解诸阵之集散纵横的阵法训练；选士的单兵训练；车乘车卒训练；攻防战守等战术训练。此外，舟师、骑兵也有一套训练规定，如要求骑兵精于骑射、灵活自如，能“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敌”（《吴子·治兵》）。军中设有专职教官，训练制度严格。士兵训练不佳须受惩，教官所教不良亦受罚。据《吴子·治兵》载，当时的训练方法是，“一人学成，教成十人。十人学成，教成百人。百人学成，教成千人。千人学成，教成万人。万人学成，教成三军。”

(4) 军事法规与军功爵制

春秋时代，士卒剧增，战争日频，为奖惩将士功过、赏罚军训优劣，必制订军法，依法治军。各国皆有一些军事法规和奖惩办法，诸如“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纵遁（后退）不过三舍（一舍30里）”（《司马法·天子之义二》）；“克敌者，上大夫受县（赐以一县之地），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递减），人臣隶圉（y，奴隶身份）免”。当时军事犯罪，名目较多，如：战败而将领未赴敌战死，“为罪已重；”将士未能尽力杀敌，为渎职罪；脱离战斗行列，为“失次犯令”罪；假道军情，为“伪言误众”罪；通敌罪等。这些皆为军之大罪，须受“军之大刑”。刑有死列、肉刑、赎刑、流放等。各国以司马掌军法。不过，春秋军法尚不完善、不系统，无专属军事的条例规章，而且枉法严重，往往同罪异罚。至晚期，始有专门的军法。战国时期，军法独立，法规条文系统、详明、严密、广泛，执法趋于公正。从当时兵书看，其内容有什伍行列编制法；营区管制法；训练教习法；什伍连坐法；逃亡畏战惩治法；作战功过奖惩法；逃避兵役惩治法；军需保障法等。对军队的训练、编制、军纪、赏罚、行军、扎营、兵役、作战等都有明确规定，严格依法行事。实行“有功必赏，犯令必死”（《尉缭子·兵令》），“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吴子·治兵》），“罚不避亲贵”

(《管子·立政》)，这样，士卒作战，行动统一，战则拼力，退则畏法，“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尉繚子·制谈》)，战斗力大为提高。

战国时期另一重要赏罚制度是军功爵制。它与军事法规相辅而行，各有侧重，前者重赏，后者重罚。当时各国普遍实行该制，魏“食有劳而禄有功”，楚、齐、赵、韩也“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秦国最为彻底，商鞅变法，依军功大小赐给爵位，爵位分 20 等。规定，凡有军功者，不论其门第、出身，皆可得重赏，享受爵禄；若无军功，即使王室宗亲，也不得升为贵族，享受特权。爵位高低、俸禄多少，皆依军功大小而定。“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光采)”(《史记·商君列传》)。各国所定爵位，不尽相同，但一般都分为侯、卿、大夫、士四等。军功爵制在当时起了重大作用。

(5) 战术与诸阵法

春秋车战。春秋时代，战争的基本形态为车战。其主要特点是凭借战车冲击，掩护步兵前进。作战时，双方战车列成车阵，而后交锋，一方车阵乱，则很难重新排列，胜负即见分晓。因而春秋大战，诸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鞏(1n)之战，一日即结束；鄢陵之战，不过两日。车战战术如下：

乘的战术。一乘甲士 3 人，步卒 27 人(春秋后期增至 72 人)，其基本战术单位为：“攻车一乘，前拒(置于前面的步卒)一队，左、右角二队。”如图 1。

步卒战术。五人为伍，分别装备弓、殳、矛、戈、戟五种兵器，“长以卫短，短以救长”，“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五伍组成一小方阵。

车兵编队战术。一般为—列横队，如需布成两线，则后列战车对前列间隙处，以便行驶。车下徒兵排列，据地形而定：险地作战，则步卒在前，战车居后，如图 2；平地作战，则战车居前，步卒居后，如图 3。所谓“鱼丽之阵”，其创新在于改革车、卒排列之方式，战车前置，步卒则分散配置于车的左、右、后三面，车、卒互相掩护，车阵更显密集，如图 4。春秋初，诸侯抗王命的第一战，郑周繻葛之战，即依此阵取胜。

(图 1)(图 2)(图 3)(图 4：鱼丽阵)

整体而言，车阵部署一般为中左右三军成阵，左右两军列成两拒(两翼)。不过，其进攻队形有所变化，春秋初期是以车兵为主、步兵为辅的大方阵进攻；中期以车兵为主、步卒人数剧增的方阵进攻；末期则多以纵队进攻。

战国步战。车战要求发挥整体优势，“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孙子兵法·军争篇》)，故机动性、灵活性较差。至战国时期，步、骑兴起，铁兵器使用，尤其是弩的发明，使密集整齐的车阵渐败下风，为步骑兵的野战所取代。步兵战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步兵方阵，是魏舒方阵。公元前 541 年，晋将魏舒与狄人作战，因地形不利车

战，遂“毁车以为行”，临时改车兵为步兵列阵迎敌。其方阵由五个互相掩护的大方阵组成：“五阵相离（相互独立），两（前军）于前，伍（后军）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其状如下：

战国时，步兵战术可以孙武八阵为代表。（一）方阵，此为步骑攻战的基本队形，布阵时要求“薄中厚方（四周），”中虚方实，虚以张势，实以击敌，指挥位置在后阵。（二）圆阵，主要用于作环形防御。（三）疏阵，即疏散的战斗队形。其他任何阵皆可疏散成此阵，其方法是加大行列间隔距离，多树旌旗与兵器并配以各种假动作，以示兵力强大。（四）数阵，即密集的战斗队形。（五）锥行阵，前锋如锥形的战斗队形，用于突破与割裂敌人。（六）雁行之阵，一种横向展开、左右翼向前或向后呈梯状配备的战斗队形。（七）钩行之阵，其正面为方阵，两翼适当向后弯曲成钩状，以卫侧翼。（八）玄襄之阵，一种示形示声迷惑敌人的假阵。八阵各有特点，实战中运用何种阵法，需因敌因地而陈。孙子的布陈原则是“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设阵时要有前锋，有后援，以相互接应，同时，以 1/3 的兵力进攻，而以 2/3 的兵力扩大战果（《孙子兵法·八阵》）。

各种步兵阵均以“曲”为基础构成。曲为 200 人，含两伯；伯纵深 5 列、每列 20 人，或纵深 10 列、每列 10 人，或纵深 20 列、每列 5 人。因而，两伯构成的曲的方阵，根据两个伯的不同排列，也相应出现三种不同的形状。曲是步兵方阵的基本战术单位。

车兵战术。据《六韬·均兵》大致是：五车为一列，各列间隔 40 步，左右两车间隔 10 步，50 车为一队，两队间隔 60 步。此为平地作战之法。陡地作战时则左右间隔 6 步，各列间隔 20 步，10 车为一聚，聚与聚间隔 36 步，两聚为一屯。

骑兵战术。因地形不同而异：在平地，5 骑一列，前后相距 20 步，左右两骑相隔 4 步，队间相距 50 步；在险地，前后相距 10 步，左右相距 2 步，队间相距 25 步，30 骑一屯，60 骑一辈。

战国时代，在一些重大战役中，并非使用某一兵阵，而是三兵种都列阵，协同作战。因而战争规模更大、更持久，战国七雄均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齐以 20 万之众攻楚，达 5 年之久；赵以 20 万卒攻中山国，5 年始归（《战国策·赵策三》）。大规模的步骑野战和包围战取代车阵战术，更为灵活、机动，战争胜负不再主要取决于兵卒多寡，而取决于战略战术的正面运用。步骑兵的战术是热兵器发明之前最为重要的战术，对后世影响甚大。

2. 春秋争霸与战国兼并

(1) 军权下移与春秋争霸的开始

东周伊始，各诸侯国纷纷“奸先王之礼，”无不倾其全力整军经武，扩军备战，不仅相互操戈，与王室也兵戎相见。在此形势下，传统军制

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周天子对军队的领导权不复存在，霸权代替了王权；其次，原用于对外的军队，成为诸侯内战的工具；最后，宗周沦丧，王室无力维持“六军”之制，而各诸侯国为取威定霸，遍建三军，有的甚至四军、五军、六军，完全突破了“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旧制。春秋争霸就是在这种军权下移的形势下出现的。

郑庄公首起争霸。郑之始祖桓公，系周宣王（公元前827—前782）之庶弟，初受封于郑（今陕西郑县）。其子武公时，灭郟（郑州南）、虢（荥阳北）二国，得十邑之地，国势始盛。庄公（公元前757—前701）继位后，“以王命讨不庭（不向周王纳贡者）”，联齐、鲁攻宋、卫，制服陈、蔡，北败狄人，踌躇满志，对王室日愈不恭。周平王恶其跋扈，欲分其权与虢公，庄公闻知不满，但终以“交质（相互以儿子作抵押）”缓解。周桓王（公元前719—前697）继位后，起用虢公剥夺郑“伯”的封号，庄公大怒，派兵抢割周王的庄稼。“交质”遂发展为交恶。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桓王亲率王卒与陈、蔡、卫等诸侯之师伐郑，布置如下：王卒居中，蔡、卫军居右，陈国之师居左。庄公闻王师来伐，率军御于繻葛（河南新郑县附近），双方列阵决战。郑大夫子元建议分兵击敌，先攻战斗力弱的陈、蔡、卫等国军队，必一触即溃，再合兵进攻王卒，可以取胜。庄公采纳，令左拒（即左翼）进攻蔡卫之兵，令右拒挡陈国军队，他则亲率中军，布成鱼丽之阵，以25辆战车居前冲锋，每车配备步卒25人，以弥补车间空隙、填充车上伤亡，进攻周王之中军。战争伊始，周王左、右两军不能抵挡郑军的猛烈攻击，首先溃逃。庄公再集中兵力围攻王卒，使之三面受敌，弃甲曳兵而逃。桓王肩上中箭，但勉力督率败兵，且战且退，使王卒败而不乱。是役，庄公运用避实击虚、两翼包围及鱼丽阵等战略战术取胜。繻葛之战是春秋诸侯抗王命的第一战，周王尊严扫地。此后，华夏诸侯几乎悉聚庄公的旗帜下，庄公遂成为春秋初年的首霸者，拉开了春秋争霸的序幕。庄公死后，二子争位20余载，内耗国力，外起强齐，霸业遂衰。

齐桓公“九合诸侯”。郑霸衰后，戎狄南侵，荆楚北渐，中原势危。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685），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继位，用管仲（？—前645）为相，施富国强兵之策，如今民“事农”，发展农业；鼓励渔盐业生产，发展工商业；将全国划为二十一乡，使四民（士农工商）分居，各司其职，同时，“寄军令于内政”，兵农合一等。使齐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国势日盛。在此基础上，管仲提出争霸方略：“奉天子以令诸侯，内尊王室，外攘四夷；列国之中，衰弱者扶之，强横者抑之；昏乱不共命者，率诸侯讨之”。其中，抗狄戎、制荆楚是关键，二者不可同时并举。管仲正确分析形势：戎狄已入中原，事急却祸小；荆楚久怀问鼎之心，事缓却祸大。因此，宜交好诸侯，先挫戎狄，缓制荆楚。齐桓公依计而行，先后与宋盟于北杏（山东阿县北），与宋、卫、郑、单盟于鄆（山东濮县东），两次与郑、鲁盟于幽（河南考城县），争取诸侯支持。随后联合燕国打败山狄，联合宋、曹打败狄人，中原局势渐稳。戎狄既退，便施制楚之策。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齐桓公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之师，举兵伐楚。楚成王见大军压境，只得派大夫屈完讲和，双方会盟于召陵（河南偃城东），楚答应向周王纳贡。此举有效地制止了强

楚北进的势头。此后，齐又几次会盟诸侯，其中，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的葵丘（河南兰考）之盟，周王也派人参加，桓公霸业达到顶峰。此为齐桓公成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概叙。桓公成霸，主要运用“尊王攘夷”与军事威慑两大战略，不直接与敌拼杀，却达到使敌降服的目的，这是其战略运用之优点。其缺点主要表现在制楚问题上。楚久怀并吞中原之心，齐以八国之师进攻，应当灭楚或至少重创之；楚势虽强，但联军更盛，桓公曾吓屈完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左传·僖公四年》）。但桓公终与之盟，无功而返，楚未受创，日后与中原争雄，遂成常害，可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周襄王九年（公元前643），管仲、桓公相继去世，五子不肖，演成自相攻杀之局，霸业遂歇。

宋楚泓之战。召陵之盟后，楚北进受阻，转而向东发展，势力扩及豫南、皖北。待齐霸业衰落，中原混战无主，北狄入侵，郑国归附，楚见有机可乘，遂再兴北伐之师，以图称雄中原，此与宋襄公意图相悖。襄公（公元前650—前637）素有贤名，曾求其父立庶兄为君，获“让国”美名，齐桓公极为器重，将世子继位之事托之。桓公死，五子争位，襄公仗义兴兵率诸侯平齐内乱，立孝公而归。宋为公国，位居诸侯之上，经此举，襄公便自以为仁义昭著，应为霸主，周襄王十一年（公元前641），与曹、邾作睢上（河南商丘睢水）之盟；是年秋，又兴兵伐曹。但宋为小国，诸侯多唯齐、楚之马首是瞻，襄公于是欲借齐、楚之力称霸，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639），与假允结盟的楚国盟于孟（河南睢县）时遭擒受辱。释归后，他痛恨楚成王的欺骗行为，深怨诸侯不亲宋，怒而伐郑。郑求救于楚，楚即兴兵伐宋，因而发生了泓之战。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两军对峙于泓水（河南柘县北）。宋军于北岸列阵以待，宋司马认为楚众宋寡，建议乘楚半渡而击之，襄公自谓仁义之师，“不以阻隘”，不纳；待楚军既渡列阵，太宰建议乘其列阵未毕而击之，襄公谓“不鼓不成列”，不纳。及楚军成阵，方鼓令全军进攻，襄公本人也身先士卒，向敌中央突进。楚军以两翼左右包抄，使宋军陷于四面受敌之境，襄公死战得脱，士卒死伤甚众。次日，楚军渡濉水追击时，值河水暴涨，溺死千余人，楚遭此意外之挫，乃自行撤退，泓之战遂告终。此战表明，仅以“仁义”争霸，死守旧兵法，断难成霸，绝难取胜。是役，襄公“不阻敌人于隘”、“不鼓不成列”，可谓仁至义尽，结果败绩，自己也伤股，身败名裂。

（2）晋楚长期争雄

历代楚君，皆怀谋图中原之意。周惠王六年（公元前671），一代明君楚成王（公元前671—前626）继位，选贤用能，整军经武，励精图治，国富兵强，除其正规军外，另创东广、西广、东宫等禁卫军，遂成南方强国。其图中原之方略，以政治、外交争取小国，以武力攻击强国，然后相机图大国。泓之战后，中原小国竞相归附，遂控中原之局，不服者仅齐、秦、晋而已。楚王此时，大施其

谋：厚礼重耳（即晋文公）之过境以示交好，派重兵戍守商密以阻

秦之东出，派兵驻守穀邑以伺机攻齐。不料晋国崛起，使其谋受阻。

城濮之战。公元前七世纪中叶，晋君奋力图强，先后灭耿、霍、魏等十余国，已成北方大国。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 636），流亡在外 19 年的公子重耳继位，为晋文公（公元前 636—前 628），重用狐偃（？—前 622）、赵衰（？—前 622）、先轸（？—前 627）等干才，施“明贤良”、“赏功劳”、“举善援能”，“通商宽农”等政策，励精图治，使“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遂奠定争霸之基础。其争霸方略为“尊王”、联秦，这既可加深中原与荆楚的隔阂，又可拉拢强秦，使其为荆楚后顾之忧。文公继位当年，周襄王（公元前 651—前 619）被其弟叔带逐出周都，逃至郑国。次年，狐偃向晋文公建议“勤王”，因“诸侯信之，且大义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文公于是率诸侯兵护周王回都，周王赐以“南阳之田”。此举使文公既获尊王美名，立信诸侯，又得进出中原之捷径，名利双收。此后率诸侯抗荆楚，演成城濮大战。

晋势既强，宋乃背楚归晋；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 634），齐鲁交恶，鲁求援于楚，楚借此伐齐、宋。是年冬又率陈、蔡、郑、许联军攻宋。宋向晋告急，晋为“取威定霸”，决定兴兵，但若越过楚之盟国曹、卫援宋，必致腹背受敌。大夫狐偃建议“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文公采纳此调楚北上之良策，于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 632）初出兵伐卫，并与齐盟于斂孟（河南濮阳县东），三月，晋攻破曹都陶丘（山东定陶西北）。晋此举，原为调楚北上，但楚不为所动，却加紧攻宋。晋国此时若孤军南下，虽无曹、卫后顾之忧，但与楚联军对阵，兵力尚处于劣势，且远离故国，难操胜券。中军主帅先轸适时献策：让宋割地贿赂齐、秦，同时使人告知楚，晋将取曹、卫之田补偿宋。齐、秦受贿，便充当调停人，要求楚撤宋国，楚因晋将取其盟国曹、卫之地给宋，断然拒绝。秦、齐于是出兵救宋。楚成王见势不利，自率亲兵退守境内，并派使告诉楚军统帅子玉“知难而退”，此举可谓明智。但子玉骄傲自负，未撤宋国，反而向楚王请战。成王虽不心愿，但未坚决制止，反而增以少量援兵。子玉得到默许，求战心切，派宛春与晋交涉：晋如允曹、卫复国，楚则撤宋围。子玉此策，若晋答应，则楚恩施三国；若不答应，则三国怨晋，可谓一举三得。但先轸提出了一个高明的对策：私下让曹、卫复国，并使之与楚绝交，同时，拘留宛春以激怒楚国。子玉果然大怒，兵进陶邑，寻晋军决战。

文公见楚军撤围北进，知其中计，便“退避三舍（90里）”至城濮（卫地，今山东鄄城临濮集）。宋围解后，派军北上，晋方四国列营以待。子玉见晋退兵，以为怯，继续北追，4月抵城濮，双方列阵。晋方四国，以上中下三军作横阵排列，先轸率中军居中，狐毛将上军在右，栾枝领下军在左，兵力八九万人。其战法是右军退，以诱敌出击，以中、左两军夹击之。楚方，子玉率楚师居中，陈蔡之师为右，郑许之师在左，兵力约 11 万，准备三军齐进，正面攻击。战前，子玉自谓“今日必无晋也”，那知战局一开，晋下军先攻击其右军，陈蔡兵弱，一触即溃。晋上军执大将旗佯退，子玉以为晋大将率军败退，便令其左军出击，不料

正中圈套。楚左军进击，侧翼暴露于晋中军之前，先轸及时率卒横击，上军亦转头掩杀，致使其溃败。子玉见势不妙，急令中军停止进攻，收敛残卒，败退连谷（今不可考）。楚王闻败，怒责子玉丧师辱国，子玉羞愧自杀。晋文公战后，与诸侯盟于践土，被周王封为侯伯（诸侯之长），可谓一战成霸，使中原诸国转而背楚归晋，也使楚势暂退出华夏。此后楚晋相争，达百年之久。城濮之战，实为事关中原全局之决定性战争，也是春秋争霸的关键一战。

此役之胜负，不取决于军力强弱，而决于战略战术之运用。晋于此役，先施调楚北上之策，继则谋求齐秦参战，再行怒敌、骄敌、诱敌之计；“避三舍”表面上是报楚王曾厚遇之恩，实为引敌深入，聚师歼之；故始终掌握主动权。加之战术运用灵活，晋取胜实非偶然。楚成王既决定退兵，就应当机立断。待子玉以堵进谗言者之口为由请战，十分生气，却不明言，反予以少量援军，欲看子玉出丑；君臣皆为泄私愤而视国家命运为儿戏。子玉身为大将，却乏将才，急躁易怒，轻敌好胜，且刚愎自用，犯了“怒而兴师”、“愠而致战”的兵家大忌；加之临战指挥，固守一般战术，不能灵活采取对策。相较之下，楚败亦属必然。

邲之战。晋文公称霸后，中原形势稍缓。但各国利益不一，尤其以秦晋矛盾为首。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28），秦穆公（公元前659—621）为拓东出之路，派兵越过晋国的崤（xiáo）山地区，偷袭郑国。次年4月无功而返时，遭晋军埋伏，全军覆没。此为历史上有名的崤之战。秦晋由此交恶，此后五年，两国五战，秦于周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624）王官之役打败晋军，雪崤山之耻后，亦知晋实力雄厚，遂转而向西发展，灭戎族之国十二，“益地千里，遂霸西戎”。不久，秦晋再度攻战，数载不止，秦联楚制晋之心更坚。而晋又发生内讧，无力他顾。楚乘此时机，大兴攻伐之师，一时中原小国，几乎悉尽附楚；及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1）继位，治理有方，国势兵威，雄于前代，欲取周王而代之，致有邲（bò）之战。

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楚因郑与晋交好，兴兵伐之。晋遣荀林父率中军、先穀佐之，士会率上军，赵朔率下军救援。至黄河边，闻郑已战败并附楚，荀林父认为救郑时机已失，不如退兵；先穀却谓“威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丈夫也”，逞匹夫之勇领兵渡黄河，荀林父不得已随后渡河。楚见晋军抵邲（河南郑州东），先使郑人劝战，言“楚师必败”；继则遣使议和，使晋军诸将和战不决，争吵不休；再以许伯等人突入晋营，以骚扰晋军方寸。晋将魏犇、赵旃主战，见楚军相欺，遂违令至楚营挑战。楚王率亲兵逐出，荀林父恐二人有失，派车兵接应。楚以为晋军进攻，下令布阵，以左拒攻晋下军，以右拒攻晋上军，以中军击晋中军，全面攻击。荀林父主和，毫无准备，见楚军如潮而至，惊慌失措，不知所为，于中军帐击鼓高呼“先济（渡河）者有赏”，欲率军北渡黄河逃遁。晋军在一片惊慌混乱中，连夜抢渡黄河，为夺船先渡，互相砍杀，以致舟中手指成捧，淹死无数。仅上军，因士会有准备，七处埋伏，击退楚军攻势，安然渡河。

是役，楚以逸待劳，始终掌握主动权，又利用晋军战和不定、内部分歧之弱点，采用假谈判真备战之谋略，乘其不备，突然袭击，陷晋军于惊慌失措之中，取得大胜。晋军之败，首先在于荀林父无能，临战不

作准备；加之将帅不和，予敌以可乘之机。邲之战败北，晋在中原诸侯中威信丧尽。楚庄王乘战胜余威伐宋，使之归服，又与齐修好，霸业臻于鼎盛。

鄢陵之战。邲之战后，楚饮马黄河，雄视北方。晋四面受敌，晋国君臣为摆脱窘境，痛省前非，内修文治，外施复霸战略：首先北伐戎狄，安定后方；继则于鞌（山东济南西南）之战（公元前589）败齐，是役齐侯轻敌，谓“余姑剪灭此而后朝食”，不料大败，被迫与晋立城下之盟，晋一打一拉，既解除东方威胁，又离间了齐楚联盟；再则联吴制楚，使之有后顾之忧，并乘机于麻隧（陕西泾阳县南）之战（公元前578）痛击秦军，使之一蹶不振，不复为“西鄙之患”。经20余年之功，晋终于摆脱困境，再度与楚争雄，大战于鄢陵。

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郑背晋附楚并举兵攻宋，晋厉公（公元前580—前573）遂发兵攻郑救宋，同时邀齐、鲁、卫之军参战，相约会师鄢陵（河南鄢陵）。晋军兵力，有上、中、下、新、公族五军，约五六万人，战车500余乘，连同盟军，可达12万。楚闻晋师出击，即兴兵援郑，急越千里北上，会郑军，疾趋鄢陵，逼近晋营列阵，欲乘齐、鲁之师到达之前，逼晋军出战以优势兵力歼之。时楚有左、中、右、公族四军，加上郑军，兵力9万余，战车530乘。厉公本欲待齐鲁等师至后再战，以确保全歼敌人，今见事急，遂令晋军于营地内列阵：以中军一部攻楚左军，另一部攻其中军，集上、下、新、公族四军攻其右军与郑军，此偏重一翼之布署，为春秋以来之首创战术。6月29日，晋军向楚发动进攻。楚共王（公元前590—前560）见厉公车陷泥淖，率卫队进攻，被晋将吕锜箭射左目而退，楚军见共王受伤，军心惶恐。楚右军受晋重兵猛攻，不支向西退却，中、左军受此影响，也向西败退，直至颖水，楚以“王卒”据北岸，掩护败军退过颖河，晋军追至，与王卒略事接触，因日暮而止。两国均准备来日再战，不料是夜楚王召中军元帅子反议事，子反醉酒，竟不能应召，楚王以为此乃“天败楚也夫”，加之晋援军即至，遂连夜撤军。是役，晋以逸待劳，争取了主动；加之布阵新奇，集兵力于一翼，构成重点，为以寡击众之优越战术。楚军出兵迅速，行动敏捷，压晋营而阵，着眼于“速”与“争取主动”的战术，殊属良策；但千里行军，师卒疲劳，不休整即投入战斗，战斗力大减；加之诸将“各顾其后，莫有斗心”，因此败北。

鄢陵之战，是晋楚争雄的第二次大交锋。此后楚虽仍为强国，但渐处下风。及周简王十三年（公元前573）晋悼公（公元前573—前558）即位，施“三分四军（将上中下三军分成四个集团，轮流作战）”及联吴制楚等策略，使“楚不敢与争”。此后，中原战事渐少，虽有晋、齐间的平阴、太行之战，但未影响晋国实力。此时，齐、楚、秦、晋、吴五国相互纠缠，呈势均力敌状态；同时中原疲敝，普遍要求大国息兵。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晋、齐、楚等13国举行弭兵之会，会上晋楚平分霸权，两国相争告一段落。究其原因，主要是各国卿大夫势力高涨，内争取代了外伐。（3）春秋争霸的尾声

正当中原战事暂息之时，吴、越崛起于东南，演出了春秋争霸的最后一幕。晋楚相争，晋联吴制楚，楚则联越制吴，遂开吴楚、吴越战争之局。

吴楚战争。春秋初，吴为楚之属国，至吴王寿梦即位（公元前585），国势始强，遂联晋制楚，为争夺淮河流域，与楚交兵达60余年，渐占上风。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双方再战于鸡父（河南固始县南），吴以寡击众，出奇制胜，败楚七国联军。周敬王五年（公元前515），吴王阖闾（hé lǘ，公元前515—前495）即位，重用伍员（即伍子胥，公元前？—前484）、孙武等良将，整军经武，图谋楚国。伍员提出“三师肄（骚扰）楚”的战略，阖闾采纳，用三师在楚东北部进行骚扰，“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左传·昭公三十年》），如此忽南忽北，扰楚达6年之久，使楚军疲于应付，渐失警惕，认为仅是骚扰，并无大攻之意，为攻楚创造了条件。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冬，吴王以为时机成熟，联合蔡、唐之师，派孙武、伍员为将，率4万余卒，兵分两路，沿淮河西上，千里迂回，自北方突入楚之大隧、直辕、冥阨（皆在今河南、湖北交界的武胜关附近）三关、直趋汉水。楚王惊闻敌军深入腹地，急令子常、沈尹戎等仓促率军沿汉水右岸防御。沈尹戎建议，子常率兵与敌周旋，自己起方城（河南方城）重兵毁吴舟后，经三关击吴军之背，这样前后夹击，“必大败之”。此虽属良谋，但为时已晚，加之子常想独吞战功，不待沈军配合，即于11月9日渡汉水东进，与吴军三战三败，退守柏举（湖北麻城东南）。吴军追至，双方列阵角力，子常的部属怯敌先逃，楚阵因而动摇，吴军趁势攻击，楚军大败而逃。吴军追至清发水，又乘其半渡之际，歼其一半，不久击败沈尹戎回援之师。吴军五战五捷，于11月29日攻占楚都郢（湖北江陵县东南）。吴兵大胜，是战略战术运用精妙之结果，先施三师扰楚，历时6年，使之疲于奔命，不明吴军进攻方向；继则施以远距离的战略迂回，从防守薄弱的东北方突入楚境千余里，出其不意，收到了战略奇袭的效果，使楚来不及聚足兵力应战。战略运用如此成功，吴胜当属必然。

吴越战争。吴军入郢，不修民德，难以立足，加之次年春越乘虚袭吴，吴王遂领兵东归。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越王允常死，吴王为报复，便乘丧伐之。勾践（公元前496—前473）新立，率军与吴战于槁李，大破吴师，阖闾重伤而死。吴王夫差（公元前495—前473）继位，为报父仇，日夜练兵，终于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夫椒（今江苏太湖）一战，大破越军，进占越都会稽（浙江绍兴）。伍员主张乘机灭越，“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勾践贤君，种蠡（即文种、范蠡）良臣，若返国将为敌”（《史记·伍子胥列传》）。夫差不听，允许越求和，遂遗亡国后患。

夫差因胜而骄，欲“北威齐晋”，问鼎中原。伍员谏止：“越之在吴，犹人之有心腹之疾，……夫齐、鲁诸疾，疥癣也”（《国语·吴语》），“愿王释齐先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夫差忠言逆耳，先伐陈、鲁，继则两次伐齐，于艾陵一战，获齐战车800乘，斩齐兵3000，取得大胜，于是洋洋得意，回师后逼杀伍员。为求做中原之主，又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置后方于不顾，仅留万余老弱之卒守姑苏，自率精兵3万，北上争霸。

勾践兵败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生聚教训，国力渐强，今见吴都空虚，于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春，“发习流（水军）二

千人，教士（精练士卒）四万人，君子（亲兵）六千人，诸御（军官）一千人伐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兵分两路，一支断吴王归路，一支直袭姑苏。吴军先于泓水一战，击溃越军先锋队，待越大军攻至，即据守不出。勾践以佯退诱敌，吴军因首战告捷，遂出城追击，正中圈套，被越军围歼，姑苏失守。此时，夫差正与晋在黄池（河南封邱县南）之会上争作盟主，惊闻此变，火速领兵回归，由于鞍马劳乏，被迫求和，越估计亦无灭吴之力，同意罢兵。

由于连年征战，“吴士民罢（疲）敝，轻（精）锐尽死于齐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夫差求和成功后，便“息民散兵”，以恢复国力。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越国力更强，乘吴大饥、民聚于东海滨之际，率5万大军伐吴。夫差闻越来攻，亦率兵6万御于笠泽（水名，在苏州东南）。3月，两军夹江而阵。勾践利用黑夜，以左右两军在上、下游鸣鼓佯渡，使吴分兵防御，然后中军潜行渡江，一举击溃吴军，进围吴都，夫差以万余亲兵坚守不出。越围城3年，发粮赈济，得吴民心。至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11月，攻破姑苏，夫差率残卒退守姑苏山，求和不得，饮恨自杀。勾践灭吴后，北上会盟诸侯，成为春秋最后一任霸主。

无论是吴楚战争还是吴越争霸，其影响与规模皆不及晋楚争雄。它们只不过是春秋大国争霸的余波。春秋时代逐渐拉下帷幕，及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历史便进入了更为动荡的战国时期。

（4）战国七雄与变法强兵

经过近300年的春秋争霸战争，见于经传的160余国，至战国初仅剩40余国（含20余个少数民族国家）。其中，以齐、楚、燕、韩、赵、魏、秦最为强大，史称“战国七雄”。

战国时期，许多国家新兴地主阶级夺取了政权，登上了政治舞台。为巩固封建统治，消除奴隶制度残余，健全封建制度；同时，为保卫自己，消灭他国，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各国都先后展开变法运动。魏文侯（公元前445—前396）用李悝（ku 亏）为相，废除官爵世袭制，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选拔官吏；“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推行“平籴法”，“取有余以补不足”，平衡粮价；制订《法经》，以法治国；用吴起（？—前381）改革军事，创“武卒制”，使魏成为战国初期的最大强国。秦孝公（公元前361—前318）用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建军功爵制，论功行赏；推行县制，实行连坐法，加强中央集权等。于是“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史记·商君列传》），奠定了统一六国之基业。赵国变法始于赵烈侯（公元前408—前387），在人事上“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财政上“节财俭用，察度功德”（《史记·赵世家》）。至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299）时，又改革军事，“胡服骑射”，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齐用邹忌为相，“谨修法律而督奸吏”（《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广开言路，赏罚分明，任用贤才；用孙臧训练军队，加强武备，创“击技”精卒。楚用吴起（此时已从魏逃到楚），实行了类似魏的变法。韩燕两国，也实行了一些诸如选贤用能、因功行赏等方面的政治改革。

各国经过变法，至战国中期，国力均大为增强，兵员大增。据统计，

魏有武卒 20 万，苍头（头裹青巾士兵）20 万，奋击 20 万，厮徒（杂务兵）20 万，车 600 乘，骑 5000 匹（《战国策·魏策一》）；秦、楚皆“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秦策一》《楚策一》）。赵“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赵策二》）；韩兵卒 30 万（《韩策一》）；齐“带甲数十万”（《齐策一》）；燕“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燕策一》）。足见改革富国强兵之效。

（5）魏国霸业之兴衰

春秋末期，晋国六卿专权，至战国初，韩、赵、魏三氏联合，先后灭范、中行、知三氏，公元前 453 年，成三家分晋之局，以魏最强。

魏霸中原。战国初，三晋联合，取得诸多胜利。魏文侯变法图强后，便连年征战扩张。西派吴起夺秦 5 城，占其河西之地，逼秦退守洛水（陕西北部）；北使乐羊灭中山（河北西部）；东联韩赵，三次伐齐；在南方，三晋从公元前 400 年至前 371 年间，五次与楚交兵，将楚势力逼出中原。三晋声威大振，均被周王封为诸侯。此时魏国，独霸中原，历时 50 载而不衰。

但三晋间利同而合，不同则离。三晋联合，魏获利最多，韩赵不满，故相互间也有攻伐。魏武侯继位（公元前 395）次年，因干涉赵君废立而构怨于赵，此后十年，两国迭连交兵，三晋联合遂告瓦解。加之武侯听信谗言，逼吴起奔楚、商鞅奔秦，自毁长城，一时势孤。同时，秦、齐国势日旺，周显王五年（公元前 364），秦破魏军于石门，斩首 6 万，两年后又败魏于少梁，占领庞城；而齐在东方，亦开始与魏争夺对准泗诸侯之领导权。遂陷魏于东西夹击之中。魏惠王即位后，虽采取迁都大梁（河南开封）、缓和与韩赵关系等一系列措施，维持了霸主地位，但终未摆脱四面受敌之窘境。

桂陵之战。在魏巩固霸业之时，齐秦先后变法，国力不断增强。齐为争霸中原，于周显王十三年（公元前 356）与赵联盟，次年魏为摆脱两面受敌，与秦妥协，以便全力对付东方。

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 354），赵兵伐卫，魏王令庞涓率兵攻赵，兵围赵都邯郸。次年，赵求援于齐楚。齐许以援军，却不直接兵发邯郸，反攻魏之襄陵，直待其两败俱伤之时，方以田忌为将、孙臆为师领兵救赵。田忌用孙臆避实击虚之谋：“魏赵相攻，轻兵精锐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内”，不如乘魏后方空虚，“引兵疾走大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袭其国都，魏军必然回救，可一举解赵之围，并可乘其疲惫而击之。田忌依计而行。庞涓闻齐军直奔大梁，仓皇率军回救。田忌诱其追至桂陵（河南长垣南），以逸待劳，大破魏军。此战为战国时代的著名战役，是魏为巩固霸权，齐为争夺霸权而进行的大战，也是赵联齐反魏的战争。是役，孙臆运用避实击虚、以逸待劳、“攻其所必救”等战略战术，成功地创造了“围魏救赵”的光辉战例。

其他诸侯国趁魏惨败之机，纷纷攻魏，楚取其睢水与 水间地，秦占其河西重镇少梁及旧都安邑。但魏毕竟实力雄厚，周显王十七年（公元前 352）于襄阳一战，败齐、卫、宋联军，迫齐求和。次年向秦反攻，收复失地。周显王二十五年（公元前 344）再主盟“逢泽（河南开封附近）之会”。不过，其霸业已如夕阳西坠了。

马陵之战。逢泽之会，韩未参加，周显王二十七年（公元前 342）魏为惩罚并欲灭之以图自固，命庞涓领兵伐韩，直攻韩都，韩向齐求援。齐威王听从孙臆建议：“韩魏之兵未敝（疲劳）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不如晚救，“可受重利而得尊名”（《资治通鉴·卷二·周显王 28 年》）。

韩自恃有齐相救，倾全力抗魏，五战五败，乃委国听命于齐。次年，齐威王始令田忌、田婴为将，孙臆为军师，率兵援韩，采用类似桂陵的策略，进兵大梁。庞涓闻之，离韩而返。魏王鉴于桂陵之败，愤于齐一再干预三晋之事，遂命庞涓率倾国之兵迎敌，以求决战，孙臆闻魏军将至，向田忌建议：“彼三晋之师，素悍勇而轻敌，齐号为怯（认为齐军胆怯），善战者因势而利导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田忌从之，向后撤退，以减灶之法诱敌深入，并命齐军先为 10 万灶（10 万人造饭用的军灶），明日为 5 万灶，又明日为 2 万灶，以迷惑魏军。庞涓追击齐军三日，大喜：“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逃走）者过半矣”，遂弃其步兵，仅率精锐轻装，昼夜兼程追击。孙臆预计其行程，日暮当至马陵（河南范县西南）。此地道狭且旁多阻隘，乃伏兵以待，并于道旁砍白一大树而书：“庞涓死此树下”。同时命善射者万人，夹道埋伏，并预定暗号：日暮见大树下有火，即一齐发箭。庞涓率兵，当晚果至马陵道，见道旁大树有字，乃举火读之，读未毕，齐师万箭齐发，魏军遭此袭击，自相践踏，乱作一团，庞涓自杀。齐军乘胜反击，遇太子申所率魏军主力，复大败之，全歼魏军 10 万，俘太子申。是役，孙臆因势利导，减灶诱敌，马陵伏击，环环相扣，全歼魏军，再创造了一个伏击歼敌的战略绝作。魏王愤而致战，庞涓又好大喜功，骄矜狂妄，轻敌冒进，以致丧师辱国。魏经此败，一蹶不振，此后在齐秦楚三强夹击之下，四处礼拜，苟延残喘，失大国之风。

(6) 齐秦对峙

齐经桂陵、马陵之战，声威大振，成为东方强国；秦乘魏惨败，占其河西之地 700 里，拥崤函之固，攻守皆宜，遂聚力蓄势，虎视东方，形成齐秦东西对垒之局势。

连横与合纵之争。此时，各国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活动。“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战国策·赵策二》），皆为一种军事与外交策略。首倡连横者为张仪，首倡合纵者为公孙衍、苏秦等人。

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前 328），秦以张仪为相，实施“令魏先事（归顺）秦而诸侯效之”的连横策略。为此，对魏威逼利诱，一方面取其上郡 15 县，再乘其遭齐楚打击之机，充作调停人，使魏接受了张仪的联合秦韩、进攻齐楚的策略，并任张仪为相。秦魏联盟对其他诸国均不利，东方各国遂支持公孙衍搞合纵。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 319），魏逐张仪，以公孙衍为相，联合东方各国对抗秦国，因而有“五国伐秦”之举。次年，纵长楚怀王率魏、赵、韩、楚、燕五国联军攻秦，攻至函谷关。由于联军内部矛盾重重，楚、燕两军隔岸观火，故秦军一反击，联军不敌而退。再次年，秦又于修鱼一战，大破三晋之师，斩首 8.2 万。首次合纵攻秦遂告惨败。

秦灭巴蜀及南向伐楚。秦击破合纵后，暂集中力量扩充后方：兵伐义渠（陕西、甘肃北、宁夏），取 25 城，巩固西北；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 316），接受司马错之建议，灭巴、蜀二国，获“天府之国”，此举极为重要，秦“取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战国策·秦策一》），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亦为伐楚创造了条件。

周赧（n n）王元年（公元前 314），齐趁燕内乱，攻破燕国，声威盛极一时。秦欲伐齐，惧于齐楚联盟，遂派张仪拆散其盟。张仪至楚，许以商於（河南浙川内乡一带）之地 600 里，诱楚怀王与齐绝交。怀王鼠目寸光，贪图便宜，不听大夫屈原（约公元前 340—前 278）劝阻，欣然应允。但当向秦索取商於 600 里地时，张仪改口说以 6 里封邑献楚王。怀王受骗大怒，与秦绝交，发兵攻秦。周赧王三年（公元前 312）春，两军战于丹阳（河南丹水北岸），秦军大胜，斩楚军 8 万，俘楚主将屈及裨将 70 余人，并乘胜扩地 600 里，进占汉中郡（陕西东南及湖北西北）。怀王丢兵失地，更加恼羞成怒，征发倾国之师反攻，不料再次大败于蓝田（陕西蓝田西），只得割两城求和。

周赧王十四（公元前 301）年，齐为报复楚背齐亲秦，与韩魏联合攻楚，秦也乘机出击，大破楚军于垂沙，取重丘。次年又攻占襄城。再次年，秦昭王（公元前 306—前 251）以结盟修好为饵，诱楚怀王至武关会晤，逼其割巫郡与黔中郡，怀王不允，被拘于秦，楚立太子横为王自守。秦见诈骗不成，便兵出武关攻楚，占其 15 城。此后，秦又于公元前 280 年—前 277 年间，三次伐楚，尤其是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 279）白起伐楚之战，攻破郢，焚楚王祖先尸骨，迫使其迁都于陈（河南淮阳）。自此，楚失汉中、巫郡、黔中、南郡大片土地，更为衰弱，不复为秦东进之患。

合纵攻秦。秦打击楚国、解除侧翼之忧后，即转锋东争天下，中原诸侯顿感威胁。周赧王十七年（公元前 298），齐、韩、魏三国合纵抗秦，经 3 年苦战，兵进函谷关，迫使秦割地求和，暂阻其东进计划。周赧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294），齐相孟尝君谋害齐王不成奔魏，魏用为相，齐遂背韩魏，转而与秦赵联合。秦乘此有利时机（公元前 294—前 289），连年进攻韩魏。其中，周赧王二十二年（公元前 293），白起于伊阙（河南洛阳东南龙门）一役，斩两国联军 24 万。经 6 年战争，得韩武遂（山西垣曲东南）200 里之地、魏地河东 400 里。此时，赵经“胡服骑射”，迅速强盛，秦为打击之，于周赧王二十七年（公元前 288）约齐同时称帝，以联合五国攻赵。但此谋为苏秦的合纵所破坏。苏秦劝齐王弃帝号，孤立秦国，拉拢各国攻秦，以便乘机并吞宋国。齐王从其计，命苏秦游说燕、韩、魏、赵四国。次年，合纵成功，五国联合攻秦，迫使秦王“废帝请服”，归还了以前所占韩、魏的大部分土地。齐则乘机灭了宋国。

乐毅破齐与田单复国。齐“破宋，广地千余里”，成为众矢之的。秦乘机主盟合纵攻齐，于周赧王三十年（公元前 285）派兵越过韩魏国土，攻占其河东九县。燕昭王为报齐曾破国之仇，命乐毅为将，起倾国之师参战。次年，乐毅率燕、韩、赵、魏、秦五国联军攻齐，于济西大破齐军。在稳操胜券后，遣返秦韩之师，派魏军南略宋地，由赵军北取河

间，自率燕军直齐都临淄并取之。接着五路分兵，势如破竹，连下 70 余城，仅莒、即墨两城未克，齐几乎亡国。

周赧王三十二年（公元前 283），齐立湣王（公元前 302—前 285）之子法章为王，坚守莒、即墨（山东平度东南）两城，并号召齐国军民抗燕复国。即墨守将战死后，具有将相之才的田单被推为将，继续抗燕。燕军围攻两城，一年不克。乐毅见久攻不下，改施攻心战，命燕军撤围九里，筑垒相守，同时对出城居民不加拘捕，并赈济贫者，以争取民心，瓦解守军。齐也相应采取了许多笼络人心的措施，以致再相持三年，两城仍坚守不降。此时合纵联盟已解体，燕惠王即立。惠王与乐毅素有隙，田单趁机行反间计，谓两城不克，是乐毅与惠王有隙，畏诛不敢归，以伐齐为名，欲联合诸侯在齐称王。惠王中计，于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 279）派骑劫代替乐毅，乐毅害怕报复，投奔赵国，燕军将士皆为此不平。骑劫至，田单再展计谋，诱其割俘虏之鼻，掘齐人之祖坟，并焚尸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 314 年），齐趁燕年乱攻燕，占领燕国达三年之久。秦国，拉拢各国攻秦，以便乘机并吞宋国。齐王从其计，命苏秦游说燕、韩、魏、赵四国。次年，合纵成功，五国联合攻秦，迫使秦王“废帝请服”，归还了以前所占韩、魏的大部分土地。齐则乘机灭了宋国。

乐毅破齐与田单复国。齐“破宋，广地千余里”，成为众矢之的。秦乘机主盟合纵攻齐，于周赧王三十年（公元前 285）派兵越过韩魏国土，攻占其河东九县。燕昭王为报齐曾破国之仇，命乐毅为将，起倾国之师参战。次年，乐毅率燕、韩、赵、魏、秦五国联军攻齐，于济西大破齐军。在稳操胜券后，遣返秦韩之师，派魏军南略宋地，由赵军北取河间，自率燕军直齐都临淄并取之。接着五路分兵，势如破竹，连下 70 余城，仅莒、即墨两城未克，齐几乎亡国。

周赧王三十二年（公元前 283），齐立湣王（公元前 302—前 285）之子法章为王，坚守莒、即墨（山东平度东南）两城，并号召齐国军民抗燕复国。即墨守将战死后，具有将相之才的田单被推为将，继续抗燕。燕军围攻两城，一年不克。乐毅见久攻不下，改施攻心战，命燕军撤围九里，筑垒相守，同时对出城居民不加拘捕，并赈济贫者，以争取民心，瓦解守军。齐也相应采取了许多笼络人心的措施，以致再相持三年，两城仍坚守不降。此时合纵联盟已解体，燕惠王即立。惠王与乐毅素有隙，田单趁机行反间计，谓两城不克，是乐毅与惠王有隙，畏诛不敢归，以伐齐为名，欲联合诸侯在齐称王。惠王中计，于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 279）派骑劫代替乐毅，乐毅害怕报复，投奔赵国，燕军将士皆为此不平。骑劫至，田单再展计谋，诱其割俘虏之鼻，掘齐人之祖坟，并焚尸骨。齐民见状，更增守城决心。田单又用诈降松懈燕军斗志。与此同时，积极准备反攻，征集 1000 多头牛，角上绑利刃，尾上绑浸油的芦苇，用 5000 精兵跟随牛后，乘晚间黑暗之际，点燃芦苇，驱赶“火牛”猛冲敌阵，齐军随后杀出。燕军突遭袭击，乱作一团，自相践踏，一败涂地，骑劫被杀。齐军乘胜反攻，势如破竹，很快收复全部失地。田单以“火牛阵”出奇制胜，使此役成为历史名战。齐虽复国，但遭此大祸，由强变弱，客观上为秦东进提供了方便。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 314 年），齐趁燕年乱攻燕，占领燕国达三年之久。

(7) 秦赵大故与秦灭六国

秦在齐楚皆弱之后，着手东伐，大施远交近攻之策，先攻三晋。周赧王四十年（公元前 275）攻魏都大梁，斩韩援军 4 万，迫韩归顺；次年，于大梁北斩齐魏联军 4 万；再次年，赵出兵救魏，两国联军进攻韩地华阳，被秦师南北夹击，损兵 15 万，魏割南阳求和。此时赵国惠文王当政，贤臣有平原君、蔺相如，良将有赵奢、廉颇等，可谓君明臣贤，国力强盛，于是秦赵之间，演成几次空前惨烈的大战。

阏与、长平之战。周赧王四十五年（公元前 270），秦军越过韩地上党，突袭赵之要塞阏与（山西和顺县西）。此为赵都邯郸西方门户，赵遂于次年命赵奢救援。赵奢以为，虽然阏与事危，但秦兵新至，其势甚锐，宜先懈其警觉，然后相机击破。故出邯郸 30 里即扎营驻军 28 天，佯装不予救援，利用秦国间谍给秦军造成错觉，而后以两天一夜的急行军，赶到距阏与 50 里之地扎营。秦闻赵军突至，仓促率军来攻。赵奢严阵以待，并派万余卒占据北山，夺取制高点。秦军至，夺北山不得，赵奢乘机“纵兵击之，大破秦师”。是役，赵奢以“示缓及先据要地”战术，取得大胜。次年，秦再次袭击，无功而返。

秦鉴于两次劳而无功，继续实施其远交近攻战略，连年进攻韩魏，至周赧王五十三年（公元前 262）降服魏国，并取野王（河南沁阳），将韩拦腰斩断，使其上党与本土相离。韩欲献上党议和，不料上党郡守冯亭反将之献赵，以求赵援助。秦闻讯大怒，于周赧王五十五年（公元前 260）初，乘赵设防未固之时，兴兵夺上党。赵派廉颇领兵 30 万相抗，据险扼守长平（山西高平）。秦兵占上党后，便进攻长平赵军前哨，赵失一裨将与四尉，损失颇大。廉颇见数战不利，秦强赵弱，便不理秦师数次挑战，只坚守不出，战事陷于僵局。秦攻无对手，便施反间计，谓秦最怕赵奢之子赵括，廉颇怯敌且欲降秦。赵孝成王中计，派“纸上谈兵”的赵括接替廉颇。秦昭襄王闻讯大喜，密令白起为将。8 月，赵括至，不行守策，全师出击，白起诈败而退，却以两支奇兵共 3 万人断其后路，形成严密的包围。秦王为全歼赵军，征发 15 岁以上男丁赴长平之北，断赵援军及粮运。9 月，赵军断粮已 46 日，赵括分兵四组，轮番突围，皆不得脱。绝望之余，亲率精锐突围，被乱箭射杀。赵军失帅，全师 40 万人投降，白起“恐其为乱”，仅释放 240 名未成年之童兵，余者全部坑杀。至此，为时近一年的长平大战结束。秦于此役，施反间计，运用诱敌出击、分割包围、聚而歼之的战术，前后斩首 45 万，重创赵国。白起随即分兵三路，准备乘胜灭赵。赵韩恐惧，派苏代游说秦相范雎，范雎恐白起成功而位居己上，便进谏秦王：秦兵疲劳，请允许韩赵割地求和，秦王听从。白起中途罢兵，怨恨范雎。

邯郸之战。秦因赵不如约割六城，反而联合齐、楚、韩、燕，准备合纵攻秦，便于周赧王五十六年（公元前 259）9 月拟命白起为将，率兵攻赵。但白起抗命，谓赵国此时国力恢复，“结亲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备秦为务”，故不宜攻赵。秦王不听，改用王陵率军围攻邯郸，却损兵折将，连连受挫。秦王再令白起领兵，白起托病不出，只好用王龁（h）代替王陵，并增兵 10 万。王龁在邯郸外围与赵守军相持八九月之久，毫无进展，伤亡甚众。秦王见久攻不下，第三次起用白起，

白起“不忍为辱军之将”，仍不肯前往，被逼自杀。

邯郸被围，赵以避免决战、固守疲敌、外联盟国、合纵破秦的持久防御方针，诚为良策。但在争取盟国方面，却举步维艰。各国惧于秦兵雄威，都观望徘徊，不敢救援。赵向齐借粮，齐不敢与；平原君率毛遂等赴楚求救，楚王怕惹火烧身，推脱出兵，后因毛遂以楚曾蒙受秦占郢郢、焚楚王祖坟等耻辱相激，楚王怒，方命春申君黄歇领兵北上；魏派晋鄙率兵 10 万救赵，秦王威胁：“吾攻赵，旦暮且下。诸侯敢救之者，吾将于拔赵后先移兵击之”（《史记·魏公子列传》）。魏王即令晋鄙驻军于邺（河北临漳），等候观望。魏相信陵君无忌通过魏王宠姬如姬窃得兵符，赴邺椎杀拒交兵权的晋鄙，选精兵 8 万，直赴邯郸。周赧王五十八年（公元前 257）12 月，秦再增兵，派郑安平率兵增援，与王龁合力围攻。魏楚联军至，连败秦师。赵亦精选敢死队 3000 配合出击，内外夹攻，大破秦师，王龁率残卒败退汾城，郑安平率卒 2 万降赵。联军乘胜进至河东（山西西南），逼秦退守河西。

赵经长平、邯郸两战，主力丧尽，再无力独挡秦师，造成六国皆弱秦独强之势。秦乘此时机，以短短 36 年时间统一了中国。

秦灭六国。邯郸战后，秦为并吞六国，仍施其“远交近攻”之战略，即远交齐国，先灭韩魏，断六国合纵之脊，而后各个击破的方针。公元前 247 年，秦王政（公元前 246—前 210）亲政，着手实施统一计划。秦东进的正面之敌是三晋，为使赵不能援韩魏，秦乘赵燕互相攻伐之机，自秦王政七年（公元前 240）始，连续攻赵，其中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 234）平阳一战，斩赵军 10 万，后为赵名将李牧（公元前？—前 229）所阻。李牧虽连胜二战，但损兵数十万，仅存邯郸，再无力援助他国了。于是秦转而攻韩，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 230）派内史腾率兵伐韩，俘韩王安，韩灭。次年，秦施反间计，使赵王杀李牧，并乘赵地震、旱灾，派王翦伐赵，攻克邯郸，俘赵王迁，仅赵公子嘉率宗族数百人逃到代郡（河北蔚县），自立代王，赵基本灭亡。秦破赵，兵临燕境，燕国势危，燕太子丹遂于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 227）派荆轲刺杀秦王，未成。秦王即派王翦伐燕，于易水大破燕军，攻克其都蓟（北京西南），燕王僖逃往辽东。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 225）命王翦之子王贲伐魏，围其都大梁，因城坚难破，遂引黄河、鸿沟之水灌之，三月后城崩，魏王假投降被杀，魏亡。

秦破三晋后，即南向灭楚。讨论派兵时，年青将领李信以为 20 万即可，老将王翦则说非 60 万不能克。秦王以为翦老怯敌，命李信率军 20 万伐楚，却被楚将项燕大败而归。秦王知错，改用王翦，于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 224）发兵 60 万攻楚。王翦用屯兵练武、坚壁不战、麻痹敌人、以逸待劳的战略，相持一年，逼楚军“引而东退”，而后乘势猛击，灭其主力，直趋楚都寿春（安徽寿县），俘楚王负刍。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 222）再攻克楚江南之地，楚亡。灭楚当年，王贲率师扫除燕赵残余，攻下辽东，俘燕王僖，随即兵伐代城，俘代王嘉，赵燕彻底灭亡。此时齐国，君昏臣奸，“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直至五国灭亡，始“发兵守其西界”。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秦命王贲率灭燕之师南下攻齐，兵不血刃，取 70 余城，兵抵临淄，齐王健“不战，以兵降秦”。自此，六国皆灭，秦

囊括天下为一统，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战国时代至此终结。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殊非易事，是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结果。首先，秦用商鞅变法，历代坚持，国富兵强；用军功爵制鼓励士气，将士勇战；用司马错之计，开疆拓土，并吞巴蜀而据天府之饶；在人力物力上为打击六国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并能乘魏东败于齐、霸业衰歇之机，收复河西，遂拥山河之固，进退皆宜，造成东进的有利势态。其次，针对六国合纵，以连横反击，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每每奏效，使之不能长期联合攻秦。再次，施以各个击破、远交近攻之策。远交齐楚，近攻三晋，始终把三晋作为主要打击对象。韩魏为“天下之中枢”，先攻此两国，即可断六国合纵之脊，使楚不能北援燕赵，燕赵不能南下救楚，遂达到分割四国、各个击灭的目的。最后，“因敌制胜”，作战指挥原则灵活，善以反间计奏效；每有大举，即把外交战与军事战熔于一炉，综合使用，先行分化、再施打击。战略战术运用极为灵活。这些皆为并吞六国之利器。

3. 军事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战事频繁，关系各国生死存亡，上至国君，下至士人，兵家、法家、儒家、道家，莫不研究战争与指导战争方法，军事思想取得了辉煌成就。

(1) 主要兵书

《孙子兵法》。春秋末年齐人孙武所著，13篇，6000

余言，每篇各有主题，构成一完整体系。该书思想大体如下：一重战。开卷即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为此他考察了战争胜负的五个因素，即道（人心背向）、天（天时）、地（地利）、将（将才，包括智、信、仁、勇、严）、法（军法军需等）。将战争与政治、经济、自然、将才诸因素综合考察。二慎战。孙子重战，却不好战，谓“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应“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对于兵事，“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火攻篇》）。三备战。战争受经济制约，他说：“兵法，一曰度（土地大小），二曰量（物资多少），三曰数（兵员多寡），四曰称（军力强弱），五曰胜（胜负）”。五者关系，是“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形篇》），故应加强战备，无经济后盾，绝难求胜，“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备战另一内容是治军，治军之法，在于“合之以文，齐之以武”，军纪军令与政治教化相结合。既要“视卒如爱子”，又要信赏必罚。四善战。此为孙子兵法之闪光点，包括战略战术两方面。在战略上，孙子提出：（一）“先计而后战”；（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三）“自

各兵书采用版本为：《孙子》、《吴子》、《司马法》见《中国兵书集成·卷十·武经七书直解（一）》，《尉繚子》、《六韬》见《中国兵书集成·卷十一·武经七书直解（二）》，皆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版；《孙臆兵法》见张震泽校理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

胜”，即先充实国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境，尔后方能制敌取胜；（四）争取主动，“致人而不致于人”；（五）“兵贵胜，不贵久”，即速战速决；（六）“伐谋”“伐交”，争取“全胜”等。在战略具体运用上，提出了许多战术原则，如造势任势、“因情任势”；“以逸待劳”、机动灵活；“相敌”观敌、“因敌制胜”；兵不厌诈、“出奇制胜”；“虚实结合”、“避实击虚”；诱敌骄敌、调动敌人；攻防结合、因敌使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此外，对行军、地形、火攻、用间（反间计）等也作了论述。重战、备战、慎战、善战并非孤立，而是相互关联，其目的在于“安国全军”。《孙子兵法》内容十分丰富，对后世军事理论有深远影响，在我国乃至世界兵学领域占有崇高地位，是兵学鼻祖、兵经，我国后世兵书，莫出其范。

《司马法》。《司马法》约成书于战国中期，作者不详，全书155卷，今存5篇。该书内容有：（一）“以战止战”。战争的目的是“讨不义”、“诛有罪”，因而提出“以战止战”的战争观。《仁本篇》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杀一个人可以使别人得到安全，可以杀掉他）；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二）“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故宜随时备战，做到“五虑”：“顺天（顺应天时）、阜财（广集资财）、怵（yì）众（合乎民意）、右兵（重视兵器）、利地（利用地形）”，这是制胜的五因素；此外还要建“大军”与“求厥技（广罗有专门军事技术的人才）”。（三）治国以礼、治军以法；以文治民，以武治军；重视兵教，“士不先教，不可用也”，要做到“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四）“战相为轻重”。即根据敌我实力、采用适当的战略战术，这是用兵原则。如主张“称众、因地、因敌、令阵”等。另外还提出“兵不杂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等兵器配合使用原则，已浅涉协同作战的原则。但也记载了一些诸如“不鼓不成列”之类的旧兵法。应当注意的是，《司马法》虽书成战国，反映的却是西周、春秋时代的军事思想，为论述车战的权威之作。

《吴子》。《吴子》相传为战国初期吴起所著。共48篇，今仅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6篇。《吴子》将战争起因归为五种：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并由此将战争性质分为义战（“义兵”）与不义之战（强兵、刚兵、暴兵、逆兵）。吴起反对“修德废武”、“恃众好勇”，提倡“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这是其思想核心。修文德一要“先教百姓而亲万民”；二要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三要使“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官长）”；四要君民同心，一致对外；五要君王谦逊，善取忠言。至于加强武备，吴起提出要“聚卒练锐”，“先戒为宝”，加强戒备以及慎战等主张。在治军思想方面，强调“不在众寡，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简募良材”；“信赏必罚，严刑明赏”，使“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为将者应做到“五慎”，掌握“四机”。“五慎”即理（治军有方）、备（戒备）、果（决心）、戒（警惕）、约（命令简明）。“四机”即气机（士气）、地机（利用地形）、事机（运用谋略）、力机（提高战斗力）。军队通过严格治理，就会“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在作战思想上，强调“审敌虚实”、“因形用权”，随机应变。《吴子》是对《孙

子兵法》的继承和发展，对世界军事思想有一定影响。

《孙臆兵法》。《孙臆兵法》为战国中期齐国人孙臆所作，30篇。孙臆慎战，以为“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社稷危也”，故反对“乐兵”好战，“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应“不得已而后战”，“恶战”方为“兵之王器”。不过，他并不反对正义之战，“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战争胜负在于“天时、地利、人和”，他尤其强调人的因素，“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战略战术思想是其军事思想之精华，这是一种以“贵势”、“造势”为特征的机动灵活进攻战法，具体内容有：（一）“事备而后动”，方能“兵出而有功，入而不伤”；反之“无备者伤，穷兵者亡”。

（二）“必攻不守”，攻其不备。（三）“抚势造势”，争取主动。（四）寡可制众，弱可胜强。（五）“料敌计险（了解敌情，利用地形）”、“胜不可一（取胜不可固守一策）”。（六）巧用“谋”“诈”，乘敌之隙。（七）“有锋（前锋）有后（后援）”，善使阵法。在选将、建军、治军等方面，与孙子所论大同小异，不过，他更重视君、将、士三者的配合，“将”除具备智、勇、忠、信、敢等将才外，还需得君信任、“得众”、“左右和”等，方能“恒胜”；反之，则“恒不胜”（《篡卒篇》）。《孙臆兵法》是对战国中期以前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是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尉缭子》。战国时尉缭所著，全书24篇。尉缭慎战，认为“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提倡“诛暴乱禁不义”的义战，“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反对“争私结怨”而致战。在作战指导方面，提出不少新思想。“兵胜于朝廷”，“欲战先安内”，即先要国治民安，国富民强，方能“战胜于外”。战法上提出“道胜（谋略取胜）”、“威胜（兵威取胜）”、“力胜（兵力取胜）”三种，尤重“道胜”，认为应“先料敌而后动”、以实击虚；“蚤（早）决先定”、争取主动；“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提出了三种攻守原则：攻城原则是“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没有绝对地把握攻下城池，就不要进攻）”；野战对阵的原则是“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守城原则是“守者不失其险（城外要地）”，要求攻守结合，反对消极防御。其用兵原则是兵“以专胜，分力者弱”，反对分散兵力，若“分力”，则“进退不豪，纵敌不擒”。在治军方面，主张“制必先定”，“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强调“刑上究”，“赏下流”，“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尉缭子》把政治、经济、法制、军事等融为一体，综合论述，是依法治军的典范之作。

《六韬》。传为周初姜尚著，实成书于战国晚期，作者不可考，含《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6卷，凡60篇。《六韬》慎战，认为“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最好是防患于未然，“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胜敌者，胜于未形”。注重“文伐”，主张以谋略取胜，其阴谋手段有12条，如“因其所喜，以顺其志”；“亲其所爱、以分其威”；“阴赂左右、得情甚深”；“收

其内（臣）、间其外（臣）”；“辅以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等。这样，对方君臣离间，廷无忠臣，我方“乃成武事”。其战略战术亦颇有见地：（一）示弱迷敌、出奇制胜。“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使敌不知我备”，而后“欲其西，袭其东”。（二）“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即了解敌情，乘机而入，“疾击其不意”，“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三）“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即把握战机，不能优柔寡断，“失利后时，反受其殃”；“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四）“用兵之法”，在于“分合之变”。此外，《六韬》对军队编制、装备、训练、通讯、将才等建军、治军方法以及野战、攻城、反攻、追击、突围等战术也作了广泛论述。《六韬》内容庞杂，先秦各家军事思想在其中均有所反映，其突出贡献在于阐述了阴谋家的思想，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战国时代的文武分职和步、车、骑三兵种配合作战的经验。

（2）诸子军事思想

儒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早期儒家的军事思想，始于孔子，继于孟子，集大成于荀子。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名丘，春秋鲁国人，儒家创始人。其战争观较为保守，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反对“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主张息战，“天下一家”；主张慎战，《论语·述而》载：“子之所慎；斋、战、疾（疾病）”，作战必求“临事而惧（谨慎），好谋而成”。强调教而后战，“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反之，“不教民，是谓弃之”（《子路》），所教内容，不出射、御；要求将领必须足仁足智足勇，多闻多见多思，因为“仁者无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视“足食、足兵、民信”为立国之本，《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还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史记·孔子世家》）。不过他更强调“民信”，这与其强调“为政以德”的仁本思想分不开。孔子言兵，虽未成体系，却是儒家军事学说的始作俑者。

孟子（约公元前371—前289）名轲，战国中期儒学大师，其军事思想散见于《孟子》一书。孟子的战争观比孔子更为保守。孔子还主张仁义之战，他则全盘否认战争，认为“春秋无义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危害极大；并进而认为好战者实为“民贼”，“罪不容于死”，“善战者服上刑”。他认为，“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而在于“仁”，提出“仁者无敌”的主张，“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以为有了“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nòu，锄草）”等仁政，就能无敌于天下。故此，他反对“以力服人”，竭力主张“以德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的军事思想虽然迂腐保守，却亦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两项闪光的战略思想。

荀子（约公元前298—前238）名况，战国中晚期赵国人，早期儒家兵学的集大成者，其军事思想见于《荀子·议兵篇》。荀子虽师承孔、孟，却有创新。他亦主张仁义为本，认为仁义之兵“不战而胜，不攻而

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王制》），但支持“禁暴除害”的战争，肯定“以德兼人”的兼并战争。“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统一民心）”，“兵要在乎附民（得民拥护）”，即人心背向是决定胜负之关键，为此要“修礼爱民”。“修礼”则国治，“爱民”则“民亲”，国治民亲则兵强，兵强则战胜，故此他认为战胜即“政胜”，“将帅末事也”。在治军建军方面，主张以礼治兵，口令严格，赏罚有信，这样就会“百将一心，三军同力”；他重视将才，为将者须知“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圻（同旷）”。“六术”是作战原则：号令严明、赏罚有信、营垒坚固、行军迅速、善度敌情、不打无把握之仗。“五权”是机变原则：要只想身为大将而讨厌被撤职；不要急于求胜而忘记失败的危险；不要对内耍威风而轻视敌人；“不见利而不顾其害”；遇事要多谋、经费要充足。“三至”是将不受君命的三种情况，宁可自己抗命被杀也不可使军队陷危境、打败仗、欺百姓。“五无圻”要求为将者在用谋、作战、对敌等各方面做到小心谨慎。此外，还要求将领在战略决策时做到“弃疑”，即决者不疑、疑者不决；“无过”，即谨慎再三、避免过失；“无悔”，即全面周到、事至无憾。

综观早期儒家兵学，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以“仁”为准绳评判战争，人本色彩浓厚；二是属于思想家论兵，侧重于论述战争观、治军建军，较少论及战略战术问题。

法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商君书》系战国中期商鞅著，今存 24 篇，不少论及军事。重视耕战，反对“非兵”“羞战”。“国亡（衰弱）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即耕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而“非兵”、“羞战”、“仁义”、“礼乐”，皆为祸国之“六虱（害虫）”。他认为“多力者王”，“力生强，强生威，……举力以成勇战，战以成知谋”，欲取胜，必先增强国力，“国富而兵胜”。“壹赏、壹刑、壹教”，以法治军。“壹赏”即严格以军功赏爵位，“壹刑”即严施刑罚、不避亲贵，“壹教”即训练民众，使之乐于参战；实行依法治军，则兵勇杀敌；要使民众参战，“必以重法，赏则必多，威则必刑”；“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在战略战术上，他提出了“凡战法必本于政胜”、“能胜强敌者，先自强”、“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兵大律在谨”等思想。

《管子》虽托名管仲，实为战国后期齐国法家著作汇编。《管子》军事思想丰富，主要有：（一）“积务于兵（视兵事为首要任务）”。“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军队强大）。……故兵者尊主安国之径也”（《参患篇》），明主宜“积务于兵”，否则，是“以其国予人也”，故“兵不可废”。（二）《管子》重战，却不好战，“兵事者危物”，有“贫民伤财”“危国忧主”四患（《小问》），因而提出“至善不战”的主张。（三）争取民心。“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胜，而守可以固”（《重令篇》）。（四）“富国强兵”。一个国家如“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七法》）；强兵则需要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形势解》）；而国富则需“财无敌”、“器（武器）无敌”，以及加强军教军训。（五）战略战术上，一是“明于机数”（《七法》），把握战机；二是“遍知天下”，对敌我双方都做

到“尽知”，不但要明敌情、敌将、敌政、敌士，还要“知地（地形）”、“知能（军力）”、“知形（阵法变化）”、“知意（作战意图）”；三是“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霸言篇》）；四是灵活机动，示形误敌（制造假像，使敌人产生错觉），“无方胜之几（取胜没有固定的战法）”。

《韩非子》亦称《韩非》，战国末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所著，今存55篇，不少含有军事思想。他反对“仁义为本”，“仁义不足以救国”，“德厚之不足以止乱”，救国之策在于“争于气力（耕战）”，“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重视）力”（《显学篇》）。在备战方面，他注重战争心理训练，“用兵者，服战于民心”，“兵战其心者胜”，“先战者胜”；注重增强国力，“无地固，城廓恶，无蓄积，财物寡，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可亡也”。他还重视以法治国，以法治军。强调重赏重罚，“赏厚而信，人轻敌（蔑视敌人）矣；刑重而必，夫人不北（败逃）矣”。并主张赏罚无私，“行公法”，“不辟（避）亲贵，法行所爱”。胜负的关键在于赏罚有信，“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强调兵不厌诈，“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军旅之计，出于诈伪”（《难一》）。

道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老子》，即《道德经》，相传为春秋时老聃所著，凡81章，论兵者10余章。《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危害极大，“师之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有道者不处”，应“不得已而用”。主张“以道佐人主”，反对“以兵强天下”。但《老子》论兵，重在“用兵之道”：（一）“柔弱胜刚强”；（二）“善胜敌者不与（硬拼）”；（三）“祸莫大于轻敌”；（四）以退为进，后发制人，“不敢为天下先”；（五）避实击虚，避高居下；（六）“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七）以静驭躁，以逸待劳。《老子》论兵，非兵家言兵，而是以哲学思想指导军事思想，其特色在于哲理喻兵，含有深刻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庄子》,庄子及其学派的著作汇编。庄子(公元前369?—前286?)名周,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其思想师承老子,却比老子更为消极,他继承了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并将“无为而治”发挥到极点,认为一切争乱,包括战争都与人的自然本性相悖,因此兵事无义战与非义战之分,更不要“为义偃兵”,此实为“造兵之本”。他主张“无以巧胜人,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兵,恃之则亡”。

《经法》是四种古佚书的合编,包括《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约成书于战国晚期,是黄老学派的代表作。其军事思想继承《老子》,却具有特色:(一)文武兼重。“文”为治国安民之道,“武”为适时征伐之举,“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审于行文武之道,则天下宾(服)矣”(《经法·君正篇》)。(二)战有义与不义之分,“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为忿者”,应支持正义的战争,“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十大经·本伐篇》),义战是“众之所在”,得民支持。(三)治军要刑德并用、赏罚兼施;要善待俘虏,不杀服民,不戮降人。(四)作战指挥应“刑天(了解天时)”、“法地(掌握地形)”、“因人”,“兵不刑天,兵不可动;不法地,兵不可昔(措);刑法不(因)人,兵不可成”。并应重视以柔克刚,后发制人,为此,

要“弗敢以先人”，“不为兵主，不为祸首”；要以退为进，“先屈后伸”（《经法·国次》）。

墨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墨子》是以墨翟为首的墨家著作的汇集，成书于战国时期，今存 51 篇，其中多篇，在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主张“兼爱”“非攻”，使“大不攻小，强不侮弱，众不贼寡，诈不欺愚”；反对掠夺战争，以大攻小，以强凌弱，是大“不义”。安国之道，在于综合国力。为此，要尚贤尚同（思想统一），修治内政；强本节用，发展经济；信交诸侯，互助互救；全民皆兵，人尽其用。墨子军事思想的贡献，是在以守城为中心的防御战略战术方面，提出了不少新见解：（一）“主信以义”，“上下相亲”，民虽“死而守”；（二）加强战略，“备者国之重”；（三）依托城池，正确部署；（四）自远而近，层层抗击，兵力三线配置，城为核心，城外建廓，廓外设亭；（五）积极防御，以“伤敌为上”。为此，要针锋相对，以防反攻，以高制高，以穴对穴；拒、打结合；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结合；内守与外救结合。

《墨子》从理论上总结了战国时代城池攻守战的实践，是防御战略战术的权威著述，对中国古代战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九、中外军事比较

矛与盾的碰撞构成了世界各国古代中期军事争伐的主旋律。为了战争，各国都组建了强大的军队，先后用铁制武器取代了铜兵器，使用诸种兵制以保证兵源，并运用了各种军事奇谋：无论是较低层次的战术，抑或较高层次的战略，都有相当发展，并趋于成熟老练。所有这些，均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保护自己、吞并他人，其表现是弱肉强食，强权即真理。但在这种轰轰烈烈的表层下面，隐藏着社会变革及文明整合等进步史实；越是在古代，社会进步的代价越是沉重。本时期，世界各国在军事上的运作，既有共性，亦存在差异，我们可以对构成当时世界军事格局的三大区域（地中海、印度、中国）作一简略比较。

1. 战争规模与军制比较

在人类历史上，罕有战争如此频繁的时期。当时世界，只要有国家的地方，均有战争之祸，地中海世界大国的涨落和兴衰，摩竭陀从列国到帝国的过渡，中国从小国之争到列国争霸直到秦帝国的建立，无一不是通过千百次的战争来完成的。这一时期的战争，呈现出两个比较鲜明的特点。其一，持续时间长。希波战争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继续了 27 年，布匿战争（第一、二次）断断续续进行了 60 年，亚历山大东征用了 10 年，吴楚战争长达百余年；甚至一次军事行动也会相持数月乃至几年，如雅典远征西西里，时近 3 年，秦赵长平大战，时近一年。其二，战争规模大。无论中外，一旦用兵，动辄几十万乃至百万，如薛西斯亲自领兵进攻希腊，据保守估计，兵力不下四五十万；长平一战，秦、赵双方各投兵力均在 45 万以上；王翦灭楚，带兵 60 万。战争，尤其是征服战争也不限于一国一地，而是数国，波斯与马其顿，甚至将战火烧遍三洲。不仅有陆上厮杀，亦有海上大战。之所以出现这种兵连祸结的局面，乃是奴隶制小国走向大国这一规律的普遍反映，在中国，它还是社会制度转型这一深层变迁的外在反映。相比之下，中国的战事更见频繁，但它主要是华夏诸族之间的相互角力；而地中海世界的战争，虽然显示出时急时缓的慢节奏，但却是数十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拼杀与争夺，因而更显得场面宏伟、波澜壮阔。

频繁战争也反映在兵制上。本时期的兵役制呈现出三个特点：其一，为适应日益频繁的战争，各国都先后扩大征兵范围。在古希腊、罗马，将征兵对象扩大到原本不服役的不入级者；在中国，冲破了“国”“野”界限，“野人”获得了当兵的权利；在其他国家，也使用种种办法扩大兵源。其二，无论各国采用何种兵制，都体现了兵民合一的特点，因为正规的征兵制一般仅用以组建常备兵，而国家一旦有紧急事件发生，都是全民皆兵。其三，服役年限普遍较长。波斯帝国规定的服役年龄为 15—50 岁，罗马为 17—60 岁，希腊诸邦一般是 20—60 岁，中国春秋时期为 18—60 岁，而战国时代则是 15—65 岁。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不仅服役年限最长，更具特色的是，除了征兵适龄男子外，适龄适役女子也要服兵役。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服役年限长及女子当兵，是我国战争频繁在兵制上的反映。

2. 军事技术比较

在本时期，从世界范围看，军事技术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出现了多种冷兵器，弓与弩是射程最远的进攻性武器，均能杀人于百步或数百步开外。攻城与城防机械方面更见进展，出现了多种军械，如弩炮、投石器、攻城塔等。希腊化时代的重投掷机械，能将 70 公斤重的巨石射出 300—500 米。叙拉古科学家阿基米得（公元前 287—前 211）发明的城防机械威力更大，在公元前 213 年—公元前 211 年的叙拉古保卫战中，大逞威风。据波利比乌斯记载，阿基米得发明了远程投石机和弩机，从卫城垛口发射出大量的巨石和箭，有的巨石重达 30 公斤，罗马战舰多被打坏或击沉。当余下的舰队以 8 船连成一排向叙拉古城冲来时，阿基米得使用了巨型起重机械，这是一种长臂杠杆，杠杆底座有绞盘，中间安有复合滑轮，前端链子上系有铁钩，城垛上放下的这些铁钩抓住接近城墙的罗马舰船的船头，然后转动绞盘，将船头吊起来，再猛然放下，使敌舰翻倒或碰坏。孔雀帝国的城防设备有十余种，其中威力较大者，有能自动射出排箭的弩和能发射骤雨般石块的投射器。可见，他们的军械，已使用了自然科学的成果。相比之下，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攻城器械则较为原始，诸如云梯、辘轳（一种攻城车）、大橧（盾）、望楼（一种攻城塔）、钩撞车等，均结构简单，与科学技术无缘。最常用的冲撞城门的车轮辘，只是在两轮车上绑二棵大圆木而已，使用时还得凭借数名士兵的推动，其威力与西方的机械装置相差甚远。至于用于攻城的投射器械，似尚未发明。在城防攻守技术方面，中国落后于西方与印度。究其原因，这一方面受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但亦与当时中国的军事理论相关。春秋战国时代的兵书，论述攻城及城防战术者极少，大部分兵书讨论的是排兵布阵、野战对垒、战争谋略等用兵原则，其重点是野战，而不是攻城。这自然会影响到军事技术的发展。

3. 战略运用比较

古代中期是战略运用趋于成熟的时期。本时期各国的争霸战争或征服战争，都十分注重战略的运用：亚述打击乌拉尔图，运用了先断其左膀右臂各个击破的战略；摩竭陀称霸列国，运用了结盟与联姻的策略；汉尼拔建立反罗马包围圈，采取了争取盟国、孤立敌人的良策；亚历山大东征，实施了安定后方、稳扎稳打、战略迂回等良谋。但将战略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还是中国。春秋时代，齐桓公、晋文公争霸，利用周天子的威信及中原小国恐惧戎狄攻扰等因素，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取得了众多小国的拥护，扩大了自己的势力，终于成就霸业。城濮之战中，晋文公制造秦齐与楚的矛盾，造成三强抗楚的有利态势；尤其后期晋联吴制楚、楚联越制吴、秦联楚制晋等，都是争取盟国、陷敌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的战略佳作。至战国时代，战略运用较之春秋，又进了

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218—前 201）期间，本为罗马盟邦的西西里国家叙拉古与汉尼拔结盟，罗马为施惩罚，于公元前 213 年兵围该城，叙拉古人掀起自卫战争。至公元前 211 年城陷，科学家阿基米得被杀。

一步。七雄并立，相互兼并，战争连年不断，“国无宁日、岁无宁日”，为兼并他国或不被他国吞并，各国都施展外交手腕，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壮大自己，孤立敌人，频繁的“连横”与“合纵”行动，就是有力的证明。而且，由于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各国所制定的战略亦不断变化，出现了“邦无定交、国无定土”的局面，外交与战争的关系更为密切。其中，秦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战略运用已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有的学者将这一战略概括为三步骤六种策略，三步骤为富国强兵、夺占地利，“东向以制诸侯”，以及成“帝王之业”；六种策略为：分化诸侯、各个击破；既用武力、又施威慑；战略进攻、适当妥协；因势乘便、出兵略地；收买权臣、大行反间；固地凝民、稳步扩张。此可谓深得其旨。可以说，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史，是一部战略运用史。这充分证明本时期中国的战略运用远较世界他国老练、成熟，这是因不同的国际形势所造成的。

在地中海世界，各国的霸权呈现出一幅连续交替的画面，当一国兴起时，其他国家包括本来盛极一时的帝国，业已衰落，不能与新兴国家相抗衡。如亚述崛起时，西亚无有强大的对手；亚历山大东征时，波斯帝国业已衰老……。新兴国家只需略施战略策略，伴以强大的武力，即成霸业。这无形中减少了实施战略的机会。而中国，无论是春秋还是战国，都是强国林立。春秋争霸，虽然主要是晋楚争雄，却亦有齐、秦、吴、越等大国的相互纠缠；至战国，七雄并存，形势更为紧张。这样，一国想要打击敌国，则必须首先考虑他国的反映，其行动要受诸多方面的牵制。这就为结盟与树敌等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充分展现的契机和舞台。

4. 战术比较

频繁的战争为战术的实施与不断提高提供了契机。全正面进攻、诱退、设伏、集中兵力、合围、“攻其所必救”等用兵方法较为普遍运用。本时期的战争，都是列阵而战，无论中外，都出现了许多步兵战术，即“阵”。在地中海世界，曾先后出现过亚述方阵、波斯军阵、斯巴达方阵、底比斯方阵、马其顿方阵、罗马方阵等多种阵法。其中，罗马军团阵是西方冷兵器时代最完善的战术，在此我们以它为代表，与中国的“阵”作一比较。罗马军团阵通常由长矛兵、主力兵与后备兵组成三线军阵。方阵的基本单位是中队，一中队 120 人，纵深 10 列，每列 20 人；第二线各中队配在第一线各中队间隙地后面，既可向前填补一线空隙，又可向两侧移动，加强一线纵深。由于实行小战术单位化及各中队间有一定间隔距离（约 36 米），故较之西方其他方阵，受地形限制稍小一些。我国古代的阵形中，各战斗队形以“曲”为基础构成。曲为 200 人，含两伯；伯 100 人，大体相当于罗马一中队；伯正面 20 人，纵深 5 列，与中队方阵每列 20 人，纵深 6 列，也大同小异。中国的“伯”与罗马的“中队”，其差别在于：其一，伯由两队组成，队 50 人，纵深 5 列，每列 10 人，每列各用一种兵器，分别配以戈、戟、矛、殳、弓，不似罗马中队

均使用同一武器。其二，两个队既可左右排列，成伯横队（这时形状与罗马中队相似），也可前后排列，成伯纵队。其三，两伯构成曲的方阵，曲的形状，根据两伯的不同排列而有三种情形：若两个伯纵队并列，则曲纵深 10 列，每列 20 人；若两个伯横队并列，则曲纵深 5 列，每列 40 人；若两个伯纵队前后排列，则曲纵深 20 列，每列 10 人。可见，仅就组成大阵的基本单位曲来看，其变化的灵活性已见一斑，这是罗马中队所不及的。从整个阵形来看，西方诸方阵，无论是马其顿方阵还是古罗马方阵，其阵形较为固定，变动不灵活，只能作一些简单的队形变化，远不及中国阵法的多变与灵活。春秋时代的车阵，战国时代的步兵阵，都能因敌因地而布成不同的阵形，如步兵阵，即有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雁行阵、钩行阵、玄襄之阵等达 8 种之多。从整个阵形变化来看，可谓千变万化、“兵无常形”。相比之下，西方的任何方阵，均显得呆板，而灵活性，变化性则是中国军阵的一大特色。

5. 军事著作比较

古代各国的军事著作，大都经历了从史诗、史书到独立兵书出现的过程。本时期出现了不少军事著作，如古希腊的《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长征记》，古代印度的《政事论》，中国先秦兵家的兵书及诸子论兵著述等。但只有中国的兵书完全从史书中脱颖而出，呈现出成熟状态，而其他国家的军事著作，仍然孕育在史书或政论之类的母胎内。由于成熟程度的不同，使得中外兵书具有不同的特点。从著作结构分析，中国兵书严格按照军事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要求确立结构，划分篇章，如《孙子兵法》十三篇，每篇各有主题，却又浑然一体；古希腊的兵书，尚处于低级发展阶段，多以记史的形式，综合地反映当时的军事思想和战争指挥艺术。在内容上，中国兵书重视兵学体系的构建，重点阐述战争观、战争谋略、战术运用、建军治军等军事规律，重道（规律）尚谋，如《孙子兵法》，“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形成一个严密的体系；而古希腊的军事著作，更注重战争进程、具体战术以及军事技术。在叙述方式上，中国兵书是“舍事而言理”，从理论层次上探讨战争的准备、战略计划的制订、战争战役的组织、战术手段的运用等用兵之法；希腊兵书正相反，它是“舍理而言事”，往往采用记实的方式，津津乐道于具体的战争进程、战役的详细过程，而有关战争的理性认识，仅零星点缀其间，尚未升华为理论。在论证方法上，中国兵书是高度提炼的理论著作，为了阐述军事原则，除使用一些含义界限清楚的军事范畴如攻守、胜负、伏、退等术语外，也大量借用没有明确界定的哲学术语，如“势”、“虚实”、“奇正”、“阴阳”等对偶性范畴，这就使中国兵书一般都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哲学气息强；古希腊一直被认为是思辩哲学的发源地，但当时人们却未能用这种方法来总结军事规律。古代印度的《政事论》缺乏的也是哲学思辩。《政事论》是本时期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唯一勉强可称为兵书的著作，它比古希腊的军事著作成熟，却并非严格的兵书，除军事外，还广泛论及政治、经济、外

参见刘庆《孙子与古希腊、罗马军事著作的比较》，《管子学刊》1991年2期。

交、法律等内容，其论述的主题是治国安邦之策，而军事仅占其中一小部分。从这一部分来看，既有广泛的战略内容（如外交、综合国力论），也详述各种具体的战术，更有大量的记实成份，如孔雀王朝的军事体制和各种军械的记载。这就使其内容既不同于希腊的军事史著，也与中国纯粹的兵书大异其旨。在论证方法上，它过于直观、具体，理论色彩不浓，缺乏思辩性。从某种角度讲，它只是某种军事条令或说明书一类的书籍。中外兵书虽然各有其局限性，但总体来看，中国兵书更趋成熟，理论色彩浓，更趋哲理化，因而具有时代超越性，能垂诸久远，影响后世；而他国的军事著述，则更趋具体、实用，处于不成熟或半成熟状态，缺乏思辩性、哲理性，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6. 中外战争的共同原则

古代中期，各国军事虽然存在着种种差异，但也呈现出一些共同性的原则。这里，我们从制约战争的一些共同性因素略加说明。

其一，国库充实是制胜之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军事行动规模的不断扩大，战争持续时间的日益延长，各国先后都认识到了发展经济、充实国库的重要性。古代印度的“国家七要素说”，中国的“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辩证思想，伯里克利关于“金钱就是雅典的力量”的演说等，都是从理论层次上对战略后勤的自觉认识。在实践上，各国亦依此而行。波斯“特别注意农业和战术，认为这是两种最高尚最必需的事业”；马其顿和亚述，虽不太注重农业生产，却也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都使用取粮于敌的办法来维持战争，亚历山大东征，仅在苏萨和埃克巴坦那两城所得黄金即达 5578.5 万英镑；至于大行军国主义的亚述，更是以掠夺他国为务。中国战国七雄均重视发展经济，皆能“粟支数载”、“粟如丘山”；秦国之所以能最终统一六国，大半要归功于它实行经济改革，取天府之国的资源为己用，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国库的充实不仅保障了战争的有利进行，也是进行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这一点，在战国七雄相互兼并以及雅典与斯巴达的争霸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其二，改革是强国之路。本时期各国，凡能成就霸业者，无不吸取他国成果，实行改革。亚述崛起于西亚，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的改革；大流士一世的改革，使波斯帝国地跨三洲；亚历山大所以征服西亚，在于他能吸收希腊兵法，创新马其顿方阵这一卓越战术；汉尼拔吸收希腊成果，改革阵法，致使能纵横意大利 16 载，所向无敌；罗马更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它不断改进步兵战术，使其三线军阵成为西方冷兵器时代的优秀战术之一，并能以极大毅力，向毫无所知的海洋进军，使用新的海战技术，使自己成为海上强国，故能打败迦太基，最终称霸地中海世界。在中国，战国七雄都曾变法强兵，致使战争激烈，相持不下，但终因秦国变法彻底，历代坚持，使其具有源源不断的军事潜力，逐渐取得优势。所有这些，都有力地证明，改革对战争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三，在本时期，宗教与迷信活动对战争起着不同程度的牵制作用。在地中海世界，这一作用显得更为巨大。亚述诸王素以嗜血著称，但面对强敌，仍需获得宗教的安慰，如亚述巴尼拔东征埃兰前夕，曾在女神雕像面前痛哭流涕，乞求保佑，得到女祭司吉言后，方敢用兵。薛西斯西征希腊时，身边带有祆教僧侣，以备随时询问吉凶祸福。他西征途中，遇日蚀便大为不安，幸得僧侣相告：太阳是希腊人的预言者，月亮是波斯的预言者，发生日蚀表示希腊城市将遭毁灭，这才放心前进。希腊人更为迷信，在这里，宗教不仅影响士气，甚至成为战与不战，以及制订战略方针的重要依据。第三次希波交锋前夕，雅典人曾两次携带重礼去德尔斐神庙祈求神谕，第一个神谕因为不祥，竟吓得他们惊恐万状，陷于绝望；第二个神谕稍好，最后两句却引起激烈争论：许多人认为，如在萨拉米决战，就会全军覆灭；幸得海军主将铁米司托克利斯将“妇女生的孩子们”解释成波斯人，因为如果雅典惨败的话，神谕就不会用“神圣的”这样温和的字眼，而说“残忍的萨拉米”了。这种解释得到了公认，雅典人这才决心迎战，决战地点也依神谕选择在萨拉米湾。德尔斐神庙的神谕对希腊战事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宗教不仅干预着军事行动，亦影响着军事指挥官。亚历山大、小西匹阿、阿育王等军事家、政治家，都是宗教味十足的人。亚历山大东征时，带有随军预言家；小西匹阿特别信奉神灵，甚至要求士兵相信他是神特别保护的人；而雅典将军尼西阿的迷信观念，直接导致了贻误时机、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全军覆没的恶果。可见，在本时期，宗教、迷信与战争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不仅影响战与不战、战略方针的制订等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结语：对人道的呼唤

公元前8—前3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充满血腥战争的世界，一次战争杀人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残杀战俘被视为理所当然。汉尼拔曾一次屠杀罗马战俘5000余人；白起于长平一战，坑杀赵国降卒40万；至于亚述，更是视人命为儿戏，其集体惨杀战俘及其杀人的残酷性，令人毛骨悚然，其教育儿童的方式之一，竟是观赏如何处死战俘。无论东方或西方，都是一片腥风血雨，野蛮、残忍是这个时代军事上的普遍特征。虽然，战争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历史，文明的进步建立于国与国的互相冲撞，但进步的代价毕竟是太大、太野蛮了。历史召唤着人道。但人道姗姗来迟了，而且在这个嗜血如渴的世界里，显得苍白无力。在西方，直到亚历山大东征时，优待战俘的人道作法才初露端倪；在印度，列国时代虽然有许多优待俘虏的规定，以及不许使用“奸诈兵器”等规定，但并未认真执行，孔雀帝国的几次血腥战争很快使之化为乌有；在中国，道家虽然提出了不“杀服民”的主张，但终究是文人学士的理想，没有丝毫号召力。尽管如此，这些关于善待俘虏的措施和思想，毕

希罗多德：《历史》，第484页。

原文为：“……且莫安静地居住在你们原来的地方，因为从大地方面来了一支骑兵和步兵的大军；你们倒应当在他们来时撤退，把背向着敌人；不过你们终有一天会和他們交战的。神圣的萨拉米啊！在播种或是收获谷物的时候，你是会把妇女生的孩子们毁灭掉的。”见希罗多德《历史》，第519页。

竟为这个暴力世界染上了一层人道色彩。人道主义，这一现代国际战争法的精灵，已在本时期的刀光剑影中，悄然降世了。这，或许是古代中期的战争留给后世的最有意义的遗产之一。

